

炎黄春秋

第 **6** 期
2006年

周惠 —— 不唯上 不唯书 只唯实

孙大午：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

国民党的大陆岁月

目 录

求实篇

- 1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何方
4 周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权延赤

亲历记

- 6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余焕椿
11 我给陶铸当秘书……………宋群
17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陈定学

往事录

- 21 从“起朱楼”到“楼塌了”
——国民党的大陆岁月……………雷颐
25 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郭洪业
30 共和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代食品运动……………罗平汉
35 中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熊坤新

建言篇

- 39 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孙大午

人物志

- 44 路易·艾黎在西北创办职业教育……………李屹阳
47 深得毛泽东赏识的赵毅敏……………刘守森

沉思录

- 54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钱江
60 再忆甲申之警钟……………金铿然
62 “老高三”四十年……………吴敏

怀人篇

- 66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沉痛悼念李庄同志……………金凤

一家言

- 71 阿Q与朱元璋……………李乔
73 论而不斗(杂文)……………李峰

时代风

- 75 英国老太太希拉里在华扶贫记……………昌沧

品书斋

- 78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
——读《唐山警示录》……………徐迅雷

本期执行主编 李晨

顾 问:

杜润生 李昌 于光远 李锐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征 冯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庄 李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鹰 凌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迪
韩钢 雷颐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实 徐孔(常务)
杨继绳 吴思

执行主编: 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淦赵润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23512(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 何 方

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在纪念这位伟人的时候,总会联想到陈独秀和张闻天两任党的前总书记。虽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三人却有共同点或相似处。这就是他们在位期间都继承五四运动传统,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或较为宽松的局面,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只是可惜五四传统过去在党内很难取得长久统治地位,即使一时得势,也会遇到强大压力,不久就被断送掉了。而坚持这一传统的领导人也多是好景不长,没能得到善终。

这是因为,在党内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处于优势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另一种传统,即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苏联斯大林高度集权的影响,被毛泽东归纳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毛泽东自己就说,“中国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提到的也是这两个“社会历史的原因”,并指出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被称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同志。《决议》并说他在新中国进入建设时期,“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制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可见,我们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的却是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当然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它表现在: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级干部委派制、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由于强调一元化领导,就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

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在这种人治成为制度的情况下,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和法治了。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解决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到现在已经25年了。党的十三大决定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过去整18年了。结果如何呢?这是国人和世人都看得很清楚的。事实表明,封建传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根子极深的。

但是,我们党毕竟是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也就是由于西学东渐引进了科学与民主而掀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党内的五四传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有时还可取得一定的主导地位。毛泽东同志1941年所说,我们党的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

毛说的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是从五四到大革命(1925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的时期。照毛泽东的说法,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正是由于陈独秀等人引进和倡导科学与民主,坚持五四精神和传统,使党在建立后得到迅猛发展,很快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在党内也开创了一种自由民主、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我们说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如果指他的脾气暴躁,个性倔强,确是事实,他也承认;但是如果指的是他的思想和当时的领导体制,那就很不确切了。说陈主张个人专制,是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旗手对不上号的。那样,也不可能在他周围聚集像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人,更不会在党内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时期。其实,专制还是民主,一个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是否有言论自由。



化方向的科学性时,特别强调要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坚持真理,有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在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

而在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党的代表大会差不多每年一次,会上发言争论,批评领导,既无限制,更不审查。陈独秀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不但党的会议上,平时报刊上也允许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中共中央任何领导人。也没有公报私仇和制造冤假错案。这哪像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

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共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指遵义会议后和抗(日)战(争)头几年。人们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总书记的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对“左”倾错误有深刻认识的张闻天。他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改个人专断的领导体制,大力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会议讨论决定,没有发生过哪个人挂帅拍板的事。他不只口头上号召“要全党实行民主”,而且付诸行动。对于党领导下的政权,只要条件许可,就实行全民普选制。例如我就参加过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还亲自出马和我们军事学院院长郭化若竞选由几个单位组成联合选区的一名参议员。张闻天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离开自由,民主只能是空谈。所以他很强调个人自由,特别是思想和言论自由。他在1940年为中央起草的办理党校和关于文化人的两个指示中,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党校“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辩论问题的作风”;党的领导要“力求避免对于他们(指文化人)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在实际上保证他们的充分自由”。作为具有进步思想的新知识分子,张闻天一直大力提倡科学。1940年在论述中国新文

党不但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党的力量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壮大;而且由于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人人平等,不搞个人崇拜,还造成党内生活的生动活泼局面和一次理论繁荣的最大高潮。

除了先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张闻天外,在一个短时期曾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是个五四精神的传承者。他虽然由于被迫执行“国际路线”而犯过“盲动”错误,但本人的政治追求和思想倾向还是笃信科学与民主的。所以在党处于严酷的秘密条件下,他仍一再强调要尽量扩大党内民主。单是对下台后的陈独秀依然尊重,让他在短时期写出上百篇文章并予发表这件事,已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能使他以五四精神开创一个“我党生动活泼时期”。

事隔多年,中共中央又曾经出现了一个同上述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多少有些相似的时期。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出现的一种比较宽松开朗的局面。这当然主要是由于邓小平为核心的党领导国家实行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拨乱反正必然产生的现象,但也与胡耀邦本人的政治理念与思想作风有极大关系。例如没有他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就谈不上拨乱反正。而没有这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很难行得通。很明显,胡耀邦在新时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实际上是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再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时期,而且确实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了创造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科学文化欣欣向荣的局面,胡耀邦以巨大的勇气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恢复工作后就一直大力提倡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言论自由。早在1979年6月,他已顶着上层的压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呼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刚刚担任中宣部长,就要求宣传部干部不要去搞“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说“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他几次向文化界人士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说:大家看马克思讲的多好啊!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把它搞成清一色呢?还说,我们不搞审查。在此后的六年总书记任内,他更是排除万难、百般设法维护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把这说成“自由化”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一个现代化文明国家和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真正坚持五四传统和追求科学与民主的人,在他们的素质和品格上,也有不少共同特征,例如:光明磊落,不用权术,不搞阴谋;清正廉明,严于律己,不搞特权;宽厚坦诚,不滥用权力,不制造冤假错案;勤奋学习,思想常新,总是站在时代前列;以人为本,不搞愚民政策,不搞个人崇拜,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里顺手列举的这几条,也都体现在上面提到的三位总书记身上。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没有高尚的品德,也不可能忠于五四传统,顶多只是口头上谈五四精神、科学民主,实际上却要搞封建专制和愚民政策。还应指出的是,胡耀邦继承五四传统并非无意识的,而是相当地自觉。这从他对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和坚持五四传统的张闻天两位前任总书记的态度中也可看得出来。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后,就对科学研究和重新评价陈独秀给予了带有首创性的推动。还在1984年,他已过问和组织对陈独秀的研究和评价,亲自主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采取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对陈这种为社会进步和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有一种深远的目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才是正确评价前贤的态度。所以

与会的郑惠后来说,“就像他为了平反万千冤假错案而不惜冒大风险一样,为了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他也是排除重大阻力、勇往直前的”。

胡耀邦不但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可说起了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他出任中组部长之初,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向他提出将张的骨灰从无锡一个破烂房间中迁来北京安放的要求,他当即答应,并且经过斗争,克服了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的阻挠,亲自参加了迎送骨灰到八宝山的仪式。在他出任总书记后,又很快批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和成立张闻天文稿编辑领导小组。从此才启动了对于中共“一代明君”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他在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的题词中所列举张闻天值得学习的突出优点“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确实是对张闻天既真实又颇为形象的概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他本人的写照。

这三位前任总书记,不但在坚持五四运动传统、弘扬科学民主精神上是相同的,而且都具有时代眼光和渊博知识,因而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先觉和前驱。陈独秀和张闻天固然是著名的学者和大知识分子,而胡耀邦也由于天赋高和勤奋好学,所读政治理论书籍之多和对现时代认识了解之深,也是延安整风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少见的。就他们的处境而言,陈独秀和张闻天曾受到共产国际不同程度的制约,胡耀邦则处于更加严峻更加微妙的环境之中。三人的最后结局又都以不同形式的悲剧告终。这说明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和五四传统的脆弱,因此亟需进行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愚昧的启蒙运动,作为五四的重要补课。

新中国曾丧失了30年的经济发展机遇。后来总算认识到了,并在努力进行补救。效果是举世瞩目的。但是,赶上世界潮流,实现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法制社会的政改,却相对滞后。这正是胡耀邦等先贤们壮志未酬、抱憾终身的事。只有认真实行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胡耀邦的最好纪念,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稳定,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全体中国人真正地完全地站起来。(责任编辑 李晨)

周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 权延赤

1998年夏日的一天,我请周叔叔——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吃饭,最后一个到来的客人是包头市市长牛玉儒。他抢步上前蹲在周惠同志的轮椅前,握住周惠的手,眼圈泛红地说:“周书记,我当秘书时你送我三句话:勤政为民,实事求是,提高领导能力。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并不真懂,现在当了市长,这三句话一刻也没忘记,越照着去做,体会就越深……”

六年后,牛玉儒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勤政为民,鞠躬尽瘁——论学习牛玉儒精神》。

玉儒同志走后3个月,荐贤者周惠在全党向牛玉儒学习的热潮中,于2004年11月18日在北京医院静静地合上了双眼,他生前最后一次对我说的话是:“我这一辈子吃人民的饭,办人民的事,是人民的儿子;做错过事,没做过坏事;基本上在说实话,办实事;虽一生坎坷,却始终心境平和……”

我哭了。只有一生为民,无愧于人的老人才能像周叔叔这样安详、恬淡地离开这个世界。

现在的年轻人对周惠这个名字可能陌生了;但是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的名字并不陌生。

1959年庐山会议,他一屁股坐到彭德怀一边,被批为“彭黄张周周”。一贯主张“缩小打击面”的毛泽东抓笔从文件中圈掉了第二个周。他对周惠说:“周惠呀,你是被我从里面硬抠出来的。”他对周惠的三哥、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说:“惠省长呀,你那位老弟是被我挖墙角硬挖出来的。”毛泽东将周惠勾出了“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同时也勾掉了他的“知名度”。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一生努力实事求是、勤政为民的老党员、老领导。

他做错过事。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搞肃反,一位张县长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被指控为特务,周惠

负责审查:“你是不是特务?要老实交待!”张县长说:“周书记,金子是黄的,黄的可不一定是金子。我真是像特务,可我真不是特务呀!”经过调查,周惠放了这名“特务”,并真诚道歉:“我错了,你是好同志。”文革中,这位张县长又被打成“特务”,周惠不顾身处逆境,对红卫兵说:“几十年前,我们搞肃反搞错了,冤枉了他,你们不要再冤枉好人了。”

大跃进,全国各省都在放卫星,唯独湖南没有一颗“卫星”,被一位中央首长斥为“在中南海是乌龟,在全国也是乌龟……”省委班子吃不住压力,请示:“周书记,不吹看来是不行了……”代理第一书记的周惠说:“湖南不是没吹牛,只是没吹破天,这个乌龟我当了。”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给粮食生产低指标的湖南插了一杆大白旗,周惠又遭到一位湖南籍的中央首长斥责:“妈个×的,给我家乡扛回一杆大白旗!”周惠说:“报喜者给喜,报忧者给忧,这才是妈个×的。插红旗的已经向我这插白旗的讨饭来了,你再骂娘我就不借粮食给这些‘红旗’省了。”这一年,湖南省没有饿死人。第二年,毛泽东到湖南,见农民在举国困难的形势下仍有干饭吃,欣然作诗道“喜看稻菽千重浪”。他问周惠:“你看形势怎么样?”周惠想了想说:“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当然,前途还是光明的哟。”毛泽东凝视他片刻,将手一指:“这次庐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一定要参加!”周惠的这三句话,成了庐山会议最初纠“左”的基调。

“武将死于战,文臣死于谏”。周惠上庐山的主要观点是:“高级干部办事是要顺民心还是顺领袖之心?全国饿死那么多人,省委第一书记都该各打50大板。”

周惠被划入“彭黄张周周”反党集团,经受批判时,毛泽东亲自召见他,谈了一次话。

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将周惠一笔勾出了“反

党集团”，评价说：“老实人，没城府。”彭真也曾叹息：“周惠要是少说几句，下山就是省委第一书记。”

“反党分子”周小舟想向主席“讲清楚”，熬夜写了一封信，请后期上山的省委领导帮忙检查，被断然拒绝，不得已转而求周惠：“老周啊，那只好求你了。帮忙把把关……”周惠明知“沾边”的后果，仍然接过信来尽自己所能，修改了九处。结果，他修改这九处成了日后湖南批斗他与周小舟“狼狈为奸，共谋反党”的铁证，连续几个月不得休息，被斗掉十几斤肉。再与妻子相见时，妻子难过地劝说：“老周，你要想开些……”

“我能想开吗？反我右倾可以，但组织800万人上山大办钢铁，回来就饿死了不少人。”大颡、大颡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

周惠被打倒了，一倒就是20年，却又应了民间那句豪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重新出山，成了“封疆大吏”，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

“今天这个话怎么谈？”周惠望着昔日的战友，今日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温和朴实地一笑，“天文地理，鸡毛蒜皮，随便扯扯”。“那我说几句大实话吧”，周惠点燃香烟，“华主席，当年搞大跃进可以说是没经验，可你现在怎么又开那么两个会，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你那是画地为牢，自己划牢自己坐进去。多少年了，老百姓还在饿肚子”，周惠将手在脖子上一抹，“你要能搞成，我把脑袋输给你。”

华国锋大度地问：“你去过大寨吗？”

“我不去，我这个人从不‘朝圣’”，周惠动了情绪，“火车都往那开，去了多少人，增了多少产？当年搞人民公社你也知道的，崆峒山、徐水、七里营，主席讲三个地方三个月有三个30万人‘朝山进香’，结果是3年困难，饿死了不少人。在庐山我就跟主席讲过，我这个人不‘朝圣’。”

“那你要怎么干？”华国锋问。周惠没有回答。他上任一个月后，便做出惊人之举：

“我来内蒙已经跑了十几个旗县，几十个公社。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了，我看国家也管不了，谁能管？只有农民自己能管：包产到户，让农民自谋生路！”周惠一路考察，一路宣布：“我知道我讲的不合时宜，



周惠(右二)、周小舟(右四)1959年在庐山

我是被逼的。我不上梁山，老百姓就要上梁山了。出了问题我扛着！”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包产到户，周惠在党委会上说：“农民没有饭吃，是找咱们还是找《人民日报》？只要实事求是，另搞一套就另搞一套吧，最终还是实践来检验真理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周惠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回到内蒙，他说：“思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积极培养，大胆提拔那些实事求是，勤政为民，敢为老百姓说真话、办实事的年轻干部……”在他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8年里，先后提拔了几十名省部级干部，一百余名厅局级干部，延续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牛玉儒就是其中的一个优秀代表。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周惠同志，一个终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爱民为民的老共产党人。

(此文原载《老年文摘》2005年1月3日)

偶感

我远非圣贤，但却亦非坏人。一九一八年隆冬腊月，梅花盛开的时候，来到人的世界。土路洋路，大路小路，时爬时跑，连滚带爬，苦苦修今世，坚信早日到彼岸，与万花共欢大同舞。如今年已逾古稀，喜怒哀乐，酸的甜的都尝到了。回首往事，负人负我，不禁泪连连！人生潇洒走一遭，固幸哉！但如我并非潇洒自在地走在人生道路上，也不一定就是什么生不逢时吧！辩证唯物主义是我最大的信仰，它永驳不倒。说句笑话：很想它被驳倒，果如斯，人与灵就永生永存了。做梦。

昨夜偶感如右。读之似怪非怪！像自我解说，也似乎在笑说天条。翌晨重记，且作来日升天后的思念。

周惠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八日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

● 余焕椿

《人民日报》被开除出局

拙文《“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在报刊发表和连载之后,备受关注,说明它有一定史料价值,本人对此感激之至。

2006年是文革40年,粉碎“四人帮”30年,往事历历,纵有诸多难处,历史是不容忽略的。作为“严重灾难的内乱”的亲历者,我感到有责任来写这段回忆录,为《人民日报》多积累一点史料,为关心《人民日报》和关心中国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实情,这是我续写《“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的一点心意。

下面这篇文章记录的是文革初发生在人民日报社的两件惊心动魄的事——六一夺权和六一社论。其实这两件事是一回事:舆情骤变,大权旁落。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社就一直在揣摩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情绪、行为和举止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意愿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凡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此报设置陷阱,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社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第99页)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

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荡“三家村”“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狂轰滥炸,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一夜之间大权落入陈伯达之手

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的声音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主要领导人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搞起所谓“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

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陈伯达修改定题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图为修改后的社论稿

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社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保吴冷西出了新招。编委会中胡绩伟提出了著名的“保旗论”,他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策划的“民主运动”,抓“右派”,有了明确目标: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他们玩“引蛇出洞”老花招,估计民主运动一起来,有人就要说话,就要行动,那时“黑线就自然出来了”。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真的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己,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

(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所以,陈伯达要继续对吴冷西施加压力,直到把他压垮。此刻,陈伯达已拥有很大权力,能够为自己制造一次次机会,搞垮吴冷西。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再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5月5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的删节。康生指出,这不仅仅是“大报思想问题”,“这种错误同《人民日报》领导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长期处于中间立场有关”。陈伯达当即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对《人民日报》来说是个灾难性日子。

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第104—105页)

下午,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批

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己把自己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一改初衷,纷纷向吴冷西示好。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从此,领导成员也不再铁板一块,“四大家族”分化了,各人按各人的人生态度生活,个别的人后来成了报社新主人鲁瑛的“高参”,紧跟“四人帮”。

晚上,人民日报社部门负责人以上干部在三楼会议室已坐等多时,大家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候中央工作组的到来。10时左右,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来到人民日报社,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解放军报》记者处处长朱××、军事宣传处副主编尚××已先期到达,随后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也赶到报社同他们会合。随之而来的还有陈伯达的“记者团”。这个“记者团”实际上是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比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早50天。

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新闻界宣布人民日报社工作组名单中,有王力、关锋、穆欣、杨×、钱××、朱××、尚××和上海《解放日报》的两个名额,人选当时还未定,后来才知是鲁瑛和×××。名单中并无唐平铸和胡痴的名字,他们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立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相信这是陈伯达的刻意安排,他需要在文革中态度鲜明、既懂得

办报又与军方有密切联系的人来协助他接管《人民日报》。从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里来人民日报社上班,得到陈伯达的赏识和器重。

后来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当上新华社代社长,都仰赖于陈伯达的举荐。

陈伯达慢吞吞地走进会议室,冲着吴冷西和他的部下说:“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社领导不得插手。”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打断了。他宣布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



陈伯达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在怀仁堂讲的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一夜之间《人民日报》便落入陈伯达之手,成为中央文革呼风唤雨、制造混乱和草菅人命的工具。第二天,陈伯达在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说,他“在报社搞了个小小的政变”。

从表面看,人民日报社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内部反而显得异常平静,除二楼走廊上多了几个陌生人影,工作气氛比往日紧张、压抑外,并无什么特别变化。自从《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的老总、编辑、记者苦撑了半年多,现在终于从迷惘、困惑和彷徨中清醒过来,批《海瑞罢官》,并非学术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全面夺权的开始。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的夺权并不顺利。他低估了吴冷西的影响,低估了《人民日报》编辑队伍的水平 and 能量。尽管大权被夺,但一些重要部门,像评论、理论等还在吴冷西时代的原班人马手中,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许多有识之士虽无力与其抗争,但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消极抵制或不合作态度,使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遇到不小的阻力。

渐渐,陈伯达感到《人民日报》6·1夺权不彻底,他曾万般无奈地说:“《人民日报》这个组织5月31日以后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人民日报》不能改良,要革命。”

6月以后,陈伯达已不常来报社,他正忙于策划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于是把联系、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交给“文革小组”另两名成员——王力和关锋。王力主要管《人民日报》,关锋主要管《红旗》杂志。这样,彻底“革命”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王力、关锋之手。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变“小政变”为

大政变,在报社进行全面夺权。

但好景不长,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不满,提出“还我长城”,引起中央文革小组一片慌乱,王、关便在这一事件中成了替罪羊,从此在中央文革消失。经历几番周折,直到1972年底,“四人帮”在批林到底是批“左”还是批右的辩论中,占了上风,周总理再也无法管《人民日报》,这才完全控制住《人民日报》。

六一没有鲜花只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人民日报》本应发表社论向孩子们献上鲜花和祝福,可这一天却被一篇充满血腥味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替代了。

社论是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授意钱××、尚××和朱××起草的。起草过程中,“钱××特地加进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关于政权、政变的一段话。钱××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1—723页)

王力、关锋、唐平铸和胡痴参加了修改,陈伯达最后定稿。社论内容大都是陈伯达和林彪的话,

无须作大的改动,只在题目上下功夫。社论原题为《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认为题目过于一般化,没有震撼力和号召力,他大概早已成竹在胸,在纸上写了好几个题目,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在头版最上方。这是陈伯达夺了吴冷西权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他称之为“旗帜鲜明”的社论。

但是,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社论一发表,编辑部就接到无数抗议和批判的电话,直斥炮制社论的人是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乱。有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逐段批驳,称社论是株真正的大毒草。此信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使陈伯达警觉起来,感到舆论机关内部不稳。于是,他带着工作组的人,到新华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大会,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从军队中调干部,以记者名义到中央三大新闻单位去掌握情况,以便牢牢控制。

尽管有抵抗的声音,但太弱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毒素,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开来,噬蚀灵魂,摧残生命,造成空前大灾难。

人民日报社在“文革”中算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单位,从未发生过武斗。6·1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社突然掀起一阵揪斗“牛鬼蛇神”的狂风恶浪,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到五楼礼堂,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此时已被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也名列其中。“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田锺洛:《书生办报——怀念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同志》《人民日报回忆录》336页)

现代中国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在腥风血雨中自沉太平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哲学家李达在武汉被折磨致死……谁说得清楚,“横扫”以来,有多少民族精英和知识分子被打死、被摧残致死、被逼自杀身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草和修改这篇“社论”的人,后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牛鬼蛇神”,包括陈伯达自己。陈伯达后来“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陈伯达传》下428页)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审判员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吗?”陈伯达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甚至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6·1社论”后,连续5天,陈伯达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一系列评论,将“文化大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后来,当人们谈起“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何时算起时,自然想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不是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虽然毛泽东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之日算起,虽然提出“文革”政治纲领,向全党发出开展“文革”号召是从《5·16通知》公布之日开始的。在人们心中,“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虽然没有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为根据,但是灾难降临之日,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世界变得混乱污浊和没有理性,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6·1社论”是个分水岭,《人民日报》从此为自己“横扫”出一条罪恶之路——“一月风暴”、“揪军内一小撮”、“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文革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责任编辑 李晨)

我给陶铸当秘书

● 宋 群

染,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在影响着我,有的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

我初次接触陶铸同志是在1948年11月初,沈阳市刚刚从国民党手里解放出来。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作为新华社辽北分社的记者,随军进入沈阳采访。有一天,突然接到沈阳市委办公室负责人薛光军的一张纸条,要我到市委去一趟。去了,才知道要调我担任陶铸同志的秘书。我说,还要到辽北后方郑家屯去取一下行李。他说,来不及了,马上就要随军进关,缺什么衣服,这里补发点就行了。就这样,我来到沈阳市委住下。此前,我只在郑家屯辽北省机关干部大会上,听过陶铸同志的一次报告,与他并没有任何接触。陶铸在文革落难时,造反派曾经质问我:“你是怎样投靠到陶铸身边的?”我答不出,至今仍然答不出。

第一次见到我,陶铸也没有问什么,知道我没有回后方取衣服,便把他的毛衣、毛裤送给我。他的夫人曾志大姐也挑了几件衣服给我。我说,我没有干过秘书工作,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他说,慢慢就会做了。实际上,作为首长,他对身边的秘书也真的没有什么要求。我除了每天收收发发一些文件、电报,接电话之外,确实也没有多少事。本来照顾首长生活也是秘书分内的事,可是他不要我管。管理处派来一个炊事员,从处里领东西做饭,其它起居生活,都由两个年龄较大的警卫员袁三民和赵国治管起来了。相反,倒是他经常关心我的生活,每到一驻地,他总是看我住的怎样,有地方吃饭没有,不少时候就同他一起吃饭。这些琐碎的事,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秘书就是这样当的吗?

尽管我那时那么幼稚,那么不懂事,尽管我在他身边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他对工作的充沛激情,他处事的果断明快,耳濡目

我随陶铸进关后,第一件工作是,他作为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全权代表,于1949年1月23日先期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这是应傅作义将军的要求,我平津前线指挥部作出的决定。本来,双方的商谈已经进行了多次。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与傅方多次接触,尤其是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也对傅作义作过有力的说服。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傅作义似乎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傅作义仍然不放心。他派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先生来到通县,直接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表达愿望:在城里直接与我平津前线指挥部的高层代表见面。林、罗满足了他的要求,决定派刚刚到任的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前往北平。

看起来,此行和平使命,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的。然而,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这期间,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没有闲着。他们在北平城里修筑简易飞机跑道,达官贵人乘飞机南逃,说客们则纷至沓来。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带了亲笔信面交傅作义,要求他带部队撤到青岛,并许诺委任他为东南行政长官。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白及尔也传话傅作义,美国今后将抛弃蒋介石,全力支持傅作义,由美派海军来协助傅作义南撤。蒋介石向驻北平城里的蒋军军以上人员发出亲笔信,要求他们“在北平与共军决战”,“不成功便成仁”,或者想方设法“离开北平”。蒋介石还派参谋次长李及兰、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光朝飞来北平,召集蒋系军以上人员开会,许以重赏,劝他们在必要时“只身离开北平”。当然,大势所趋,真正响应蒋介石招呼的实在寥寥。不过,城里城外,蒋介石嫡系



陶铸、曾志夫妇(1947年在辽宁省白城子)

和非嫡系部队,有两个兵团、八个军部和下属的二十五个师,共25万人,是个庞大的武装队伍,再加上特务猖獗,有些情况,也不是傅作义能够完全控制的。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陶铸由邓宝珊、周北峰陪同,乘车进入尚未解放的北平城。随行的人员,除了作为秘书的我以外,还有以政治部科长名义随行的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等几个人,真正带枪的只有袁三民和赵国治两个警卫员。

我们一行来到北平,住进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作义将军接待宾客的“联谊处”。这里抗战前原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旧址。庭院十分寂静,铁门边有国民党军队士兵站岗,偶尔还有便衣人员悄悄地逡巡。陌生的环境,戒备的气氛,有点令人紧张。尤其是,进城的次日,《平明日报》发表了中共代表团进城的消息。本来双方的约定是秘密进城,不作报道的。可能傅作义出于稳定人心考虑,有意将消息透露给他控制的报纸。消息一出,当然就会引来更多国民党特务活动。我们为陶铸的安全担心。我安排袁三民和赵国治住在陶铸同志旁边的房间里,要求他们昼夜值班,随时都有一人在陶铸身边。但是,陶铸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晚间,他指点着楼下那间华丽的房间对我们说:“知道吗?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派人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地方。”他舒了一口气:“这一切都过去了,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后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了!”几句闲话,立时感染了我们,使我们的紧张情绪很快平稳下来。

经过双方谈判协商,确定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以叶剑英为主任。陶铸为七委员之一,负责对国民党部队的和平改编工作。这之后,国民党部队除九兵团司令官石觉等少数几个人飞离北平外,都随傅开往北平城外接受改编。这又是一个庞大而细致的工作。双方刚刚从敌对状态过来,稍一疏忽便会酿成大的灾难。所以,那几天里,陶铸是昼夜繁忙,一刻也不得休息。每天一大早,他就坐上吉普车,带上身边的警卫员,开到城外,一个团、一个团的向接受改编的部队官兵讲话,讲党对改编部队的政策,强调他们为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并且指明今后方向,留者欢迎,走者欢送。那时各部队多半没有扩音设备,在部队聚集的广场上,陶铸有时站在台上,有时站在部队中间,高声讲话,几天下来,嗓子都嘶哑了。

陶铸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官兵们受到激励,都表示要留下来,为新中国的诞生出把力。但是,也有少数顽固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不甘心失败,仍然伺机捣乱。有一次,四野文工团在为一个改编部队作慰问演出时,几个反动家伙竟往舞台上扔了手榴弹,炸伤了我们的同志。保卫部队担心陶铸的安全,建议他不要在改编部队多的场合下出面讲话了。陶铸拒绝了 this 建议。他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正说明需要我们去工作。受编部队官兵觉悟性提高了,特务分子就无隙可乘了。我们直接与受编官兵们见面,才能有利于他们的思想转变。我怎能仅仅为了避免个人危险就不去做工作呢。”他坚持按原定计划,逐个到受编部队各团去讲话。

对于陶铸来讲,这的确算不了什么“危险”的工作。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他哪一天不是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度过的呢。南昌起义的激烈枪声中,广州红花岗奋战的血泊里,厦门劫狱的惊险搏斗,直到南京监狱的铁窗生活,面对死亡,面对酷刑,他从未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动摇。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

三

在北平和平改编部队的工作甫告结束,他又着手展开了另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在解放后的北平和天津招收万名大专院校的

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这是一件富有远见卓识的工作。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加入解放军,不仅为即将解放的广大南方地区准备接收力量,同时,也能为提高我部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创造更好的条件。

招收南下工作团员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平津学生中引起报名的狂潮。一些学生运动的精华,都带头申请参加南工团。总团团长是谭政,副总团长陶铸实际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在北平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南工团成立大会上,他的精彩演说,使年轻的学员们群情振奋。“到南方去,为全国人民解放出把力”的口号,点燃了青年心上的革命烈火。事过几十年,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那些老学员们,谈起那次大会和那次讲话时,仍然激动不已。

南工团学员们到达长江两岸后,参加了许多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发挥了很大的效能。但同时也遇到诸如工作安排、生活待遇,甚至恋爱等等问题。到当年的七八月份,大量学员来到陶铸住处上访,要求帮他们解决问题。最多时一天有三四十人。陶铸当时还兼任武汉市军管会副主任的实际工作,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事情都堆在他的面前,甚至《长江日报》每天出版前的大样,都要由他来签发。但是,他仍然抽时间,逐一接见这些学员,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些能立即解决的,当即作出答复;有些需要各部门解决的,则让我电话或文字通知有关部门解决。

通过与大量学员交谈,他对学员们实际处境和思想状况作出认真的分析,经过四野党委研究,他执笔写出了《关于争取南下工作团学员参加部队工作的决定》。这又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决策。《决定》确定将六千名南下工作团学员再加上新招收的万余名军政大学学员,分配到部队工作,做到每个连队能有两三个知识分子。指出“这将使我军面貌为之一变”,它“关系到我军今后能否提高文化,提高科学知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防军的严重问题”。《决定》中分析这批学员的优点是“绝大多数思想纯洁,有正义感,要革命,有事业心,工作热情很高,还能吃苦,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进步快,思想理论懂得一些”。同时也指出,他们的特点是“英雄主义和自尊心很强,爱鼓励表扬,怕批评指责,小资产阶级幻想很浓,受不了打击与挫折,容易悲观失望。再就是存在着很厉害的平

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温情主义思想。对人家严,对自己宽。严格的组织纪律生活过不惯”等等。如何团结教育好这批知识分子,《决定》中说,“我们尚没有经验”,“特别是由于我军是从农村斗争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对知识分子一般的还很生疏与不理解,甚至可以说在相当一部分老干部中,还存在看不起与嫉妒知识分子的思想”,认为“组织上太重视知识分子,将来是知识分子的天下,工农老粗吃不开了”等等。因此,对知识分子“工作上要求太高,而帮助他们的工作做的很差,对生活上不太照顾、冷淡,有的则对他们缺点不是采取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而是讽刺打击,弄得关系很坏,最后是送走了事”。分析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两方面的情况后,《决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生活待遇方面、政治学习方面等六条具体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把这批知识分子团结好,使用好。

今天重新来阅读这份《决定》,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说,陶铸在当时就对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军队建设这个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不要忘记,那是在五十多年前的建国时期,有这样的认识和工作,是弥足珍贵的。

这份《决定》是他亲自调查和执笔写的。现在看来,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自己动手来干这样具体的事,也有点难以想象。其实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认为这很不一般。但是,陶铸却习惯这种“亲自动手”的工作方法。1950年秋天,朝鲜形势紧张,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为了教育部队,鼓舞干部战士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四野各部队普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怎样进行?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又自己动手来写《爱国主义教育大纲》。开始,他请政治部研究室的同志提供一点资料和数字。他的原意是帮他作点资料卡片就行了。不想研究室的同志积极性很高,很快就拉出了一个初稿。他看了,感到不足,就自己动手来写。他还笑着对研究室的同志说:“只要提供些资料就很好了,如果你们把稿子都写得好好的了,那你们就是主任了。”他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夜深了,我睡醒一觉,见他室内灯光依然亮着,偶尔又听到他思考时来回轻轻踱步声。他写一部分,我誊清一部分。有时,他又在誊清的稿子上再改,我再誊清。就这样一字一句,终于写出了这份大纲。发给部队,

为部队的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对于他这种工作精神，当时四野政治部的同志们中有一种赞赏，说：“陶主任像一盆火，干什么都是把火烧得旺旺的！”他激情如火，同时也把大家的激情燃烧起来。

四

还应该再讲一讲他到广西剿匪的事情。

1950年末，他奉中央电令，带领工作组到广西剿匪。广西已经解放一年多了，可是匪患仍然很严重。流散在民间的枪支不下五六十万，成股的土匪也有十五万人。他们袭击公路上的军车，破坏水上的交通。就在他去广西之前的几天，四野司令部几个干部乘坐的汽车还被土匪打了。这时我已调任四野机关报《战士报》记者，随他去广西采访。当我们乘火车到达柳州，换乘汽车到南宁时，考虑到公路经常被土匪袭击，驻军派了一个加强排，在卡车上架起两挺机关枪，武装护送。他风趣地说：“三年解放战争，往来战场上，与国民党打仗，我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优待。这次胜利打回南方来了，没想到倒要武装护送。”说是风趣话，实则他的心情是极为沉重的。解放都一年了啊，我们怎么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呢。

一路上，他每到一地，就与当地的军政领导细谈，了解情况，分析研究，寻找匪患难以消灭的原因。到达南宁后，工作组的同志分头下去，他也带着几个人到连队和农村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时，他已把广西匪患的主要问题弄清楚。于是，在广西区党委会上，他果断地指出，必须首先坚定地纠正剿匪政策上的宽大无边。他说，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已经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并被土匪利用。不少土匪被抓到后，说是“宽大教育”，没有几天就放了。有的土匪抓抓放放达五次之多。结果是土匪不怕被抓，可为我们提供情况的群众和当地的干部却大量被杀。有的土匪残酷地杀害给我们报信的群众，当众用刺刀把他们的胸膛破开，挑出心肝，炒来下酒。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过去不到一年里，土匪杀我干部群众六千余人，而我们镇压土匪只有二万余人。他说：“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没有严厉地镇压，谈什么‘宽大教育’？对那些罪行严重

的土匪，抓了，要公审、镇压！让群众信服，也让土匪畏惧。对于散落民间的枪支，限期收缴，以避免为土匪武装制造条件。”

正是由于政策上的改变，再加上军事上的重点进剿和驻剿相结合，发动群众一起剿匪，局面迅速改变。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1月中旬，三个月内消灭土匪十多万人。接下来，又在农村中普遍进行剿匪反霸，打倒土匪的后台，挖掉土匪的根子。终于，到1951年“五一”前夕，广西全境土匪已被肃清，党中央通令表彰。

五

当然，讲到往事，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应当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陶铸的一生，也并不是处处功绩，事事辉煌。他工作中也有失误，思想上也有困惑，性格上也有弱点。实际上，这些也就不可避免地铸就了他后半生中一些悲剧性的经历。

比如，在农业合作化和后来的所谓“大跃进”中，作为广东省的第一把手，无疑也同全国一样，头脑发热，为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重大损失。陶铸从来工作是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比较注重从实际出发的。在1956年1月31日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他曾就全省农业合作化发展到高级社的步骤上，提出一个稍稍符合实际的规划，即第一年（1956年）发展到28%；第二年达到80—90%；第三年扫尾。据时任广东新华分社社长的尤淇回忆，本来陶铸坚持的这个稳步规划，事隔不久却被突破了，不到半年时间就由30%发展到50%，这时出现了一些社员杀猪、宰牛的现象。尤淇对这种高速发展的高级社报道上有些迟缓、压缩。陶铸当面批评他：“你对高级社的报道为什么这么消极？”陶铸为什么由慎重到着急？原来毛泽东的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小脚女人”狠狠地“猛击一掌”，使全国立即形成了合作化热潮，各省形成了连篇累牍地进入高级社的报道竞赛。尤淇说，干工作从来不肯认输的陶铸坐不住了，他当然不愿当“小脚女人”，他“身不由己”地卷到这个“高潮”之中。原本计划在1962年完成的全省农业合作化计划，提前六年匆匆于1956年宣布完成。接着又同全国各省一样，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历史已经证明，它给农业乃至全国经济

带来的破坏和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与人民公社化一起哄起的是生产上的浮夸风。全国到处大放生产“卫星”,广东也不例外。连县星子乡北庄放了一颗“卫星”,把六十多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堆在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秤,竟放出了一颗30218公斤的粮食特大“卫星”。在这种处处虚假的产量“卫星”烘托下,又提出全省的粮食产量要由1959年的300亿斤,增加到400亿斤或500亿斤。一切“奇迹”似乎都可以产生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陶铸提出了:“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这也是他一生中很“著名”的一句错话,是他以后多年里沉重地反复向群众检讨的一句話。这句话的后果是,多吃粮,高估产,多征购,以及随之而来取消自留地和农民家庭副业,全民吃食堂,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等,使广大农民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之中。

不切实际的充满幻想的“大跃进”比赛,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距越来越远,陶铸的思想困惑也越来越重。当时《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林里回忆了这样一段经历。1959年2月底到3月初,党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名就出名在这次会议开始比较冷静地发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会议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甚至连当时正在广大农村进行着的“反瞒产斗争”还在继续着(所谓“反瞒产”就是认为粮食是有的,只是隐瞒不报)。会后,陶铸到广东四会县调查。他轻车简从,直接到农民群众家里调查。他的秘书汤龙夫,没有通知县社干部,出了县城,直奔农家查看米缸、谷仓。米缸是空的,谷仓也是空的。说是粮食都集中到公社食堂去了,家里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了。在一户农民家里,汤龙夫看到锅灶上正在冒着蒸汽,走上去去看看煮的是什么。女主人抢先一步,挡住了汤龙夫,没有好气地说:“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背过身去,又顺手揭开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锅里确实实煮的野菜。

这种令人落泪的事实,后来陶铸同林里、汤龙夫又到台山、南海一带视察时,几乎到处可见。这时的陶铸,沉重如铅的心情,已经无法再按照上面布置去搞什么“反瞒产”斗争了。他给中央写了报告,一语道破:“没有那么多粮食!”他在报告中分



1966年,陶铸和毛泽东在大女儿江城楼上

析说:1958年报产报高了,征粮过头了;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他还承认不适当地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又造成大浪费。为此他建议: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高征购。他说,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关系相当紧张,要是再反下去,反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他还说,农民家无隔夜粮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陶铸在大跃进中的思想矛盾和困惑是:既不甘后人,坚决执行来自中央的诸多指示,又每每在农村实际调查中遇到完全相反的情况,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最后,拿出了有关停止“反瞒产”斗争的报告。现在看来,这也许很简单,实事求是嘛!可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是要有勇气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份报告没有给他带来严重后果。那时候,毛泽东也已经感到农村粮食不够的问题了。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于1959年4月27日写出了一份《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印发给省、地、县、社的同志,还破例规定将这份文件发到基层小队长。通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信中甚至号召生产队的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

陶铸是幸运的,他的这次报告得到了应有的

评价。之后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讲了真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彭德怀一封有关农村问题的信，引发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终于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鲜为人知的是，庐山会议上，陶铸也是被点了名的。在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时，毛泽东指着彭德怀说：“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以信（指彭德怀给毛的信）为代表，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反击右倾进攻。”所谓“同情”，就是陶铸在批判彭德怀的长篇发言中，表示自己的一点看法：“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开展讨论，起了好作用”，还说“应该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地讲出自己意见的精神。”这自然是不能允许的。所幸的是，最后陶铸没有被划到彭德怀反党集团中去，躲过了一劫。由此，他的心情如何，也就不难揣摩了。

1959年9月，已经调离广东多年的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在体育馆偶然见到陶铸，说：“三年没见到你了，你的身体还挺好！”这本是一句极为寻常的问候话，想不到却引起陶铸的一连串嗟叹：“好什么，老了，一身是病！”他那时才五十出头。尤淇说：“你一点也不老嘛！”陶铸半晌才说：“尤淇，个中情况，你不知道，现在的事，真是难啊！你是搞新闻的，你不见现在报纸上登些什么？一天一个模样，一天一个花头，叫人无所适从，怎么也赶不上，催人老化！”那时他刚从庐山会议上下来，有许多事是属于高级机密，他当然不可能对尤淇谈。但是他沉重和苦闷的心情，却也难以控制地溢于言表了。

这里还要谈到的是，陶铸一生最大的失误应该说是在广东组织领导开展的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两次斗争中受到迫害的古大存、冯白驹等同志，前些年已经得到了平反。曾志在世的时候，曾对来访的《当代中国的广东》编纂委员会的同志说：“冯白驹、古大存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对广东是有贡献的。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曾志说这话时，陶铸逝世已经多年。相信，如果陶铸还健在，经过多次曲折和磨难之后，以他的个性，他定然也会像曾志一样，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

六

《陶铸传》中说：“他（陶铸）一贯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对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从未有过怀疑和动摇。”当他发现实际工作中有问题时，他也总是把问号往自己身上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责任。他不仅把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完全放在领袖一人身上，把个人的安危得失也放在领袖一人身上。即使在自己遭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时，他也总是认为那是“误会”，或者是别人在毛泽东面前讲了坏话。陶铸在被江青一伙“揪出来”并指责他为“最大的保皇派”时，他还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毛泽东对他的“保”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陶铸突然发难之后，只隔一天，毛泽东与他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会见后，他回到家中，高兴地对曾志说毛主席保了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谁又想到，此后他的遭遇是造反派开大会对他的批斗（曾志陪斗），失去自由，连电话也拆除了。每天从早到晚，包括睡觉时，都有卫兵站在身边。这时候，还谈什么“申诉”、“辩白”！

令人唏嘘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被关的几年里，他还在认真地读那本《名臣录》，从古代的那些忠臣名将中寻求支撑的力量。在庐山会议上，他曾亲笔写信给黄克诚，劝说自己的这位老战友“检讨错误”，信中说：“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洁’之妇。”作党的“忠臣贞妇”，这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尽管此时的“党”已经同领袖一个人划了等号，“反党”与“反毛泽东”作为罪状是相提并论的）。当他带着严重病患，被赶出中南海遣送安徽合肥时，临行前还深情地嘱咐曾志：“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这以后，只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不幸含冤去世了，终年只有61岁……

（责任编辑 致 中）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

● 陈定学

40多年前,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而我也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长达数万言的信,后来批判我的人都把这封长信贬称为“万言书”。一个小小的初中学生,为什么要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上“万言书”呢?这个“万言书”又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上“万言书”

我的祖籍虽是河南省孟州,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河南省西部的一个小县城澠池。在小学的时候,我就亲眼目睹了“五七年反右斗争”、“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炼钢铁”、“大食堂”、“大锅饭”、“放卫星”等各种各样的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留下了若干困惑。1959年,我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澠池县第一中学。虽然那时高音喇叭里仍然在高唱着“1959年呀,更是个跃进年……”那样的革命歌曲,但是“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群众生活出现了困难。到了1960年,由于严重缺粮,群众生活已经出现了更大的困难,人们在“大食堂”里只能喝上如同清水一样的稀汤,而饥饿的人们也不得不用野菜、树叶、树皮以及玉米芯做成的“淀粉馍”来充饥。我们在学校也是整日饥肠辘辘,那时我们班几乎每一个学生的抽屉里都放着两个小瓶子,分别装着辣椒和盐,饥饿难耐时就冲一碗咸开水来充饥。有的同学因为饥饿竟离开学校外出“盲流”,澠池的街头也经常可以见到一群群逃荒要饭的妇女与儿童。由于长期营养缺乏,那时有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而在澠池的一些农村也有不少农民因饥饿

而失去了生命。

那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生,但已经读了许多马列著作以及中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著作。那时我们在学校受到的几乎全是正面教育,老师、教科书以及报纸都在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我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疑问、矛盾与困惑使我陷入了思考之中。1960年,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忧思》的小诗,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

苦苦思国事,切切忧民生。

夜阑不能寐,年少发如翁!

在我们国家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那时我觉得问题的根源极可能在基层干部,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党中央和毛主席无法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所以才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于是我想到直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把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一想到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写信,我的心中又不免产生了许多顾虑和担忧,因为在那个年代,直言往往获罪,说真话常常挨整,战功卓越的彭德怀元帅就是因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不少老师就是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而被打成了“右派”,像我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中学生,又会落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批判、斗争、打“右派”、住监狱……一想到这些可怕的后果,我不寒而栗!但是,当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老人和那些逃荒要饭的妇女儿童的时候,我的心又久久无法平静。那时的我年轻、纯真、热情,对祖国和人民满腔热血、一片赤诚!我十

分赞赏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岂能为了个人安危而装聋作哑、不管不问。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又充满风险的决定：上书中央，向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那时我在一首《述怀》诗中曾这样写到：民苦已若此，我身安足言！

一腔热血写“万言”

那时我觉得上书中央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所以反映的情况一定要真实可靠、确凿有据。为了掌握更多的真实情况，我决定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我的调查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由于那时我在浉池一中担任学生会主席，与同学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通过同学们了解情况十分方便。浉池一中的学生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全县各个乡村的农村同学，一提到农村中出现的困难，每一个同学都向我倾听了他们的父母兄妹在农村的困难处境，倾听了某些基层干部粗暴恶劣的工作作风。记得有一位十分老实内向的农村同学，说起自己的母亲正因病饿交加而生命垂危的时候，竟失声大哭起来。也有一些同学让我看看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干粮”，竟是一些掺有少许谷糠的野菜团！

为了保证我所了解情况的真实可靠，我又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问题更为严重，有许多生产队都严重缺粮，集体食堂经常无米下锅，农民们吃的常常就是大锅野菜汤，但是有一些公社或大

队干部却利用职权在集体食堂里偷偷烙油馍，大吃大喝，群众对他们意见很大。浉池县有一个笃忠公社，公社干部为了争先进、“放卫星”，虚报产量，谎称小麦大丰收，但是由于实际产量极其有限，所以在上缴公粮时只好把农民们的口粮也上缴了。结果笃忠公社荣获了国务院的奖状，该公社的农民们却不得不忍饥挨饿、艰难度日，有不少人由于严重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浉池的许多乡村田园荒芜，人弱马瘦，问题相当严重。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当时在农村实行的那种“一大二公”式的生产方式很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几乎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赞成“包产到户”，一位老贫农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咱农民世代代都是靠地吃饭，只要国家把地包给咱们，保管老百姓不会饿肚子，保管国家的粮食库满仓流！”

那时“包产到户”正受到严厉的批判，批判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变相单干”，就是“复辟倒退”，可是为什么广大农民都拥护它呢？为了从理论上彻底搞清这些问题，我又专门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农学史等许多著作。通过这些学习，我认识到中国现在所推行的这种“一大二公”式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实际上是一种“左倾幼稚病”，而“包产到户”这种生产方式却有可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可能是一种比较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比较好的生产关系。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在1960年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春节期间，我把自己关进一间小屋，哈着冻僵的双手起草“万言书”。我忘掉了饥



全国各地大“放卫星”

饿和寒冷,奋笔疾书,通宵达旦,经过十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写成了数万字的“万言书”初稿。1961年,在功课之余,我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又对初稿进行了细心推敲、反复修改,并几易其稿,最后定名为《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1961年的暑假期间,我请几位要好的同学把“万言书”抄写了数份,并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分别寄给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部部长和中南局领导人各一份。为了避免信件被当地截留,寄给毛泽东的那一份“万言书”,是托一位已经考上了河南医学院的高年级同学从省城郑州发走的。



全村社员一起吃大锅饭

我的“万言书”

我的“万言书”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呢?在“万言书”的第一部分,我直言不讳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还附有在农村流传着的一首民谣:

大干部吃死吃活,
小干部偷偷摸摸,
做饭的将就能过,
社员们饿死饿活,
毛主席在北京不知不觉!

在“万言书”的第二部分,我分析了造成这些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我尖锐地指出:“1957年的反右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些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结果导致人们明哲保身、不敢讲真话。”“1958年的大跃进是左倾,是揠苗助长,对中国的经济是一场浩劫。”“1958年,中国开展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风行‘争先进’的浪潮,基层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策指导,再加上县、专区及省领导的‘规定任务’,使基层干部产生了一种混乱的工作作风,为了求得表扬和不致被打成‘右倾’、‘小脚女人’,浮夸风这个江湖风气开始在干部中滋长起来。基层干部摔了群众的锅,砸了群众门上的锁,共产风刮起来了。为了‘当先进’‘争表扬’,许多干部作风粗暴,甚至打骂群众,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

就是1958年留给我们的一条最为重要的教训。”

在“万言书”的第三部分,我提出了一些解决困难的建议,这些建议分别是:

(1)建议“改革当前的生产方式,采用最有成效的经济形式、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而这种“最有成效的经济形式”就是“定产包产制”,即“包产到户”。我从八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指出“定产包产制”最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粮食增产,能以最快的速度扭转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局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万言书”中我还特别引用了列宁在《中央的政治活动》一文中的一段话:“只要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还没有改造农民一天,就应当保障农民有自由经营他们事业的机会。”

(2)整顿干部作风。我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对一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意见很大。在“万言书”中,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干部作风中所存在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作风粗暴、强迫命令、打骂群众以及贪污集体财产等严重问题。我除建议对干部作风进行一次集中整顿,还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管理干部作风的机构——“政治部”,负责搜集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的批评和意见,督促、检查并及时处理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各种作风问题,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作

风教育,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

(3)大力发扬民主,让广大群众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我在“万言书”中建议:“在基层的每一个单位,例如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商店……都可以建立一个群众管理机构,可以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或群众大会,参与管理本单位的工作。”另外还建议国家成立一个专门搜集群众意见和建议的机构,使下情得以及时上达。

(4)纠正当时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现象,建议充分调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反映现实。

(5)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纠正“运动热潮主义”,尽量不搞运动。

悲惨的结局

我的“万言书”发出之后,心情十分紧张,我不知道它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几个月过去了,似乎一切风平浪静。但突然有一天,校长把我叫去,问我是否曾给上级写过一封信,并仔细询问了信的内容。我一一回答了校长的提问,并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最后校长也没有说什么,就让我回去上课了。后来才听同学们风传,好像是上级派人来渑池调查,但由于我当时年纪较小、成分不错,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所以没有做出什么处理。

1962年9月,我初中毕业后顺利考入渑池高中。进入高中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时学校也成了“反修防修的大课堂”,在这样的“大课堂”里,既不乏热衷于大搞阶级斗争的领导人,也不乏靠反右起家的“运动骨干”教师,更不乏靠打“小报告”抬高自己的“学生积极分子”,而像我这样一个喜欢独立思考、又敢于直言的学生,必然会成为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重点对象。1965年冬,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渑池高中的校园里贴满了批判我的大标语与大字报,我被扣上了“替农民叫苦”、“对现实不满”、“攻击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等种种罪名,横遭批

判斗争。我被打成“小彭德怀”、“小反革命”,被开除学籍、团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年仅18岁的我就开始走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离开学校的第二年,文革爆发,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涂黑脸、挂黑牌、住牛棚、捆绑打骂、游街示众,受尽了折磨与打击!我在农村劳动改造了8年之久,后来又到一个煤矿下井挖了3年煤,那时的我不仅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而且在生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穷困窘迫,四处碰壁,工作无着,厄运不断,度日艰难,几乎是处在一个山穷水尽的人生绝境之中!

当时遭受打击的还不仅仅是我,有不少同学也受到了牵连,那些曾经给我提供过材料、曾经带我下乡搞调查、曾经帮我抄写“万言书”的同学们都被打成了“陈定学小集团”的成员,他们多次被批判,被迫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1965年高考时,学校在这些同学的政审表中填上了“不宜做革命接班人”之类的结论,致使这些同学都未能考上大学,而这些同学大都是一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实在令人惋惜!回到农村后,这些同学又被看作是“有政治问题的人”,被打入了“另册”,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孟新顺同学学习刻苦,又写得一笔好字,回到农村后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感到生活无望,最后竟卧轨自杀了!张克祥同学热爱文学,曾立志当一名作家,但高考落榜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他患上了精神病,竟成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疯子”,后来也上吊自杀了!这些同学的悲惨遭遇,实在令人心酸!

当年我们都是些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一些建议,没有想到竟会惨遭打击,没有想到结局竟会如此悲惨!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国发生巨变,拨乱反正,乾坤扭转。1979年,我们这起持续了14年的冤案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得到了平反。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俯仰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学生们如今也都变成了两鬓如雪的老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令人欣慰的是,历史必定会对所有的功与过都作出最公正的结论与评价。

(责任编辑 李 晨)

从“起朱楼”到“楼塌了”

——国民党的大陆岁月

● 雷 颐

从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起，到1949年国民党仓惶逃离大陆，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成为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一段历史沧桑，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兴衰每每令人慨然兴叹，但感叹之后的深思，恐更有意义。

“革命党”与“执政党”

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当时，这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认真对待。其实，这却是中国历史舞台一出全新之剧的序曲，当然也是剧中主角国民党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勿宁说是由于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兴中会成立的时候，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不久，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变法的维新派被清廷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

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拒不变革，使清王朝丧失了“一线生机”。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



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第二年3月,选举初步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国会议员竞选的胜利。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无疑是袁世凯独裁的一大障碍。因此,他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从而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组织涣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败,也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后成为“执政党”这种转变的意义,却不能完全忽视。

“一党治国”

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组革命党时便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人格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出于公心,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此时恐无人料及。

但如何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革命党”付

诸实行,孙中山毕竟毫无经验,因此“中华革命党”不仅无法夺取政权,本身亦渐式微。从1916年到1922年,中国政治一片混乱,陷入军阀割据之中。孙中山两度联络部分军阀“护法”,却都因军阀背叛而惨遭失败。在极度困难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将越来越不景气的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虽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作了一些修改,但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仍与中华革命党一样,规定:“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的建设。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正在乘胜前进,两党矛盾空前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开始了血雨腥风的“十年内战”。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政体。1928年,国民党就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分立”,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相继出笼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它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颁布的各种条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它政党都是“非法党”。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

从1929年到1931年,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总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监察等全部权力都归国民党独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产生、组成,以后发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即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并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军事训练。

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一直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

“胜利的灾难”

虽然国民党一直采取种种办法镇压“异党”,但以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异党”一直未被其消灭。而且,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求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要求、呼声越来越强烈。1936年年末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再次合作,也为中国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停止了对异党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党派实现了局部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些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因反对蒋介石被捕的民主进步人士,允许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物的查禁,《新华日报》等共产党报刊可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发行。特别是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更表明国民党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正面影响和冲击。

虽有此种变化,但国民党并不想放弃“一党独裁”的基本政治模式。因此,它实际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一主张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制的彻底否定。抗战胜利后,在国共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仍把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争取民主政治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

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可能是历史给国民党提供的“一线生机”。然而,国民党被抗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又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失。

1945年8月15日,中国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何以至此,的确令人深思。

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按说,对敌产的接收,应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接管沦陷区敌伪政权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一些日伪所拥有的公、私产过程。具体说,要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查封清点。查清财产多少,属谁,来源等,该没收的没收,该还原主的归还原主。应有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头齐下,互相争夺乃至冲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如9月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各机构后面是不同利益集团,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许多地方只能靠日、伪军维持秩序,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名,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有关规章就不健全,实际

完全无人执行。如 1945 年 8 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全都无效,但迟至一个月后才公布清理敌有土地专门条例。这一个月“空白期”使许多“接收者”鲸吞大量土地,后来者自然也不甘心,所以这个“专门条例”只是一纸空文。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其“身价”自然大贬。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利益集团”又有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更加便利。湖南省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资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变卖一空,每天黄昏宣布戒严,将各种变卖物资转运到外地。安徽省芜湖警察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张,属专卖物资,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伙同他人将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卖掉。据统计,北平市被接收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五分之一。全国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这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此种情况,国民党最高层当然完全清楚。所以在 1946 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当时是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因此“不能辞其咎”。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

新”的“要点”,第一项即“多年以来,官商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破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决议”列举的几十条“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即“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提出要“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稍后,《中央日报》又发表题为《向官僚资本主义宣战!》的文章,甚至主张要用调查、告密、陈报、清查等方法尽快查明“谁是战时暴利者”、“谁是不法的接收人员”。

这些“决议”、文章其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言”,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它在党内坚持领袖独裁,对外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中共领导的人民与国民党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责任编辑 吴思)

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

● 郭洪业

1931年发生的全国大水灾，让处于多事之秋是中华民族几近于“九死之绝境”。

国家之不幸 民族之奇灾

这一年南方的雨季来的很迫切。4月下旬，广东连日大雨，东、西、北江潦水同时暴涨。进入5月后大雨开始遍及全国，珠江、闽江、长江、淮河等流域雨量较往年明显偏大。长江水位上涨，江潮格外的猛烈，预示着这是一个水情不平凡的一年。

6月福建出现了大规模的降水，连绵的大雨使闽江洪水暴涨，福州市大水漫入，全市除东北部分地势稍高而幸免外，其它地方尽成泽国，许多房屋经不住大水浸泡纷纷倒塌，很多居民或为水溺、或为屋砸，死伤惨重。

广东三江警讯连月，7月1日，广东三水县各地大堤竟在一日之内数处溃决，四万多人顿时为水所困，溺饿而死的灾民达四五千人。7月12日，广东源潭、清远的防线终于被无情的洪水撕开了计达数千丈的缺口。房屋倒塌者不下万家，30,000多难民无家可归，粤韶铁路被冲断，损失达100万元以上。

贵州沿河县“风雨大作，洪水暴发，纵横百余里之田土房屋，悉被漂没”。威宁“天降冰雹，田禾各物，均被打坏，秋时洪水暴发，土皮多被拆去”。全省被灾者计达20县之多。青海西宁“迅雷巨雹，狂风暴雨，酿成亘古未有之奇灾，全境禾穗被打”。全省受灾达12县。

7月24日，安徽芜湖的凤林、麻浦两大圩为汹涌而来的大水冲决，20万亩良田顿时为滔滔洪水所吞没。皖北淮河水势大涨，阜阳县被淹5万多家，淹死2,000多人。寿县县城陷入一片汪

洋，难民坐于城墙上可以洗手涮足。颍上、凤台等县濒河地区尽被水淹。怀远“河湖倒漾，平地行船，水翻堤坝”。五河县“暴雨狂风，兼旬不息，以至遍野之洪流，又猛涨五尺有余，全境泽国，巨浪滔天，一望无涯，决无半点干土”。

在浙江，余杭大雨连日，六天不止。苕溪水与堤平，全城各处尽成泽国。富阳“27日起狂风暴雨，雷电冰雹，历时十余分钟，县政府房屋及民房田禾，均被雹击损毁”。太湖一带因雨水过大，一时排泄不及，水位大涨，环太湖各县损失惨重。

镇江、丹阳七月份降水平均在550毫米以上，江水暴涨，江潮潮位高达7.82米，江潮涌高倒灌，河水陡涨，其情景“为数千年来所未有”。

南京城也为一片汪洋所包围。京沪线铁路龙潭到栖霞段被大水淹没冲断，京杭公路被大水冲的千疮百孔，无法使用。电话线路多日不通。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的津浦路也为洪水冲断，持续54天不能通车。南京下关一带的4,000多棚户被江水冲毁，“成人鹄立水中，呼天喊地，小孩则啼哭不已，栖身无所，饥来无食，寒来无衣”。水西门外的沙洲圩也被水冲破，棺木漂流水中者，达800多具。

东北黑龙江、辽宁等省份也出现了灾情，至此全国几乎陷入无地不灾的严重局面。7月30日，救灾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呈文蒋介石和行政院报告说：“此次被水灾区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16省，灾民至少在5,000万以上……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

8月2日，防卫汉口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单孔桥溃决，汉口全市遂被淹，自铁路到江岸，一片汪洋，深处水平屋顶，一般达三四尺深。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扶老携幼，仓皇逃避，时人记载：“富

者重资雇佣(车马),冀免其鱼之戚,贫苦之壮者溺水而逃,至于老弱妇幼,则拽杖挽臂,且行且泣……一路呼天撞地,哭儿叫娘之声,惨极酸声。”“茅棚板屋全栋浮起,难民善水者,或伏屋顶,任其漂流,或攀电杆,疾呼救命。”“路埂上之灾民,则仍旧万千成集,坐卧于水深火热之中,无衣无食,哭声播野,诚空前未有之浩劫也!”8月15日,在大水中坚持了半个月之久的日租界终为大水所吞噬。至此,整个汉口已告陆沉。低洼处水深3丈,浅处也有3尺多深,昔日繁华街市,此时浊水茫茫,楼房如水中孤岛。“灾民多避居树上,树叶皆被食尽”。《国闻周报》哀叹:“武汉已成沧海!”

在湖南,溆浦“水灾惨重,亘古未有,溺毙人尸5000具,田庐荡尽”。永绥“大雨如注,河水涨至十余丈,溪洪同时暴发,堤溃山崩,田土房屋,尽被倾圮”。洞庭湖区各县灾情尤为惨重,溃决堤垸1600多处,淹没农田400多万亩。全省受灾地区达60余县。

河南是灾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周口镇“大雨连绵,十日不已,田园庄舍,淹没坍塌。沙河上游决口,巨浪雄涛,势如奔马,遍地尽成泽国,黑夜横流,人民在睡梦中被卷去者不可数计。灾情之重,古今罕有……”沿淮各县,均处于一片汪洋之中。黄河重要支流的伊、洛两河也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两河沿岸十余县受其涤荡,损失极惨。8月9日,河南省赈务会主席张钫致电行政

院、内政部、财政部、赈委会,报告河南受水灾者已经达40多县,到8月20日,张再次电告蒋介石、张学良受灾情况时,灾区已经扩展到67县,河南难民达到1,500万以上。9月份进行统计时则达90县之多。

在长江上下游深受大水煎熬之时,强烈的飓风多次横扫闽、浙,余威播于赣、皖、苏各地。8月10日,一股强烈的飓风在福建登陆后一路北上,所及之处,房倒屋塌,树木摧折。25日又一股飓风狂扫上海及附近海面并深入内地,致使上海外海、内河的航运全部停顿达48小时,这场飓风使水势刚有所回落的高邮等地,狂风暴雨昼夜不息,邵伯湖、高邮湖发生湖啸,滔天的巨浪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本已脆弱不堪的大堤,冲决运河大堤,邵伯全镇被淹,里下河十余县陆沉,不及逃命而惨遭淹毙者多达数万人。“由淮阴南门舟行至高宝一带,惟皆行驶于秋禾之上”。兴化县最高之县署,“亦水深3尺,其他低洼之处,水高于檐”。灾情之重“几与武汉不相上下”!

28日飓风再次登陆,芜湖“数千人为大水所溺,大批的尸体在风雨中无法掩埋,只好系在树上以防漂走”。飓风过后大雨连绵,福建再受水灾,灾情重者达十多县。

江西沿江大堤和所有洲口大圩,悉被冲毁,受灾田园,达数百万亩,九江等城市淹没于一片汪洋之中。鄱阳湖储水外溢,沿湖一带千余里,悉被淹没。面对空前严重的灾情,江西省政府束手

无策,赈灾无钱可支,抗洪则无策可用,水势逼人,灾民嗷嗷待哺,万般无奈之下,省府委员只好全体请辞,自谴“防御无方,救济力薄,致数十百万人民,死无所奄,生无所归”。

8月底,湖南省受灾区域达到了54个县,灾民1,400万,死亡20余万,洞庭湖区各县,受灾尤重,大多没于滔滔洪水之中,受灾耕地800万亩。

《国闻周报》称:“现时全国水灾区域,有谓16省者,然将各报记载归纳一处,岂止16省已哉……他如河北、山西、辽



水淹后的汉口循礼门外

宁诸省,被水灾者,多少不等,几无一省能以幸免。此诚历史上少有之浩劫。”

在武汉逗留了几天的蒋介石也深切感受到了水灾之严重,在《告水灾被难同胞书》中称:“大江南北,洪水氾滥,祸事之惨,灾情之重,亘古未有,……此次水灾之奇重,不仅影响长江人民之生计,实关系中华民族整个之生存!”

如此局面正如国民党中央在《为赈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所哀叹:汤汤江汉,滔天未已。茫茫禹迹,沉没堪虞。死者尽葬鱼腹,生者沦为饿殍。斯诚国家之不幸,民族之奇灾!

人祸不已,天灾交作,其势之猛烈,将国民政府的统治推向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国内南方有粤方讨蒋之役,国民党顽固清剿红军的政策又让赣、湘、鄂、皖等地战火未已;石友三在北方重新燃起了战火;日本导演的万宝山事件置中日关系于险风恶浪之中;东北处于“九·一八事变”前夜的种种不祥征兆中。如此内外交困之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发出悲怆的哀号:此次水灾之广,几亘全国,面积占全国2/3以上,被难人数至少在5,000万以上。今日之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

痛伤国家民族元气的损失

当时中国统计事业的不发达,此次大水所造成的具体损失到今天已经难以进行精确评估了。当年8月11日,《申报》报道:“湘、鄂、皖、赣、苏五省受灾人数约达2,300余万,倒塌房屋1万余户,耕地被灾者达全国总面积的12%,整个损失超过20亿。”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苏、皖、湘、鄂、赣、豫6省的90个重灾县调查统计显示,



江苏灾民避水逃难的情形

总损失也在20亿元以上。而当时全国受灾县数共672个,重灾县就有214个(全境淹70%以上,农业歉收6成以上为重灾区)。特设赈务委员会曾对苏、皖、湘、赣、鄂、豫、浙7省情况进行统计,结果为:受灾面积318,629平方公里,灾民4,330万人,死亡265,800人,房屋财产损失15.75亿元。但如以各地所报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则远远大于此数。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统计,仅豫、鲁、苏、皖、赣、鄂、湘、浙八省受灾人口即达5,127万,死亡400,305人,受淹农田14,635万亩,经济损失达22.54亿元。这一数据与《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所统计结果十分相近,后者略大于前者。而死于饥饿、瘟疫者则无从统计,有人估计因此而死亡者达300万之巨,虽缺乏这方面详实史料可以佐证,但像河南省“各县水灾之后,继以时疫,死亡枕藉,惨不忍视”的景象是大量而真实地存在的,死亡人数远大于直接死亡者则是毫无疑问的。

此次空前灾难出现于我国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使本已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更加趋于崩溃的边缘。当年国内粮食大量减产,著名的芜湖、九江米市也充斥着洋米。此年和次年,洋米继续倾销于国内市场,进口量较前增长1倍以上。民国二十一年长江流域农业收成较好,但各省慑于民国二十年缺粮之痛,纷纷积谷备荒,仍在维持米禁政策。民国十九年进口小麦276万担,民国二十年猛增至2277万担,民国二

十一年仍受水灾影响,米谷进口较民国二十年增1倍以上,小麦虽有回落但仍大大高于往年。东南缺粮省如福建、广东等地大量进口洋米洋麦以补其不足。

损失最为惨重者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7省。而受其创伤至痛至深者则属河南、安徽、湖北数省。河南自民国统一以来,天灾人祸交作,无岁不灾,此次大水几遍于全省,更使元气遭重创。“各县水灾之后,继以时疫,死亡枕藉,惨不忍视”。赈务之繁重,乃至于省财政罗掘俱穷。河南省财政,水灾前后几年均能保持收支大致平衡不至于破产,独此年收入减少而支出骤增,收支相抵出现约400万元的赤字,几占当年收入的45%。直到民国二十一年仍以“(民国)二十年水灾奇重,人民荡浙离居,故急赈工赈仍属切要之急”。

武汉全市被淹163,000余户,782,000余人。直到1933年商业经营者仍比大水前少1600家以上,很多商店经此打击一蹶不振,难以恢复,武汉在全国从此逊位于天津、广州之下。

江苏财政本就因积欠累累而不堪重负,在此次大水和次年的上海战事下,“直接受水兵两灾之人民损失不计外,已属可惊,而苏省近年来地方财政之穷困以及农村经济之衰落,是乃理所当然,势之必至矣”!

即使历年状况稍好一点的浙江,此次大水所带来危害之大,也是让人心惊的,“历年每遇天灾,尚可勉强支持,但本年处(民国)十七年(民国)十八年奇歉之后,社会元气尚未恢复……今遭受水灾风灾之县份,竟又达20县以上,稻田损失之外,且有蚕欠棉荒,竭一省之力以自维,已感困顿万状……惟他省直接或间接之影响,势必使本省与他省同陷绝境”。

水灾对经济基础薄弱的安徽打击之惨重,实在难以想象。“经临岁入总计16,344,870元,经临岁出亦如之,收支适合。在今视之,实为皖省预算空前绝后之巨数也。乃为裁厘之后,益以大水为灾,全省灾区达180,340里,灾民计9,485,000人,为30年来未有之厄运,社会经济半行破产,政府收入亦即锐减,于是不得不紧缩开支,以图补救,故本年度实际收支不过800万元耳”。收支几乎减去一半,经费压缩的结果,往往是从

教育部门开始,堂堂安徽大学“惟值水灾之后,兼以国难,省库奇绌,学校几告停顿”。而农村教育受其影响尤大,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安徽“在民国二十年水灾之际,收入锐减,大多数县份均有亏欠,两年来虽生产上稍有起色,又因物价低廉之影响,不易恢复水灾以前之状态,大多数县份对于教育事业,除已实行紧缩政策外,仍多积欠”。

大水之后的江淮广大地区,出现了如同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北方大旱后的地价剧跌现象,江淮流域5省81县,地价平均下跌了37%,皖北竟下跌了49%,而高利贷率则平均提高了1/3,此后连续几年地价持续下跌,这更说明了此次大水给本已十分疲弱的农村经济带来的惨重打击,大大加深了农村社会经济本已十分严重的危机。

举国倾力的赈济活动

刚刚经过裁厘改税的改革,水灾之下各地大部分田赋被蠲免,地方政府收入大减,而支出则因赈济繁巨而剧增,根本拿不出用于赈灾的庞大开支。而国民政府财政也一向拮据,当年全国总预算只有977,087,761元,其中军费和债务两项就占80%以上,财政的窘况可想而知。救济水灾耗资巨大但又刻不容缓,国民政府只好以盐税为担保发行8,000万元救灾公债(实际发行额为3,000万元,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售困难停止发行)。并允许河南、湖北各发行300万救灾公债以自救。

8月6日,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在上海成立,许世英、王一亭、王小籟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决定组织五百个劝募组分赴全国各地劝募,每组筹募1,000元。

8月14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宋子文为委员长,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等为委员,并决定招聘国内外知名人物为额外委员帮助筹集募款。

救济水灾委员会制订了总额高达7,000万元的庞大计划,其中3,750万元购买小麦用以施赈和工赈,运费1,200万元,救灾工作费1,000万元,其余用于购买灾民寒衣、卫生工作、紧急费用和准备金。分救急、过渡、恢复三个阶段进行大

规模救济工作。

救急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灾民于洪水未退时得以生存。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省在各被水灾区大量设立难民所,由于难民数量庞大,物资有限,条件都比较简陋,每日对难民进行施粥,或发放馒头,以免其不死。

工赈是在华洋义赈会负责下进行的,救济水灾委员会转拨五万吨美麦供其调拨。华洋义赈会分江、淮为18区(实设16)实施大规模浚河筑堤工程,这样一可救人,二可收亡羊补牢之效。各区分别容纳灾民数万至十数万不等,总计达110万人以上,间接受益者约在1,000万以上。

为赈济难民,湖北省决定公职人员捐薪助赈,以3个月计,拟可征集46,000余元的赈款,各地纷纷效法。8月26日,国民党中央会决定采用湖北、江苏省政府公职人员捐薪赈灾的办法,规定100元以下者捐5%,200元以上者捐10%,400元以上者捐15%,600元以上者捐20%,以3个月为限。

8月27日,国民党中央会决定:全国一切非切要建筑一律停止,将经费移借政府专用;中央党部的建筑费一律缴送中央,全部用于购买赈灾公债;加征奢侈品税;移救灾民;禁止屠杀耕牛等。此前刚刚实施的洋米进口征税政策也被取消,鼓励进口粮食以补不足。9月3日,国民党中央会决议为赈济水灾购买美麦45万吨,半数为麦,半数为面粉,自9月起每月运回5万吨。

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和直接指导下,北方的救灾活动进行得相当热烈。8月27日,天津水灾救济委员会成立,张学良自任委员长,天津市政府决定先垫2万元,并向银行借款10万元急救汉口水灾。9月8日,张学良还在北平副总司令部设立各省水灾筹赈会,并于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政府及哈尔滨、威海卫、北平、天津、青岛等市政府设立分



在家门前戏水的儿童

会,张学良兼任会长,并要求各省市长兼任分会会长。

灾情也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深切同情,武汉天主教会致函罗马教皇请求拨45万元用于赈济中国大水,很快得到批准;美国总统胡佛电令美在华机构和军舰努力帮助中国救济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捐赠10万美元专用于汉口水灾的赈济工作;日本天皇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灾区给予10万日元的赠款,许多国家政府或首脑以各种方式向国民政府慰问我国水灾;东南亚华侨华商也纷纷慷慨解囊救助患难同胞。

国联对中国的灾情十分关注,国联秘书处还拟制订帮助中国灾区恢复的计划。9月8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英国代表薛西尔提出的国联卫生部协助中国救济水灾的议案。9月15日,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飞抵南京,同中国卫生部会商灾区防疫问题,拉西曼还接受国民政府的聘请任卫生部高等顾问。

救济水灾委员会到10月20日共“收到各种捐款合法币5,239,305.41元,内计:私人捐助洋164,205.88元;团体捐助洋3,068,574.46元;华侨捐助洋877,967.41元;外人捐助洋1,128,577.66元”。这笔捐款对水灾的救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李 晨)

共和国历史上 一场特殊的代食品运动

● 罗平汉

以运动的方式发动群众,曾是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除了那些已写进各类党史国史著作的运动外,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曾开展过一场特殊的运动,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开展的代食品运动。

代食品运动的起因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代食品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何谓代食品,去查字典辞典,竟然查不到,而这些辞书里只有“代乳粉”一词条,释曰:用大豆或其他有营养的原材料制的粉,可以代替鲜奶。套用这个解释,代食品者,乃代替食品可以充饥的物品。之所以要生产代食品,并且还以此为主题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须说,是正常食品无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组织这样一场特殊的运动,追根溯源,则在于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底1958年初,从批评反冒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其实就是各项建设事业都搞高速度。于是,一系列的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被提了出来。为了完成这些难以实现的高指标,只好采取自欺欺人的办法搞虚报浮夸。粮食生产上的虚报浮夸,早在1958年春就开始了。到了这年夏收的时候,搞浮夸还有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放卫星”,而且“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以往小麦亩产不过百来斤,这时最大的小麦“卫星”已是亩产七八千斤;水稻过去亩产几百斤,这时放出的水稻

“卫星”,亩产少则几千斤,多则几万斤,更有十多万斤者。对于这些产量高得离谱的“卫星”,人们内心未必信以为真,但1958年天公作美,庄稼确实长得不错,因而上上下下对这年粮食能获得大丰收却是深信不疑,所以国家农业部1958年7月23日发表的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自豪地说:“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空前丰收。播种面积53900余万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1957年夏收粮食作物增产413亿斤,即增长69%,平均亩产187斤,比1957年增长70%。”1958年9月1日,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乐观地宣布: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中国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后来核实,这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

既然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国人的粮食问题,通过“大跃进”已经根本解决,所以一方面,领导层认为现在是工业的“大跃进”落后于农业的“大跃进”,今后要重点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钢铁工业,乃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正规的钢铁企业完不成全年钢产量计划,就大建小土高炉,时称“钢铁元帅升帐”。另一方面,由于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了一日千里的发展,多年来人们企盼的共产主义,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实现。既然如此,原来的社会组织结构已不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于是决定在农村率先向共产主义过渡,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全民大炼钢铁虽然勉强完成了预定的1070万吨的任务,但为此浪费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炼钢铁去了,地里许多成熟的庄稼来不及收回,造成丰产而不丰收。而建立人民公社时以为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为了“大”和“公”,就大刮“共产风”,同时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甚至鼓励“放开肚皮吃饭”,既造成了粮食的大量浪费,又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了1958年底,有相当多的地方粮食紧张,不少公共食堂处于停伙或半停伙状态。

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共中央曾决定对一些过“左”的做法进行纠正,形势出现了一定好转。但由于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发动了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错误批判,进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运动,那些一度有所纠正的“左”的做法重新实行,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加之不切实际地提倡“少种、高产、多收”,减少了耕地面积,造成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3400亿斤,比1958年的核实产量减少了600亿斤,减幅达15%。1960年又被认为是继续“跃进”之年,又遇到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年粮食产量又比上年减少了15.6%。在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大跃进”“大办工业”的结果,全国非农业人口却由1957年的10618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13731万人,净增了3113万人。这一减一增的结果,为了保证城镇人口起码的粮食供应,在农村就只能实行高征购,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农村粮食征购率分别为29.4%、39.7%和35.6%。如此高的征购率,当然只能以压低农民口粮为代价,1960年全国农村农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只有156公斤。如果单看这个数字,似乎也不算少,但这156公斤粮食中细粮充其量只有一半,而且这个数字中还包括除口粮外的其他用粮,农民真正能吃到的,肯定要低于这个数字。至于那些灾情比较严重或者“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农民每天的口粮在半斤以下者不在少数。

口粮如此之低,加之农民原有的自留地在公社化时收归了集体,又不允许搞家庭副业(因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社员除了能在公共食堂得到那点有限的饭食外,没有其他食物来源。

社员加入食堂后,虽然政策规定可以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家禽,但是,一则无饲料可喂养,二则也不愿喂养,因为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过程中,两次大刮“共产风”,使社员对搞家庭副业心有余悸,不愿从事。虽然1960年曾一度大力宣传养猪的好处,要求每个食堂养猪若干,可是人都吃不饱肚子,哪有粮食喂猪。如此一来,绝大多数食堂不但粮食定量少,而且菜少,油更少,肉食之类更不可指望。那区区的几两粮,对于青壮年来说,连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需要都不够,更不要说下地劳动了。俗话说,饥不择食,为了生存,人们只得寻找各式各样可充饥之物。于是,这些粮食、蔬菜等正常食物之外的可食物品,就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词——代食品。

中央的指示与科学家的研究

对于代食品一词,《人民日报》最早使用是在1946年7月24日。这一天刊登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紧急号召防灾备荒,积极生产严禁粮食走私输出》的报道,其中提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及早防灾备荒,特向全区发出若干紧急号召,其中一条就是“要运用过去经验,组织妇女小孩,采集野菜及各种代食品,以作渡荒准备”。

建国后《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首次使用代食品是1949年10月初,该报一篇题为《河南各地秋雨成灾,人民政府积极领导抢救》的报道说,河南商丘地委在指示各地积极开展抗灾时特别强调:“要动员群众省吃俭用,生产备荒,预先将一切可食的代食品如树叶、野菜等大量储存,以备来年渡荒之用。”可见,遇到灾年,群众早已有采集代食品的习惯,政府部门也是将之作为动员群众生产自救的一项重要措施。所以1953年5月16日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中,特地讲到:“号召灾区人民普遍利用隙地多种早熟的和多产的作物如瓜、菜、薯类等并收集野菜等代食品,以备秋收前青黄不接时食用。”“大跃进”前的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救灾工作的决定》,也要求“灾区应当大力提倡节约,发动灾民搜集一切可供食用的代食品”。

不过,将收集代食品作为一场群众运动有组织的进行,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这恐怕也是中国“运动”史上一场独一无二的运动了。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同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将中共中央有关安排好人民生活,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总结为“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五条方针,要求将“低标准”与“瓜菜代”有机结合起来,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其中说:自从中央提出“低标准”和“瓜菜代”相结合的方针以来,各地区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工作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目前秋去冬来,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已经收获完毕,秆叶即将干枯,树叶已经开始或即将枯黄下落,各地必须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抓时机,抢时间,迅速地将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不要烧掉,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指示要求各地在领导采集和制造各种代食品的运动中,应注意做到:

(一)书记挂帅,全面动员,全民动手,以食堂为主,工厂为辅,土法为主,洋法为辅;

(二)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妥善安排劳力和必要的物质设备;

(三)大力加强技术指导,提高利用效果,切实预防中毒事故;

(四)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有效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此外,指示还要求各地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一般应以食堂为单位,以便于直接增加社员的营养和发热量。食堂在采集和制造代食品时,应当合理地评工记分,各公社对于各个食堂生产的代食品,不要进行协调,如特殊需要进行某些调剂时,也应公平作价,在代食品运动中须防止新的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社员个人在不妨碍集体劳动的条件下,可以在公社和生产队划定的地区和范围内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供自己食用。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同时,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这年11月,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食品会议。在这之后,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一场广泛采集代食品的群众运动。

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曾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则改成了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代食品”的研究任务。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的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食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食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

中科院党组在报告中说,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大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100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的20%来提取淀粉的话,即可得淀粉6—7亿斤。

建议又说,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也可食用。科学家们推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果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科学家们研究出来的代食品有八种之多,即:人造肉精、叶蛋白、小球藻、扁藻、藁秆、小麦和玉米根粉、橡子、鸭跖草。科学家们说,野生植物不仅含有淀粉,而且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报告说,中科院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两个研究所从

20种树叶、野生和家生植物叶子中提取了叶蛋白,每百斤鲜叶子可以提2至10斤干蛋白,其蛋白质含量达50%-70%。至于秸秆,全国一年估计有6000亿斤,如果以10%的秸秆利用来做能吃的东西,按每100斤出代用粮20斤计算,仅此一项就可替代120亿斤粮食。

代食品种种

其实,在科学家们做试验的时候,饥不择食的农民们,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代食品的采集了。代食品也是品种繁多,河北省就曾将代食品分为三种。第一类,有一定营养,群众欢迎的:甘薯拐子、甘薯叶、甘薯蔓、玉米皮、玉米轴、蒲草根、茅草根、小窄草、地梨及各种青代食品(如酸溜溜、曲曲菜、马生菜、灰菜、刺儿菜、黄须菜、榆树叶、杨树叶、橡树叶等);第二类,吃了有害且与群众烧柴或工业原料发生矛盾的:棉皮、棉秆、稻草、稻壳、小麦秸、莜麦秸、大麦秸、玉米秸和高粱秸,河北省决定这些不应再让群众吃(这说明此前群众已食);第三类是虽然可食,但吃了与牲畜饲料和工业原料有矛盾,如各种豆秸、花生秧、花生皮、多穗高粱秸等。由此可见,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所谓代食品,就是一切可以作为肚子填充物的物品。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代食品运动的通知发出后,河北省投入代食品采集和生产的劳动力,平均每日达250万至300万人,最高达480万人,收集各类代食粉9.8亿斤,青代食11亿斤,高级代食品(指人造肉精、人造磨菇、小球藻等)881万斤,

代食品也成了社员重要的食物来源。至1961年3月,河北全省已有17万余食堂吃上了代食品,日食多者5两以上,少者1两左右。1960年11月,河北宣化市1299个农村食堂中,已有1068个食堂吃代食品93万余斤,占食堂总数的81.2%,人均食用量从1两到3两不等。河北曲周县组成了3万人的收集代食品的专业队,跟随六十七台拖拉机收拾茅草根作代食品原料。为了抓好代食品工作,河北省县级以上各级党委都建立了专门抓代食品工作的机构,社队也都有专人主管,省、地两级都编有代食品简报,还召开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议。河北有的公共食堂还总结出了一系列的代食品食用方法,如粗代食品与粮食的搭配比例,以不超过30%为宜;在烹制上,代食品是煮不如蒸,蒸不如烙,烙不如烤;代食品磨得越细,就越好吃;代食品有热性、凉性之分,热性代食品单食会引起便秘,凉性代食品单吃则会泻肚子,应该两种掺着吃等等。

玉米包在平时是弃之不用的,可这时却成了很好的代食品原料。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人民公社的食堂发明了玉米包制淀粉的方法,立即向清丰县委报了喜。清丰县委随即将玉米包制作淀粉总结出了三大好处:一是大大增加了粮食,每亩玉米按1800棵计算,收获的玉米包可做淀粉183斤,能顶粮食122斤,清丰全县共种玉米24万



1960年初,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出现灾荒,并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周恩来得知后当即写信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图为信函手稿

亩,总共能增加粮食 2928 万斤。二是玉米包的淀粉量为 30%,含糖 3%-5%(据说这是河南省粮食厅化验的结果),还含有一部分脂,它能增加耐饥能力,增加营养,使人们身体健康(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凡发明一种代食品,就宣称其如何有营养,如何有益健康)。三是大大方便了生活,这种淀粉加 30%的粮食面粉能做 10 多种馍饭,能做 30 多种糕点,而且操作简单易推广。

随后,清丰又试验出了绿豆秧磨粉、红薯秧磨粉、高粱秸皮加工成淀粉的方法。清丰县推算,按一亩玉米包制粉 183 斤,一亩绿豆秧制粉 195 斤,一亩高粱秸皮制粉 275 斤,一亩红薯秧制粉 320 斤,除了粮食收入不算,仅这些以前不能吃的东西就能制淀粉 13092 万斤,可顶 6546 万斤粮食。如此算来,以该县人口为 30 万计,仅此一项全县每人即可增加粮食 200 余斤,果真这样的话,任何饥荒都不用怕了。

俗语说,穷则思变,人们在饿肚子时,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弄到可以果腹的东西,于是两种高级代食品即人造肉精和小球藻被发现并广泛推广。人造肉精是一种酵母菌菌体做成的食品,据称可以土法培养,其办法是将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各种无毒的树叶、野草、野菜、农作物的根茎叶、酒糟或造纸、制糖工业废水,煮后都可以制成培养液,然后将菌种放在培养液里,经常保持 20℃—30℃ 的温度,两三天即繁殖成一层白膜。白膜在 50℃—60℃ 的温度下,溶解成糊状,就成了人造肉精。由于人造肉精制作的关键是菌种要纯,培养时要注意温度,讲究清洁,农村的公共食堂自然难以做到这些,也难以大量生产。

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云南省是较早推广食用小球藻的地方。据该省有关部门总结出来的经验,小球藻的养料可采用松针、树叶、煮菜水、洗菜水、淘米水等 20 余种,培养小球藻的池子可以是锅、缸、水桶、砖池。开始时,他们用小球藻作饲料,据说架子猪吃了,每天多长半斤肉,奶牛吃了,每天多产半斤奶;母鸡吃了下蛋增加三分之一,蛋重增加十分之一。1960 年 7 月中旬,云南大理市郊区公社,有一头快死的癞皮猪,吃了小球藻竟然痊愈

了。由此启发了这个公社的人,他们用小球藻给浮肿病人治病,居然成功,吃了小球藻后,浮肿病人都好了。接着,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治疗 25 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 78%,病症减轻的占 17%,无效的只有 5%,都没有副作用,尤其对水肿、贫血、肝硬化、慢性肠炎等,效果明显。产妇缺奶,吃了小球藻后,慢的两天,快的三四个小时,奶量便大有增加。更神奇的是,有一个人眼睛看不见已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之洗眼,很快初步复明;有人背上长了一个盘子大的疮,用小球藻涂抹,很快消肿痊愈。至于是真是假,就只能请读者诸君鉴别了。

接着,云南省粮食厅曾进行过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 1 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少吃一两大米,10 天后,参加试验的 8 个人,有 5 个人体重分别增加了 4 两到 4 斤。于是,云南在各人民公社大力推广培养和食用小球藻。随后,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 10 余个省也广泛培植小球藻。

小球藻的价值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60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说,推广小球藻的生产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的中毒事件;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胡乔木建议中共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的生产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各公社,逐级负责作出安排。不久,中共中央转发了胡乔木的建议。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倒也不失是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这样的东西吃进肚子,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中共中央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困难局面,最关键的是要调整农村政策,于是有了随后的“农业六十条”的制订,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缩小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等举措。通过这些政策措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的形势也逐渐出现好转。

(责任编辑 李 晨)

中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 熊坤新

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中,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各民族人民众志成城、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抗日救国大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

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来,中日矛盾便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国各族人民迅即行动起来,掀起了支前抗战的热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这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口号,也是他们的一致行动。处于抗战最前线的沦陷区各族人民将骨肉子女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中,而且倾力承担了保护、养育各抗日武装的重任。大后方的各族人民则踊跃购买救国公债、献金献粮、捐款捐物,无私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把家传家用的挂毯、绸缎、衣物及牛羊、毛驴等都送到献金台。阿克苏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将其丈夫生前遗留的白银元宝27个全部捐献。有一个维吾尔族孤儿,把院方发给的一套棉衣包捆得整整齐齐,捐献给前方战士。新疆各地献金购机活动,更是成绩显赫,令人感叹。据新疆抗敌后援会统计,从1937年9月到次年9月,全疆各地共捐款折合大洋60万元,用此购得国防飞机10架,命名为“新疆号”,送往抗日前线,参加了武汉保卫战。1943年,新疆再次开展一县一机运动,一年之内共献机144架,比原订计划的64架超过一倍多。据新疆反帝总会1940年的统计,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余元。又据国民党新疆省执行委员会1943年1月至1945年3月的工作报

告,在这期间共募得国币6600多万元。此外,他们还积极为延安捐衣捐物,仅1937年新疆边务处就派人护送一批有8万件皮衣、1万件马鞍和800斤西药等共80多辆汽车的物资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自接见了护送人员。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也发起开展献金购机运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以购买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支援抗战前线。甘肃省拉卜楞藏区人民的事迹更为突出,他们捐献的财物,竟可购买30架飞机,受到国民政府特令嘉奖,颁给“输财卫国”匾额一方。此匾至今尚存于拉卜楞寺中。

保障国际运输线,抢修国防工程,是大后方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又一群众性运动。抗战期间,新疆有1条空中航线、1条陆路运输线、1条驿运路线,通过这3条国际运输线运送了大批军用物资和医药器材等。据苏联方面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军用物资达6000多吨,其中有飞机985架、坦克82辆、大炮1300多门、汽车1550多辆、机枪1万4千多挺、子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万2千多颗。这些物资基本上都是从新疆国际交通线上通过的。1939年后,粤汉铁路、滇越铁路先后被日军切断,为了开辟一条新的国际运输线,20万云南各族劳工硬是靠两只手,开山辟石,架桥筑路,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建成了有536座桥梁、3292孔涵洞,横跨无数高山峻岭、激流险滩,长达95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有2000多名劳工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负伤致残者则达上万人。随后,国民政府又决定修筑川滇西公路,与滇缅公路相联接。于是,沿途各族群众男女老少齐动员加入了筑路大军。在吉祥公路段施工中,“罗罗民族(既彝族)亦均齐来赶工”,几乎

占民工总数的一半。彝族土司爱国青年岭光电亲自率领近 2000 名彝工赶来参加筑路。1941 年 7 月,这条长达 1000 多公里的川滇西公路初步通车,将四川与云南,以至与缅甸联接起来。从此,浸透有各民族人民血和汗的川滇缅公路起到了国际大动脉的巨大作用。1939 年到 1942 年的 3 年间,通过这条公路从国外抢运回国的物资中仅汽车就达 1 万 3 千辆。1942 年 5 月,川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云南、四川的对外进出口陆路通道,只剩下云南、四川经西藏入印度的传统马帮运输线一条。这时,由藏族同胞组成的马帮起了他人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从云南、四川等地把国产货物运进西藏,途中多次更换藏区所产高原马匹,历尽艰辛,再转运到印度境内,然后又从当地载上国内所需物资返回。在八年抗战期间,这条运输线从未中断过。仅邦达家族马帮在抗战期间运送的各类物资其价值即达 1 亿 5 千万美元。在关内重要城镇和沿海港口大多都沦陷的情况下,这些国际陆路运输线,弥补了空运运力的不足,保证了国际战略物资的运送,加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相互联系。在抗战期间,国防工程任务十分繁重,仅四川省境内修筑机场即达 33 处,其中多数又建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1940 年起修建秀山机场,仅开工时即征调民工 1 万 1 千多人,最多时达 3 万人,其中多数民工为土家族和苗族等各族同胞。在修建康定银官寨、甘孜、理塘 3 处机场时,所征用民工则主要是当地的藏族同胞。这些地方交通不便,劳动工具落后,施工条件恶劣,建筑所需土石方,全靠肩扛背运,各族民工含辛茹苦、排除万难,用血汗和生命保证了施工任务的完成。

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将爱国、爱民族、爱宗教结合起来,用其独特的方式,为抗战胜利献了心、出了力。四川松潘各藏区土司联名呈国民政府,表示愿率兵马奔赴前线杀敌,并“积极扩充骑兵,加紧训练,听候调遣”。川康藏区 57 寺僧伽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 9 日举行月会时,虔诚至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热振活佛、喜饶嘉措大师等宗教领

袖也表示拥护抗日。他们或发表文告、聚众演讲、号召抗日,或诵经读典、为国祈祷。热振活佛率西藏僧俗群众举行 3 次大规模祈祷大会,著名的拉萨三大寺僧人自“七·七事变”起一年有余,为国家胜利而祈祷,昼夜恒未间断。1938 年 10 月,九世班禅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医药费 3 万元,认购救国公债 2 万元,他还几次捐献战马数百匹。回族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抗日外交宣传活动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 1937 年 12 月到 1940 年末,先后有达浦生教长、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艾沙和马赋良两人小组、西北回胞朝觐团、留埃及学生朝觐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等六批人员出访中东、东南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访问了 8 个中东和南亚穆斯林国家,行程近 5 万公里,拜见各国政要和名流,接触 11 个重要党派团体,发表公开演讲 43 次,参加清真寺聚礼及演讲 16 次,散发、发表大量抗日小册子和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各族人民,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大量歼灭日伪军,开辟广阔的敌后解放区、游击区战场,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九·一八事变”后,富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东北各族人民,奋起高举抗日救国的义旗。朝鲜族人民一马当先,先后组织了以本民族为主体、受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磐石、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珠河、密山、汤原、饶河等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历尽艰辛,几经挫折,由最初的十几人、几十人逐渐发展成为有上百人、几百人的武装队伍。其间,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杨靖宇(回族)、周保中(白族)、杨林(朝鲜族)等党员干部到游击队担任主要领导或指导工作,并大量吸收汉、满等各民族爱国青年加入了游击队。1936 年 1 月后,这些游击队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各军。抗日联军各军中,有大批朝鲜、满、蒙古、回、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赫哲、白等少数民族指战员。连人口仅一两千人的鄂伦春族,人口不足一千人的赫哲族,也有人参加了抗联。少数民族指战员转战于白山黑

水之间,用血肉之躯同日寇展开殊死的搏斗,数以万计的将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延边抗日烈士就达 2841 名,其中朝鲜族占 90% 以上,朝鲜族抗日女烈士就有 338 名,而且大多数为党团员。

1936 年 2 月,内蒙古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的官兵 1100

多人在乌兰夫、云继先(二人均为蒙古族)等领导和傅作义的帮助下,脱离决计投靠日寇的德王,举行起义,打响了蒙古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几经挫折,于 1938 年 5 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驻防伊盟,对于阻击日军南下,长期坚持鄂尔多斯高原抗日斗争起了巨大作用。“七·七事变”后,高凤英(蒙古族)与杨植霖创建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一带,后与八路军一二〇师李井泉支队会合编成绥察支队,许多蒙、汉农牧民青年,自带马匹鞍具前来参加。根据新的斗争需要,1940 年夏单独成立以蒙古族为主的抗日游击队,高凤英担任队长。游击队轻骑善射,节节胜利,至 1941 年春与其它抗日部队密切配合,开辟了拥有 30 多个区、50 多万人口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断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牵制大量敌人兵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下,广布于大江南北的回族同胞组成了数十支回民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抗日武装。其中以冀中、渤海两支回民支队最为突出。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转战南北,其足迹踏遍辽阔的冀中平原,并转战于冀鲁、冀鲁豫边区,战功卓著,威震敌胆。据不完全统计,8 年抗战中回民支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 870 余次,歼敌约 3.67 万人,攻克敌人据点、堡垒、兵营,破坏敌人桥梁、铁路等数百处,创造辉煌的战绩,被冀中军区被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被毛泽东赞誉“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成为各族人民坚



回民支队战士破坏日寇炮楼

持抗战的一面英雄旗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我国中南、华南、西南不少地区相继沦陷,居住在这里的土家、苗、瑶、黎、壮、白、京、布依、水、佤、傣、傈僳、景颇、哈尼、彝、拉祜、阿昌等各族人民义无反顾地集合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下,纷纷组织武装队伍,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广西融县抗日挺进队,由 1944 年 12 月上旬初建时的 30 多人,到次年 4 月底已发展到拥有 500 多支枪、800 多名队员的多民族武装队伍,其中壮、苗、侗、回等少数民族和归国华侨约占半数,有的壮、苗族共产党员已成为挺进队的指挥员或骨干。仅在当年 5 月的一次战斗中他们就截获或击沉敌木船 23 条,歼灭日伪军约 400 人。各民族人民及其抗日武装,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捍卫了祖国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保卫了自己的家乡,仅云南腾冲一县在游击战中卫国捐躯者就达 2780 多人。

另外,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中也有多少少数民族同志担负了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如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满族)、独二旅代旅长廖汉生(土家族)、三五八旅政委洗恒汉(壮族)、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旅长韦杰(壮族)、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满族)、冀鲁边区副司令员杨靖远(满族)、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罗炳辉(彝族)、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侗族)、三师独立旅旅长覃健(壮族)、四师副师长韦国清(壮族)、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回族)、伊盟蒙汉支队三大队教导员天宝(藏族)、豫皖苏军区司令部二电台台长杨东生(藏族)等。

三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调集大量兵力,形成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阻击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部分国民党东北军官兵毅然自行组织抗日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节节抵抗,阻击日军,给侵华日军以重大杀伤。他们之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官兵。如邓铁梅(满族)在辽宁凤城组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满族人占有一定比重。队长中的王希臣、关世芬,炮兵负责人王哲普等都是满族人,骑兵第五旅旅部40人中有30人是满族,有的连、排、班里满族官兵竟占70%。邓部转战出没于满族聚居的凤城、宽甸、岫岩、庄河一带,不断寻机作战,取得了不少战绩。1934年,邓铁梅不幸被日寇逮捕并杀害。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称誉邓铁梅等人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国民党军队中有不少高、中级回族将领,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第十七集团军正、副司令马鸿逵和马鸿宾、第四十集团军正、副司令马步芳和马步青等,他们分别率领所部参加了抗战。1939年秋,马彪为师长,由回、撒拉、东乡、保安、藏、汉各族8000余名将士组成的暂编骑兵第一师奉命围攻河南淮阳,与日军展开血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生俘数十人,马秉忠旅长(回族)与2000多名将士为国捐躯。不久,该师在一次战斗中又打死敌骑兵500多人。八年抗战中骑一师官兵转战千里,血洒疆场,伤亡近万人,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四三三旅,自少将旅长佟毅(满族)以下,有满、蒙古等少数民族将校尉官近40人。淞沪抗战时,该旅恰在中央军西撤之际,奉命推进至浙江泗安。敌军以陆空军绝对优势兵力连续发动强大攻势。佟部与敌军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给敌以巨大杀伤。当年11月下旬,佟因“应战沉着、指挥有方”,被擢升为一四五师师长。在冬季攻势中,佟亲率六个步兵团、一个炮团与敌血战,再次给敌以重创。因他指挥得力,处置果断,善化险为

夷,有“福将”之称,随后升任为五十军中将军长、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国民党空军中的少数民族飞行员,也为保卫祖国的蓝天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38年初,日机不断飞侵南宁上空,空军四大队中尉飞行员扎西(藏族)等人驾机9架升空迎敌,将入侵敌机10余架全部逐出南宁上空。空军二大队少校队长邵瑞麟(满族),多次驾机领队出征,深入敌后,以至飞越日本本土执行飞行作战任务。他还单机深入敌纵深地区,完成侦察拍照、散发传单的任务,成为传颂一时的“孤胆英雄”。1942年1月,邵临时接任第二大队副指挥,率领全大队9架飞机,轰炸日军重要军用机场——嘉林机场,炸毁十几架日军轰炸机,完成轰炸任务准备返航时,邵的飞机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飞机凌空爆炸,邵瑞麟光荣殉国。

抗战爆发后,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统帅龙云(彝族)奉命组编滇军六十军。该军中上自军长卢汉(彝族)、师长张冲(彝族)、旅长王炳璋(白族)、马继武(回族),下至普通士兵,有许多少数民族爱国将士。1938年4月,六十军奉命开进台儿庄战场。张冲所率一八四师3000多名官兵火速赶到禹王山时,敌矶谷师团一个敢死队已冲上山顶。张冲下令王炳璋旅不惜重大牺牲务必把禹王山夺回来。王率部拚死猛攻,经反复拉锯,付出约两个营的代价,终于把敌人杀下山去。战斗中,王炳璋胸部被敌弹射中,鲜血直流,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完成任务。随后,我军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几乎每天每夜都有激烈的战斗。在前后27天的喋血恶战中,日军被我六十军官兵杀得伤亡累累,付出惨重代价,始终没能攻克禹王山阵地。当时,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陆军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二营,由湖南龙山县地方武装改编而成,全营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家族、苗族子弟。抗战爆发后,该营先后参加上海抗战,后参加昆仑关战役、滇西抗战等。八年抗战,二营转战各地,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全营官兵600多人,最后除一人因伤离队幸存外,其余全部战死。

(责任编辑 李 晨)

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

● 孙大午

2002年,我曾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主张撤并机构,“拆庙养和尚”,现在我建议国家尽快制订一部“临时乡村法”或“乡村创业促进法”(暂名),不动现行体制,“养庙养和尚”。这样既不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又给农民以自由和实惠。我相信,一旦出台这部法律,让农民就地自主择业,互为劳动,创业的热潮会在农村掀起,农民的身份会自然、自主、自愿地改变,农村会活起来,农民会富起来,从而有力地推动我们整个国家顺利转型,理性、科学、健康地向着和谐社会发展。我以为,这将是一条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规避了分裂和过多的难关,走向共同富裕的光明之路。

“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创业促进法”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改革有很高的价值认同感;而在20多年后,人们对改革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决策,也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具有第二次改革的重大意义。

中央一直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6字方针是非常好的,“少取”已经做到了,“多予”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就是“放活”。为什么不活?我个人认为现在仍然对农民的劳动权利尤其是创业权利束缚太多,放不开,形象地说就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

例如,我的食品公司的生产用水,要经过好几个部门的检查。首先是水务局,抽水化验合格

后,收费走人;水务局走了,技术监督局来;技术监督局走了,卫生防疫局来;卫生防疫局走了,环保局来……同是一个水井的水,同到一个地方去化验,化验单各部门互不认可。因为水务局执行的是《水务法》,技术监督局执行的是《技术监督法》,卫生防疫局有《食品卫生法》……他们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这样每个部门每年少则检查两次,多则四次,每次收费1200元——6000元不等,这是账面上的费用,实际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这些。

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还有很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也有发展。自从城市有了开发区,大点的企业纷纷搬到开发区去了,农村生成的小企业越来越少,生存越来越困难,资金和人才迅速流走。

我在农村办农牧企业21年,最深的体会是“自由劳动产生财富”。我感觉农村发展仍受制约太多,人们就业难是因为创业难。也就是说,农民现在还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想干也干不了、干不成。不论是生猪屠宰、农资专卖,还是民办医疗、民办教育的审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90年代林林总总的部门立法执法,都不同程度地剥夺了农民的创业机会,束缚了农民的创业能力,设置了转入非农领域的壁垒,强化了“三农”问题,形成了“农村住的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的社会格局。

我注意到,今年中央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在3月6日的讲话中强调:“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激发农民自主创业的潜能,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也就

是说,中央领导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一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经济36条”,其主旨和落脚点都是放开搞活。但一些部门凭借部门法规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收费而执法已成尾大不掉、难以禁绝之势。执法是刚性的,政策是柔性的,部门以法律在管,国家以政策在放,国家政策再好,也难以摆脱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我想,政策只有冲破部门的法律障碍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我建议出台一部“乡村创业促进法”,变“八个大檐帽”为“一个大檐帽”,即用“乡村创业促进法”这个大檐帽,把各种部门法规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让原来只能种地的农民在乡村自由进入多种领域、搞多种生产经营,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变“一个破草帽”为“八个破草帽”。

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裕文明起来,对国家大局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从法律上解放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减轻政府的压力,有效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

“乡村创业促进法”的立法主旨和内容

顾名思义,“乡村创业促进法”只对农村有效,对城市无效。

它的立法主旨是贯彻现在中共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落实3个中央“一号文件”和“非公经济36条”。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放小不放大,管大不管小”,城市可以对农村设防(农村产品卖到城市,接受城里的检测),农村对城市不设防(城市的产品卖到农村,畅通无阻),核心是一个“放”字;其目的和意义在于“放活”,通过放开,搞活农村。也就是说,对乡村,可管可不管的就不要管或少管,因为村庄太小,农民太弱了,像金融、土地、医疗、工商、税务、技术监督、文教、卫生等都可以放开。

笔者抛砖引玉,建议“乡村创业促进法”包括如下内容:

1、税收

对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农村企业,不再征收增值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其他行业可以像香港那样,只收所得税(也就是说,企业赔了钱不交税,赚了钱才交税);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不再征收所得税。因为新的个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以1600元/月为起征点,年销售额100万的小企业,纯盈利大约10%,也就是10万元,相当于一个5口之家在税法起征范围以内的正常收入。反观我们现在搞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免税,龙尾企业纳税,也就是说,挣钱少的在纳税,挣钱多的反而不纳税。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2、工商

村里面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家庭企业,应视同自由职业者,可以不要求登记、申报、注册;村以上、乡以下、年销售额50万以上的企业及规模在5人以上的企业可以要求申报、备案;年销售额100万以上的企业可要求严一些,登记、注册、备案也就行了,但要允许先开张;县级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以在全国通用;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投资经营领域,农民都可进入,改审批为登记备案制度。

3、金融

中共中央连续出了3个“一号文件”,还有“非公经济36条”,其中都提到了“在农村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但中央政策已经出台3年了,全国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浮出水面,原因是没有生存的空间。我们的《银行法》及金融法规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五千万元以上者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这个门槛太高,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这样的金融组织在现在的农村是极难产生的。在农村,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如果金融能够放开,人人都会懂金融,家家都可出老板。现在农村没有金融,没有自己的造血机制,创业的活力和潜力就无从谈起。我们常谈到的投资过热,实际上是城市过热,政府过热,而农村、民间的投资始终就没有热起来。

因此,“乡村创业促进法”可对农村金融做以下规定:1、对村里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活动完全放开,甚至不必登记、备案、注册。因为村庄社

会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一个村子里不会有什么金融风险,即使有,这种风险也应该让农民自己承担,减少政府压力。2、两个村以上、乡以下的农民金融活动组织或社区合伙、合作金融组织需要登记、备案、注册;3、乡以上已成规模的达到一定数额的金融组织要接受政府监管。

4、土地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是不覆盖农民的。但是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地有拥有土地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保障农民作为一个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根据宪法的精神,农民,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但是现在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可以用住房作抵押贷款,农民却不能用自己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无论集体或个体现在都还没有这种权利。农民也是国民,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可是中国的银行现在不承认。如果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土地、住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么农村也不缺资金,也可以发展。

参照广东省土地直接入市的作法,我认为农村的土地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农业用地,一种是非农业用地。农业用地可以暂时服从《土地法》的规定,不变动(前途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但可以考虑让荒山、荒地、沙漠先行一步,放给私人经营,搞永佃权),非农业用地应该放开。比如:村里的闲散地、空心地既然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应该允许农民集体收回来搞二、三产业,由村民委员会自己做主,不需申报、审批;如果是几个村联合开发荒地,则实行备案制;项目较大的要接受监管;农民的宅基地,二、三产业用地则视同城市住宅(70年)用地,可以抵押、贷款,进入流通领域;支持乡镇建开发区,为村庄合并打下基础。

5、医疗

目前,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一方面是医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甚至在家卖糖葫芦。一旦放开农村医疗,这种矛盾可望大大缓解。“乡村创业促进法”可以规定:凡是取得正式医师执业资格的,允许在农村自由行医,不需申报、

备案;乡以下的诊所只需申报、备案;乡以上的社区医院要按规定登记、注册,接受监管;村里要搞合作医疗,10户农民为一个合作单元,组成合作医疗,国家的医疗资源以医疗券的形式直接按人头配置到合作单元,农民患重病时由合作医疗先行支付,后经村委会证明,可到县财政报销,报销范围50%~80%,实行报销事后监管。对农民的合作组织给予信任,如果出现问题或诈骗行为,以《民法》和《刑法》论处。

6、教育

乡村民办教育不再审批。国家可以考虑用“教育券”的形式把教育资源配置到每个学生头上,政府只管公办的学校,让民办教育自由竞争,把择校权交给学生和家

7、生猪屠宰

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90年代,生猪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屠宰“一条龙”全垮了,无处索赔。至今生猪屠宰还是垄断经营。“乡村创业促进法”可以规定,城市里可以继续搞“定点屠宰”,但对农村应该放开,农民可以自由杀猪,在乡村销售。其他牲畜也不限制。

8、化肥、籽种、烟草、食盐等物资经营

现在的乡村,计划经济体制的配套机构还顽强地存在着,化肥、籽种、烟草、食盐等物资经营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我建议这些经营领域都可以放开,政府只管住生产领域。如果这些经营领域放开了,让农民自由进入,自主经营,农业产业化的各环节也会进入良性循环。

9、文化卫生

农村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村级完全可以放开;村以上、乡以下可以要求登记备案;乡以上可以要求审批、监管。

10、丧葬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民政部门将“准入审批权”转化为“经营独占权”,垄断了殡葬,把原本带有公益性质的殡葬服务行业变成了暴利行业,致使骨灰盒比大彩电贵,墓地比商品房贵,老百姓连人都死不起。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应当允许农民进入殡葬服务行业,允许社区、家族自办公墓,按8‰的年死亡率计算,30万以上人口的县域最少有2个丧葬场所,打破垄断,促

进竞争。

11、运输

农村的个体运输行业应该放开,异地运输到有关部门备案即可,政府的交通局、公安局不应设置太多条条框框进行限制,出现问题具体对待即可。

12、技术监督

允许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先投放市场,然后再去抽检,只要合格,马上批准,这比先批准再投入生产、销售更有利于打假。也就是说,技术监督局应该是事后监督,而不是事前监督,技术监督局不必懂得所有技术,完全可以让市场来监督。而且,技术监督局现行的事先检验“只对来样负责”,起不到监督作用,也不能给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责任。

……

另外,在农村创业的人们都深有体会,现在政府的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土地局、卫生局、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环保局、交通局、公安局等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能交叉问题,或明或暗给乡村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大大提高了创业成本,抑制了农民的创业愿望和潜能,应改为合并执法;目前各职能部门的收费票据80%是服务咨询收据,上交财政的票据只占20%。依照《宪法》,国家对公民和法人只有依法收税的权力,而没有税外收费的权力。为避免政府执法部门依仗权力收费,建议在工商、水利、卫生、土地、技术监督等部门研究实行“费改税”。

实施“乡村创业促进法”的预期效果

实施“乡村创业促进法”,我以为可以预见以下效果: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使臃肿的党政机构减肥,变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巨大差距。

以医疗、金融为例:按部队每100名战士配备1名卫生员计算,河北省有5万个村庄,接近5千万人口,就需要50万个乡村医生;金融以每100户有一个小规模金融合作社来看,以河北省为例,农村能容纳的就业人口也在50万。依此类推,仅此两项全国就会创造出2千多万个就业

岗位。如果让农民自由创业,自由劳动,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吃上和城里人一样的饭菜、穿上和城里人一样的衣服、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房子、享受和城里人一样便捷、全面的服务,所产生的就业机会将以亿万计。

农村一旦放开,我认为不仅仅是农民要创业,各部门执法人员也会积极地下海创业,因为他们很了解哪些行业最赚钱。如政府卫生局的监管人员,土地局的监管人员,金融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去创业,由监管者变成创业者。各部门的执法人员原本都是社会的精英,只要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人们会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京津地区人均年收入已高达4000美元,西北地区人均年收入不过1000元人民币,一旦放开农村,让农民自主创业,他们可以因地制宜,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很快缩小东西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仓廩实而知礼节,富裕产生文明,最终,全社会都能够共享农民的创业成果。

在革除体制弊端非常困难、修改部门法有待时日、城市与乡村已明显形成两个世界的情况下,出这么一部“乡村创业促进法”,区别城乡,管住城市,放开乡村,这是对社会、对各个阶层都有利的事,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增量改革。它基本上不伤害任何阶层的既得利益,法律可以从容修改,体制弊端可以缓缓革除,由此达成一个新的改革共识。就像改革之初,我们当时不动国有企业这一块,只是先给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等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一些问题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现在,三大生产要素——土地、资金、人才都对城市开放,在城市流动,而农村有土地,有资金,也有人才,只是因为管得太死,放不开,才留不住。只要国家放开农村,这三大要素会在农村循环流转,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潜能,新农村的建设也将是“惠而不费,劳而无怨”的事情。农村会像1978年一样,再度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和希望。

结语:疑惑和希望

2002年,我在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

时,曾以“土地法”与“银行法”等部门利益法为例,具体分析了农村创业所受到的严重束缚和制约,阐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农”问题的症结。

四年过去了,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性口号,我觉得当年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突出,现在出台这样一部法律已经是恰逢其时,刻不容缓。在征求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之后,大家建议我将“临时乡村法”改称“乡村创业促进法”,显得一目了然,更为明确。但是,按照惯例,如果改成“乡村创业促进法”,要进入立法程序恐怕需要经历一个耗时很长、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一旦立法就有全国性、强制性、长期性,恐怕既不适合当前的迫切需要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

“临时乡村法”是一部政治性的立法,意味着区域性、机会性、过渡性。临时约法,立法程序(上接第65页)决不会年纪轻轻就走上了不归路。

我们班30多个同学,1968年离校之后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迄今为止我知道下落者并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者只有20多个人(不知道下落的那将近10个同学,现实处境可能更加不如意。因为,按一般常规,处境较好者都会主动与同学们联系的)。在这20多个同学中,除上述已自杀者2人之外,20岁出头因公致残、双目失明、终身吃劳保者1人,50岁出头病逝者2人,占了大约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全国的“老高三”中决非偶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典型和普遍意义,可以说是“老高三”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显然,将“老高三”同1960年代以来毕业的任何一届中学、中专更遑论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相比,甚至同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包括战乱时期在内的任何一届中学毕业生相比,其命运的持久悲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自1966年以来,在漫长的40年悠悠岁月里,幸运之神一次也没有顾及过“老高三”群体,而尴尬磨难遭罪之事则一次也没有把他们忘记和落下。

“老高三”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两三年,在1950年代伊始就朦朦胧胧地有些记忆了,是牵着共和国衣襟长大的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灿烂的朝霞,给他们的幼年、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和幸福;“大跃进”、“大炼钢铁”的

可以简化,更为直接,也可由地方政府选择性实施。它的机会性是由当前我国的国情以及中央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它的区域性是由我国东南部和西北部发展不平衡决定的;它的过渡性则意味着这个法可进可退,有操作性和实践意义。

究竟是“乡村创业促进法”好,还是“临时乡村法”好?我疑惑不定,看来只有付诸公论和天意了。

我衷心地希望,以上建议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为下一步深化改革达成共识。哪怕是呼吁出台一个暂行条例,即便允许一部分地区试行,都是民之幸、国之幸!

农民是有希望的!

国家是有希望的!

(责任编辑 杜晋)

风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使他们在少年时就初尝了生活的艰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混乱、动荡和阴谋、诡谲,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和烙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巨变及其愈益显露的负面代价,让他们的中年既觉得重逢机遇、愉悦欣喜,又感到不堪重负、心力憔悴和无可奈何。现在,“老高三”们已是将近“耳顺”之年,正在逐渐步入“夕阳红”的队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显然早就被“边缘化”了,不可能再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了。但是,在他们的身上,真实、清晰地保留和展示着新中国成立57年来寒暑冷暖、阴晴雨雪的“年轮线”。他们保留和展示这些“年轮线”,不是为了炫耀,不是在发牢骚,不是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的苦难,而是想真实地倾诉和记述历史,想为对其感兴趣者特别是正对社会实践进程承担并发挥重要责任者提供一份进行研究和参照的“活化石”。仔细观察和琢磨这块“活化石”,特别是通过它透视绵亘40年之久的“老高三”这种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对正确反思新中国成立57年来曲折、艰辛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国社会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困难及问题,得出一些有益的启迪和警示。

(责任编辑 李晨)

路易·艾黎在西北创办职业教育

● 李岷阳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1927年4月21日来到上海,目睹“四·一二”反动统治残暴镇压群众、工厂童工受压榨的悲惨情景,毅然留在中国。他在中国60年中,为中国老百姓做了很多寻常人难以做到的好事。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路易·艾黎1997年逝世,邓小平称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路易·艾黎被称为“工合之父”。抗战中他组织全国各地建立了近3000个工业合作社(工合),生产军需品和民用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战争中老百姓的需要。同时为发展“工合”培训了很多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由于战乱,最后只剩下陕西宝鸡双石铺的一所培黎工艺学校。1942年,他和在校的亲密助手、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不断受到反动派的指控和监视。这时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拟去玉门讲学,约艾黎陪同。艾黎路过河西,看到山丹有很多庙宇空空荡荡,可以当学校,便于1943年底将双石铺学校沉重的机器设备和学生迁至山丹。山丹小县,非常贫瘠,艾黎与何克战胜了种种困难,继续办学,探索新型的创造性教育。从1943年到1953年,艾黎战严寒、耐酷暑,大力排除反动地方势力和“地头蛇”的干扰,在山丹生活了10个春秋。他于1959年以创办培黎学校为内容,写了一本书《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在新西兰出版。我认为,艾黎对教育的探索是成功的,是切合甘肃农村实际的,也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一)

艾黎办教育的宗旨是“创造分析”、“手脑并

用”,理论联系实际,把教育和工业、农业、畜牧业的科技知识密切结合起来,对中国基础教育进行创造性的改革。他的办学方向,就是面向农村青少年,面向农村的未来,把西方当时比较普及的农业、工业、开矿、制陶等科技知识应用于学校,要求学生手脑并用,学习技术达到一专多能,以多种本领为建设新农村、新城镇服务。这所学校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认为艾黎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中国贫苦老百姓谋利益的人,把艾黎当作自己最崇敬的亲人。艾黎给农民带来了田野上的希望,使农民看到了幸福的前程,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为此,1992年再版《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时,我把书名更改为《农民的希望》,希望把上世纪40年代山丹培黎学校的经验作为典范,在全省推广。

1999年到2005年,国务院两次下发有关推行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决定,去年11月7日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说明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春天来到了。

(二)

艾黎的教学方式是启发式教育,师生相互讨论,教学相长,要学生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以下举一些事例:

教师严立地(中国名字),加拿大人,电讯工程师。他精心把技术传授给电机组的学生。学生不懂什么是电,没有课本,他亲自编写,要两个英语稍好的学生当助手,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讲课的

教案给他俩反复讲明白。开始学生不懂电的原理，害怕电，一个学生壮着胆子摸了一下电源，昏了过去。严立地为了解决学生害怕电的问题，他带了弱电装置，要学生和他握手，学生感到麻簌簌的。

学生问：“你为什么不怕？”

严告诉学生：“我穿的胶鞋。”

严一步步提高学生对电和电的原理的认识，电为人类谋利益的道理。发电机组的实习室是个20平方米的工房，严立地因陋就简地开展形象教学，边教课，边介绍工房里的电器，进行示范实验，然后要学生们重复他的实验。凡学生提出的问题，都在现场答复，使学生学懂学通。严还经常要学生作实际锻炼，加深对科学原理的理解。为此，他在院子里用木料架起了错综复杂的电线网，要学生寻找和排除故障。有时由于操作不小心，技术不过关，电动机出了毛病；有时狂风吹断了电线；有时其它生产组电器出了毛病，正好给发电机组学生创造了学习的机会，要进行检修。严立地手把手地教他们解决疑难问题。焊工组有两台电焊机，焊条充足，正是学习的好条件。学生们既动脑筋，又勤动手，逐步巩固了理论知识，练出了真本领。

发电机组学生自己动手，建起现代式的变电所，学校各生产组都通了电，晚上学校电灯通明，惹得几十里以外的农民都来学校看这个“西洋景”。老乡们注视着他们村子的小伙子在操作，机器隆隆响，祖祖辈辈都没见过，想着娃娃学会了，将来一定会给村里带来幸福。

严立地走后，美国一家杂志记者甘沛霖担任了发电机组的专业教师，主要联系实际讲机械理论，如螺旋起重机、转轮起重机、液压千斤顶等机械的理论，离合器打滑时磨擦力的原理和防止磨擦的道理等等。1950年底，玉门油矿进口了一辆玛斯204吊车，途经山丹，动力系统发生故障，拖到培校，在甘沛霖的带领下，学生们学会了运用柴油机的知识进行检修，很快排除了故障。后来，玉门油矿同类型号的吊车出问题送到培校检修，同学们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油矿和学校表扬。

瓦尔特·易斯利，美国人，高级机械师，知识渊博，技术高超，负责机械组、运输组、煤矿、农场等生产组工作。机械组有磨床、铣床、钻床、车床等等，起到了制造学校所需机器的母机作用。各组学生轮流实习车工、钳工、铣工、磨工，直到翻砂、铸



路易·艾黎

工，学生们逐步懂得了学习机械制造的重要性。易斯利还带领学生把两个汽车的马达改造成一台收割机，和马拉收割机一块儿驰骋在四坝滩农场的土地上，这又在农民中引起了轰动。

艾黎担任校长，有时也给学生上技术课。例如，艾黎讲水锤泵的原理，前一天他在小河中安装好水锤泵，次日叫学生到小河边，看水锤泵开后，冒出的水高达两丈，他问学生这是为什么，不少学生答不出来，也有少数学生的回答接近原理。于是艾黎取出水锤泵，仔细讲解它的原理和作用，答复学生提出的问题，让每个学生轮流操作，直到学会学懂。据有的老校友说，我国1960年左右才有了水锤泵的应用。

艾黎给学生讲汽车原理，也是用直观的办法，教汽车中的装配，每个结构的名称、作用，开汽车、修理汽车的方法。他像个驾校的老师，一批、一批教会学生。学校汽车数量多达30辆，来自各国，产地不同，型号不同，还有二战中拉炮的十轮卡车。易利斯开车，技术娴熟，车后还挂了三节拖车，像大蟒在地上爬行，倒起车来，灵活自如，引得学生们都想挤进驾驶楼，学他的驾驶技术。1948年秋，

西北行政长官张治中到学校参观。为了安全,艾黎请他写了一张布告:“山丹培黎学校系国际友人所办,凡我军警不得动用该校一草一木,违者按军法处置。”

为了防备马家军部队劫走汽车,学生把汽车统统拆成零件,和汽油一起,都搬到煤矿一带的洞里藏起来。山丹县解放了,解放军进城了,学生们把全部车辆装置好,部队损坏的大批炮车、汽车都拉到学校修理。解放军第三军军长黄新廷请求集中卡车,协助解放玉门油矿。学生们驾驶了14辆卡车,满载解放军,解放了玉门油矿,还解放了山丹马场。为此,彭德怀司令员让身边工作的张养吾专程来校表示感谢,并邀请艾黎去酒泉会见,赞扬艾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落后的中国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建立和开展工业合作运动。艾黎在荒凉贫瘠的土地上,继续开办培黎工艺学校,解放军西进时又大力支援。培校招收贫寒子弟,校训是“创造分析”,这种思想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教学内容是现代工、农、牧业和医学方面的科学知识,联系实际,学用结合。艾黎不仅是一位大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而且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三)

艾黎认为:能不能培养出有创造性精神的学生,对一个学校领导人来说,是很值得探索的问题。

在探索新教育建设教师队伍中,艾黎遇到不少阻力。有的教师认为:创办这类学校是错误的,在学校进行生产劳动训练,这种教学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学校应当增加高等数学,学生应当是未来的机械师、工程师。艾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的学校代表着一种新的教育思想,那些反对学校教学方式的人,恐怕不大懂得新科学、新农业、新工业的意义。他们脑子里装满了种种复杂的旧思想,迷信那种旧的教学方式。他们也不懂教育男女青年手脑并用,将来能够帮助人民为农村创造财富,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是在过去那种闭门读书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老师不应该以“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的态度对待青少年。文化课需要这些教师讲授,但是这些教师最缺乏的正是他们没有机会和其他劳动者一道,手脑并

用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他们反对同学们手脑并用,实际上否定的正是他们自己。

艾黎认为,创造性教育,就是要学生问“这是什么”,还要懂得“这是为什么”,要学生追根求源,培养学生的分析思维创造能力。他说,为什么世界上别的人能办到的事,我们就办不到、就不去试验、不去创造呢?一定要学生大胆思考,开阔眼界,多看图书,研究问题,勇于创新,动手动脑,创造未来。

艾黎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几条基本经验:一是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教育的重点要放在农村。农村需要培黎式学校,进行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是富有生命力的,是符合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艾黎认为:“西北需要把培养中、初级人才及早放在先行的地位,因为这种人才主要靠地方自力更生来解决,而且对开发大西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二是要提倡学生善于创造分析。教育的作用,在于唤醒青少年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不能把学校仅仅办成是传授知识、墨守成规的场所。师生融合,学生主动,独立钻研,才是好的教育方法。三是学生是学校的主人,让学生“早当家”。学生学习的内容,应当和他们出校门后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培校学生的年龄平均在十七八岁,每个生产组的学生学会了按规定原则管业务、管财务等等,学校监事会主席也由学生担任。学生从小锻炼,上午上课,下午工作,有困难向教师请教,确实锻炼出了工作本领、干劲和责任感。

艾黎1959年说:“作为教育,如果它没有给人民的创造性活动提供奋勇前进的思想和方法,而是成为扑灭富有创造性智慧火花的教条,那种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1992年他在《探索性教育纪实》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是对教育思想的探索,也是对培养有实践技能和创造精神的人才的一种探索。”中国“由于国内市场的日益扩大,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不断高涨的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渴求,他们将要依靠这种知识,在农村广泛兴办为发展农业的各种地方工业,这种地方工业必然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艾黎的这段论述是很超前的。

(作者为甘肃省原副省长)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深得毛泽东赏识的赵毅敏

● 刘守森

赵毅敏原名刘焜，河南省滑县牛市屯人，1904年1月5日生于一个书香人家，1922年由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考入河北大学，1924年继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之后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因参与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冬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来到苏联东方大学，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读书，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底他要求回国，先在满洲绥芬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九一九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1935年初，他又重返苏联，作为中共的代表之一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改名赵毅敏。会后被任命为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前身为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1939年1月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

（一）

赵毅敏到达延安后，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开会，请他立即前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把赵毅敏介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并说：“我们已经决定让他到鲁艺学院负责工作，我已和学院讲了，他相当懂得艺术。”毛泽东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对赵毅敏说：“我劝你去了以后三个月不要讲话，不要作报告。要先了解情况，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讲，要讲就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接着说，“知道你不是搞艺术的，但现在需要你去，解决存在问题，把教师团结起来。据说你能团结干部，待搞好了以后再调你的工作。”

到鲁艺后，赵毅敏一边调查研究一边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了解到鲁艺内虽然汇集了像何其芳、李伯钊、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沙汀、冼星海、吕驥等中国革命文化精英，但内部确存在着许多不团结现象，赵毅敏审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加以化解。

赵毅敏还很注意培养文化新人，他曾与学院的政治部主任一起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成为整个延安时期的巅峰之作，至今仍久唱不衰，誉满全球。

赵毅敏到鲁艺一个多月之后，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赵毅敏说：“主席，我去鲁艺前您对我讲的话，我照办了，没有做报告。以后我在工作中读了您的文章，才真正认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现在，鲁艺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进一

步调查研究。看来,要作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报告,没有三个月的时间还真不行。”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1939年4月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自与会,赵毅敏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反映很好。毛泽东看到鲁艺一片兴旺团结的景象,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无疑是对鲁艺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赵毅敏住在延安宝塔山北面的杨家岭,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不断有机会见面。

有一次,毛泽东问赵毅敏:“你说共产党员有什么能耐?”不等赵毅敏回答,毛泽东接着就说:“有错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能耐。”毛泽东进一步阐释道:“人能不犯错误吗?马克思、列宁就不犯错误吗?我看不见得。你仔细看看马列的手稿,常常一段一段地圈掉,改得很多。没错为什么要改呀?我写《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央许多人都看过手稿,改的地方很多,也是为了避免片面性。”赵毅敏十分赞同地点头,并趁机汇报了鲁艺工作中的一个难题:鲁艺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理由不愿服从工作分配。毛泽东略加思索地说:“你问他,他说谁有经验,叫他回答,我们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不都是在革命中学嘛!我们原来也不会打仗,谁打过仗,谁带过兵啊?那还不是带起来再学吗?都是在干中学,书本知识是间接性的。你说这个没经验,那个没经验,我们都没有经验。你不实践,经验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后来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还对赵毅敏说:“我们有些干部在分配工作时挑挑拣拣。他想象去的地方领导怎么好,同事怎么好,下级怎么好。这样的空想是要不得的。不要这么想,要多往坏处想:我的首长犯官僚主义,同事们都看不起我,下级也不服从我。多想想坏的方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会觉得还不错,还挺高兴。我们对整个革命事业也应当在坏的方面多做些准备,比如说,红军减少三分之二,党员脱党百分之六十,大多数人牺牲,准备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就不怕困难。坏的我们不欢迎,但我们不怕。这样,心里稳了,坏事来了就不张惶失措。我对革命也有两手:争取好的,不怕坏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语,使赵毅敏茅塞顿开。有

毛主席的话给他撑腰,干部的分配工作好做多了。

(二)

赵毅敏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前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中央根据地内第一份大报《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了根据地内第一所正规大学延安大学,后任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1944年他办了一件事,令毛泽东大加赞扬。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部队对延安愈演愈烈的经济封锁,使延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大,老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生活上却苦不堪言,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怨言甚至不满情绪。据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披露,1942年边区召开高干会那天,天上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给打死了。消息传开后,有人竟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泽东得悉后,没有怪罪这位老百姓,而是深入调查这话背后潜藏的真正原因,就是征公粮太多。仅1941年边区就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沉重的负担把老百姓压得“哇哇地叫”,对共产党产生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情绪。鉴于这种苗头有可能危及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加强党群、干群关系。

赵毅敏思考了作为中宣部机关应采用何种让陕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终于找到了这种方式:扭秧歌。因陕北民间有每逢重大节日扭秧歌的传统,动员干部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干群关系自然会慢慢融洽起来。但问题是: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那玩艺儿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当地老百姓则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也不愿意一块扭。赵毅敏认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尽管粗犷,我们不能看不起。他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一次,赵毅敏了解到延安以北数十公里的安塞镇要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就带领秧歌队与安塞老百姓的

秧歌队一起扭,观看表演的许多老百姓也纷纷加入秧歌队扭起来,会场一片欢腾。

此后,赵毅敏的秧歌队又有了新发展:把与群众扭秧歌作为开场,等观看的群众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演出秧歌剧,借以激发群众抗日爱国思想,传播新的文化科学知识。赵毅敏根据李富春的提议,排演了一出宣传新法接生的秧歌剧,老百姓看到剧中女主人公生孩子后不知给剪子消毒,剪了脐带,造成婴儿死亡,联想到本村、本人的类似经历,不少人泣不成声,甚至有的拉着扮演医生的秧歌队员请教如何进行新法接生。

在一次大会报告中,毛泽东高兴而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实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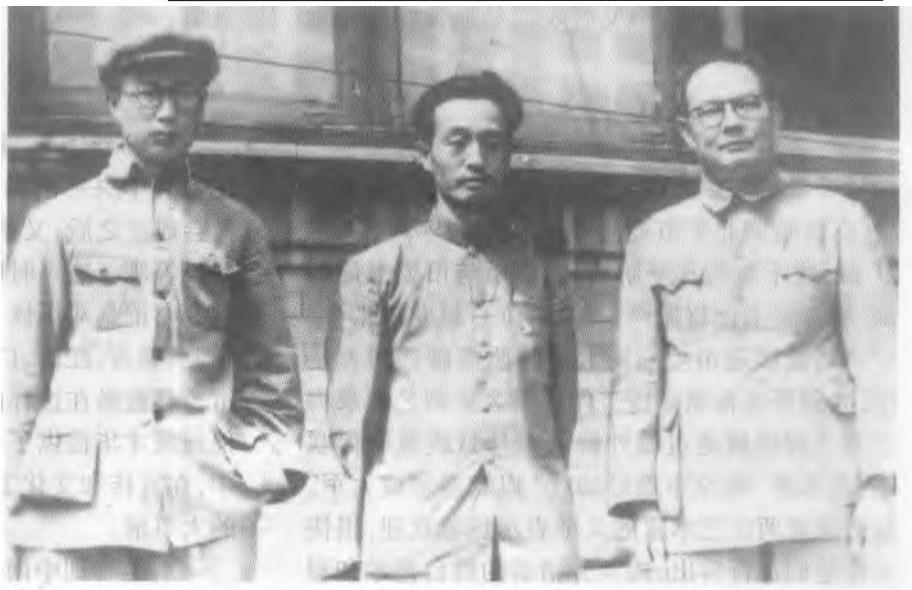
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解放区成为一种时尚。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方面,毛泽东准备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酝酿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把一大批干部派赴东北去建立根据地。

赵毅敏认为自己在东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东北情况比较熟悉,到东北基层去要比呆在中央机关会对中国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和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知道了,两人都想挽留他。

赵毅敏觉得,尽管自己身体欠佳(在苏联给他作肠道手术的医生曾断言他只有五年的寿命),留机关可能会舒服一些,但东北背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会为最终赢得内战、解



1949年4月,叶剑英(右 时任北平市长)、赵毅敏(中 时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李葆华(时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摄于北平

放全中国奠定扎实的基础,于是下定决心要到东北去。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杨家岭举办舞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来参加了。待毛泽东舞间休息时,赵毅敏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到东北工作的请求。

毛泽东说:“那好啊!开辟东北根据地非常重要,你要去东北开辟工作,我同意。”

“可李富春和陆定一同志都想把我留在他们那里,怎么办?”

“没问题,我同意了。”

1945年9月22日,赵毅敏协助林枫率1200多人经承德前往东北。凭借他娴熟的俄语和灵活的协调手段,说服了驻承德苏军城防司令,使其突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中关于凡苏军解放的我国东北城市,中共军队不得进入,需停留在城镇25公里之外的约定,允许中共军队着装骑马过城。

不久,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指示,称“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才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决定成立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由程子华任分局书记,萧克任军区司令员,赵毅敏先任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赵毅敏迅速把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胜利剧社”,接着又办起了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和联合大学,为党培养了近两万名新生

力量。内战爆发后,他又赴农村参加领导土地改革和清算减租。

(四)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赵毅敏调北平市委任宣传部长。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赵毅敏与市委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赵振声(李葆华)一起进驻北平。

赵毅敏随市委一班人进驻原德国驻华大使馆,立即开展各项宣传工作。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通过城外解放军与赵毅敏取得联系,表示要“唱全本最好的戏”以欢迎解放大军。赵毅敏对两位艺术家的义举表示热诚欢迎,很快安排他们进行演出,梅兰芳精湛的舞台艺术和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等优秀剧目开始展示在工农兵面前,由此促进了京剧艺术的空前发展。

赵毅敏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尽快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他作为兼职报社社长,对报纸从编辑、印刷到发行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毛泽东闻讯报纸即将发行,很快审定了发刊词,嘱赵毅敏尽快开印。

办报伊始,版面由赵毅敏和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赵振声负责审定,后来彭、赵工作忙了,就让赵毅敏一个人负责审定。赵毅敏常常和衣而睡,在睡梦中被叫醒起床审定清样,搞得他疲惫不堪。没办法,他只好拉上时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邓拓帮忙,两个人一人一天审稿。

赵毅敏作为市委宣传部长,要统盘考虑全市的宣传文化工作,制定具体政策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拿不准的问题要请市委定夺,重大问题还要请示中央、直至中央主席毛泽东。

赵毅敏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过去骂共产党骂得很凶的旧作家、旧文人,于是他向彭真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的答复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他们要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得他们都有职业、有饭吃,无非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不能给人以共产党一来就造成一些人失业的不良印象。赵毅敏和市委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指示,除对个别有极大罪恶的文人进行了必要处置外,对绝大多数旧作家、文人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使解放后的北平市呈现出一片安定祥和的新

景象。

(五)

1949年5月,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武汉,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长、《长江日报》社社长等职。这一时期的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邓子恢,第三书记是叶剑英,籍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赵毅敏在这样的大区担任宣传部长,无疑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他在任的4年之中,在宣传和文化工作上干出了好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当他看到中南文工团(原冀察热辽鲁艺人员为骨干)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连演奏《国际歌》都定不准音调,他就专门派人赴香港采购成套管弦乐器,使文工团可以演奏中外著名乐曲,许多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家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迅猛发展翘起了大拇指。

赵毅敏还主持决定在武汉著名的“西商跑马场”旧址上兴建实验剧场,包括歌舞、乐队、话剧排练场、舞台美术设计室及职工宿舍、食堂等永久性、综合性文化设施。面积之大令具体的项目负责人感到吃惊。1952年工程完工之后,成为全国一流的文化建筑,令各地文艺团体羡慕不已,也成为外国来访客人参观武汉的一个重点单位。

赵毅敏爱护和信任文艺家颇负盛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和张君秋在香港要求返回内地。但马连良因在香港负了债,把家底儿全部卖光了还差一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币1万元),托人向中南行政当局捎信请求借钱还债,保证回内地后如数偿还。有的人认为,马连良有抽大烟的坏毛病,人民政府不能给他个人借钱还债。赵毅敏解释说,“这样的人虽有些毛病,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我们把他们改造过来,他们不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台湾方面曾几次写信请他赴台他都不去,而愿到大陆来,单凭这一点,就证明他有一定觉悟,就应该借给他钱!”赵毅敏亲自做工作,及时借给了马连良一亿元钱,使马连良和张君秋都顺利地回到了武汉。赵毅敏还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促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

女从香港返回内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原籍河南、当时在西安从事演出活动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要求到中南六省组织巡回演出，以便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赵毅敏对常香玉的爱国之举非常支持，遂通知六省有关部门组织巡回演出。演出活动结束后，常香玉果然将演出收入捐赠出来买了一架飞机，名曰“香玉号”，由此常香玉名扬四海，同时也对中南地区产生了浓厚感情，表示愿意留在中南，不再回西北。

赵毅敏闻讯，耐心地向常香玉做解释工作，同时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通报常香玉在西北演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请求协调解决。赵毅敏主动送常香玉回到西北，习仲勋责成有关部门敲锣打鼓欢迎她，并请常香玉担任了豫剧院的院长。

在此前后，京剧著名演员赵燕侠赴武汉为军民演出，但中南报纸因为她为抗美援朝捐款少，指摘她“为富不仁”。赵毅敏闻讯后立即予以制止，明确地指出，捐款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人家的钱是凭自己的演出艺术挣来的，又不是剥削，决不能一看人家钱多，就认定是资本家，就“为富不仁”。赵燕侠听说赵毅敏的讲话后很受感动，后来成为减薪的带头人。

赵毅敏发展中南文化事业的几大板斧和高超的领导风格，得到了中南文化知识界的一致好评，也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毛泽东巡视武汉时颇有感慨地对赵毅敏等人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我在下边跑了一圈，其实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下边的意见，我把它综合起来了。”

（六）

1954年夏，中南局撤销，赵毅敏调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国际指导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1965年3月19日，赵毅敏（左二）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会见美国、英国共产党朋友，右一为王任重

分别协助王稼祥、陈毅工作。他主要负责中共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好交往。因为需要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宾，赵毅敏与毛泽东的接触机会又多了起来。

1956年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苏共牵头，以一批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名义出版一份理论杂志《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认为当时国际共运已显示出尖锐分歧，办一份刊物不仅不可能起到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作用，还可能成为苏共从理论上控制兄弟党的工具，但考虑到尽可能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大局，只好表示同意创办这个刊物。

后苏方提出要中方派人担任副主编。赵毅敏向中央建议，鉴于当前国际共运的复杂情况，以担任编委为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向苏共作了通报。

1958年3月7日至8日，杂志创刊会议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赵毅敏随中联部长王稼祥参加了会议。会议将刊物性质界定为理论性兼报道性，正式名称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人前去参加编辑工作，拟定了一个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可能认为，赵毅敏既有工作

经验,又有一定理论修养,还精通俄语,又晓得些英语,此重任非赵毅敏莫属,就亲自点了赵毅敏的名,并将这一意向随即告知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1958年5月5日至23日,赵毅敏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6月,赵毅敏和他的夫人凌沙等共6人先后乘飞机前往布拉格赴任。

果然不出赵毅敏所料,每逢编辑部开会,都要发生理论上的争论,内容之广,几乎涉及到每一篇拟发的文章。而苏联主编作风霸道,自作主张,常常引发理论论战。赵毅敏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在非原则问题上,尽可能尊重兄弟党同志的意见,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尊重,实际上起到了副主编的作用。

据赵毅敏回忆,从1958年杂志创刊到1960年两年间该杂志共发表中国同志写的文章12篇,并刊载过中共中央的一些决议,除了少数文章有宣扬极“左”的观点外,多数文章对捍卫马列主义、抵制苏共控制、宣传中国党独立自主的方针起到了好的作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国际共运发生更大分歧,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共对《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控制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编发了攻击兄弟党的文章。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以赵毅敏的名义致函杂志编委会,指出,鉴于该杂志已沦为苏共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工具,中共不能再对该杂志负任何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不久,先期回国的赵毅敏电示所有中国编辑人员撤回国内。

1962年,苏共和追随它的一些国家共产党对中国党的围攻愈演愈烈。这一年,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意共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中共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因他当时尚在布拉格,遂径直抵达罗马。当他得悉意共在大会上要公开指摘中共后,立即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应对,中央电示应旗帜鲜明地批驳苏共和它的追随者。赵毅敏连夜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在大会上,他义正辞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对国际共运的意见,并针对意共的指摘进行了有力回击。由于赵毅敏话锋犀利,观点鲜明,立即招致了一些追随苏共的共产党代表团发言人的攻击。但赵毅敏正气凛然,毫无惧色,赢得了不少意大利共产党员和工人的好感,请他签名留念的络绎不绝。当他参观意共报社时,工人们甚至印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来欢迎他。

伍修权先后率团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等五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都受到了与会的苏共代表及其追随者的围攻,甚至在伍讲话时采取跺脚、起哄、吹口哨等不礼貌做法,但伍修权仍泰然处之,总是坚持你闹你的,我讲我的,把要讲的话讲完。

12月26日,毛泽东69岁诞辰那天,他有感于国际风云的突变和赵、伍二人的大无畏精神,写出了气势磅礴的《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据赵毅敏后来的秘书田俊杰讲,诗中的“独”字,就是指的赵毅敏,而“英雄”则是毛泽东对赵毅敏不畏强暴的高度赞誉。

(七)

“文革”初期,赵毅敏先后八次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他的日子还相当好过。在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火爆的时候,毛泽东曾对赵毅敏等人说:“谁反对你们嘛,我不是反对你们的。”毛泽东还亲自对赵毅敏等人讲过他对文化革命进程的预期:“一年、二年、三年,三年收尾,顶多搞三年,震动震动,使大家把问题、思想搞清楚。”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亲拟了一个保护对象名单,其中也包括赵毅敏。

赵毅敏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厄运:在此后不久掀起的“抓叛徒”狂飚中被卷进了漩涡。赵毅敏被以“坐过牢即可能为叛徒”的逻辑诬为“叛徒”,从1968年5月起,开始过“监护”生活,先是和吕正操、伍修权、平杰三、蒋南翔、张学思等被“监护”在一个兵营里,虽然行动自由受到限

制,每天4角5分生活费也着实太少了点,但却免遭了批斗之苦。1975年5月赵毅敏被转移到陕西省乾县,在一个新开的电子元件工厂安排了工会和分发文具报纸的工作。也许是命运故意捉弄赵毅敏,可能由于毛泽东的忘却或无奈,或是“四人帮”从中作梗,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赵毅敏并没有得到“解放”和重新启用。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赵

毅敏才获准携眷回京,由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总书记的黄克诚亲自协调安排到中纪委工作,先担任秘书长,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副总书记,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在中纪委工作期间,他为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人的平反昭雪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2002年7月25日,赵毅敏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8岁。(责任编辑 李晨)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妹	39.00	7.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16.80	5.00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16.80	5.00
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	15.00	5.00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68.00	8.00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刘武生	38.00	6.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徐庆全	48.00	7.00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6.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华游胡	28.00	6.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7.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18.00	6.00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杜润生	35.00	7.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6.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洪	28.00	6.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6.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们祝东力	17.00	5.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野	29.80	6.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6.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安	26.8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6.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7.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35.00	7.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本书是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的姊妹篇。《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是从政治意义上勾勒新时期文坛回春的脉络,而本书则从史料的角度,以“纪事本末”的体例,梳理新时期文坛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苦恋风波”等的来龙去脉,解密了诸多早春文坛档案,是一部当代文坛的史料著作。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 我国变乱百余年来,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李宗仁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作者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本书将“文革”时期周恩来为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的史实展现给读者,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复杂历史和周恩来这位人民总理的理解。

《红墙大事》 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20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 钱江

春天来到京城的时候,作者整理《人民日报》史料,发现了拍摄于1948年春天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轻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社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随后我又发现,这位1938年投身革命的前辈竟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在她工作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她的生命轨迹怎样迤邐而来,又怎样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充满革命理想的新女性

卞仲耘,安徽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她的父亲原先很穷,少年时到钱庄学徒,渐渐积累经验自己开了一家小钱庄逐渐致富,后来当上了县商会会长。卞仲耘长大时家庭已经比较富有。

但是卞仲耘的青少年时代充满了苦涩。她出生不久生母即去世,父亲重男轻女,不雇奶妈,让独居居家的姑母和卞仲耘的三姐用米糊糊把她养大。最初,继母不让卞仲耘上学,卞仲耘奋力争取,又得到了姐姐的支持,才勉强读完小学和中学。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当了一个月的小学教师,一边补习中、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

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天,卞仲耘随同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这时又有热心抗战的同学拉她参加奔赴前线的“战地服务团”,她很快来到了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忱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组织将她作为培养对象,后来确定,卞仲耘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8年填写去延安表格之日算起。

经历武汉会战后,卞仲耘所在战地服务团进入国民党第31师进行宣传,逐渐转至大别山区。战地服务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卞仲耘。

进入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

不料,地下党组织很快被国民党破坏,有的地下党员被捕,卞仲耘等一批学生被校方勒令退学。党组织负责人要卞仲耘立即离校,前往内地大学继续求学。于是她来到了成都,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继续求学。

刚刚来到成都,与地下党组织还没有接上关系,卞仲耘有意识地订阅了一份在国统区发行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

没过多久,《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来到成都,应邀到燕京大学演讲,演讲大教室里挤满了人。卞仲耘闻知消息赶来,已进不了屋子,

就站在门外倾听。

这时,她发现身边还站着一个男同学,他们的目光对射到一起,互相打了招呼。他是新闻系学生,名叫王晶焄(Yao,音:尧),是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领导的青年进步组织负责人。卞仲耘初到燕京大学就公开订阅《新华日报》,引起了王晶焄的注意。

不久,王晶焄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吸收了卞仲耘。又过了些时候,文学研究会转为秘密青年进步组织“蓉社”,又一度改称“马克思主义小组”。名称几度改换,卞仲耘都是其中惟一的女性。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学生运动中,王晶焄、卞仲耘由一见钟情进而相知相爱了。

青年时代的卞仲耘,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不惜为之献身。她和王晶焄相约,待到大学毕业,就投身于推翻旧制度的战斗生活。

投身解放区新生活

王晶焄于1944年秋经中共地下党员、川大教授李相和著名民主人士刘清扬介绍,进入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图片部工作。王晶焄随后介绍燕京大学同学李肇基、陈浩、张学礼、孙贡三等中共党员进入了美国新闻处。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新闻处要发展建立西安分处,王晶焄又接受党的指派,到西安参加分处筹建。他到西安不久,接待了同样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指示到那里开展工作的何燕凌和宋琤。

抗战胜利后,美国新闻处决定迅速建立北平分社,王晶焄又一次领受中共的指派,前往北平。他于11月赶回成都,将卞仲耘接到西安结婚,婚后一起越过风陵渡进入太岳解放区。

王晶焄、卞仲耘夫妇同行者一共6人,3男3女,都是城市知识分子模样,很快就被解放区民兵截住了,送往太岳军区敌工部。王晶焄等向解放军首长详述了自己的身份和要去北平的目的。

太岳军区对这几位年轻人不摸底,既然他们要去北平,就索性先将他们送到上级军区——晋冀鲁豫军区,从那里再去北平也是顺路。

几位年轻人在解放军战士护送下徒步跨越中条山、太行山,于1945年12月下旬来到晋冀

鲁豫军区所在的武安县(现属河北)伯延村,住进军区司令部对面的招待所。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已经了解清楚了王晶焄、卞仲耘一行人的情况。他们住下才一两天,就有安徽老乡来看望卞仲耘。来者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记者吴象,他奉总分社负责人安岗的指示前来探问,看看是否有可能将王晶焄、卞仲耘留在分社工作?接着,分社领导安岗前来探望。又过了些时候,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张际春登门看望。他进屋上炕盘腿坐下,说话亲切,表达了希望这些年轻人留下工作的愿望。

晋冀鲁豫军区上下真诚欢迎知识分子的热情,使王晶焄、卞仲耘非常感动。

几天后就是阳历年底,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召开晚会欢度新年,军区后勤部为王晶焄、卞仲耘发了军装。军区的年轻人爱热闹,齐声叫着,要穿上了新军装的“大学生”出个节目,后来更是点名要卞仲耘唱歌。

王晶焄、卞仲耘站起来,来了一个男女声和唱《在太行山上》,博得一片掌声。正是这片热烈的掌声,使他们下定决心留在晋冀鲁豫,到新华



卞仲耘,约摄于1964年

分社工作。

战火中的《人民日报》编辑

1946年上半年,王晶珪、卞仲耘都在河北省邯郸度过,迅速熟悉了新华通讯社的工作。这年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首长邓小平、刘伯承决定创办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以原《新华日报·太行版》编辑人员为主体,组成《人民日报》编辑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负责人安岗原先就是《新华日报·太行版》成员,这时又率队归并于《人民日报》编辑部,同时继续承担向新华社总社发稿的任务。《人民日报》于这年5月15日在邯郸创刊。

当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关于月底撤回武安伯延,《人民日报》编辑部随同领导机关离开邯郸,在伯延不远

处的南文章村住了下来,不久又撤进山区,在太行山麓的河西村落脚,并且一直驻扎到1948年6月。

这年8月,卞仲耘生下了大女儿,她带着孩子来到了河西村,一直从事编辑工作。

1947年3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后停止播音。根据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责成《人民日报》组建接替台,在新华广播电台3月29日停播当晚即发出台号电波,次日全面接替播音。王晶珪被抽调参加“临时新华总社”,赶到河北涉县西戎村参加广播稿编辑工作。数月后新华社总社人员赶到,王晶珪继续留在总社工作。

卞仲耘留在河西村当编辑。这期间,又有一对颇有文艺天赋的青年夫妇丁丁和胡志涛来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他们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其中胡志涛还曾在延安协助冼星海抄写《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她和卞仲耘都喜欢唱歌,彼此很快就熟悉了。

丁丁、胡志涛夫妇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间不长,即调往育英学校。后来北平和平解放,胡志涛参加接管了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终生从事教育。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从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1949年初,卞仲耘在解放后的北平见到了胡志涛。胡志涛热情地邀请卞仲耘转入教育界,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当教师。

当教师,是卞仲耘少女时代的理想,她曾三次短暂地当过教师。建国之时百业待兴,卞仲耘觉得自己喜欢当一名教师,就接受战友邀请,来到师大女附中这所著名学校。

危险逼近的时候

在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教过语文,转而教政治,又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她有4个儿女,丈夫王晶珪从新华社调到中宣部,后来到社会科学院近代



卞仲耘给王晶珪的信

史研究所当研究员。

师大女附中创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进入这所中学,校长通常由老资格革命家担任。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卞仲耘深切地感到,“文革”爆发前的一年里,“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到“五·一六”通知一出,积蓄能量多年的潘多拉盒的盖子终于被打开了!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在校园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卞仲耘和她的一对儿女

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教师的尊严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

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其中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后人难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学女生之手,而且这样的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

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是无人制止。

批判会后,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沫。”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红卫兵运动带着“红色恐怖”呼啸而来。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们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最后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

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灾难迫在眉睫了。就在这天晚上,她对丈夫王晶垚说,按这个势头,学生打死她这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现在她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识的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

王晶垚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是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这天早上,倒是同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赶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负责人,报告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无奈的回答:“你先回学校去吧。”

惨剧在四十年前的8月5日发生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

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根本不予理会。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说朝她头上倒下来,胡志涛全身顿时就被墨水染黑了。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在狂热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结果即有女学生跑向学校木工房,拿来了待修的破课桌木腿,那上面还有没拔除的钉子。更有人跑向开水房去取热水,打算浇烫这些“黑帮”——当代教育史上残忍的一幕就这样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用脚猛踢这位不久前还受学生尊敬的副校长,大声喊:“装死!”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结果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

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

这天，另外4位校领导均受重伤。胡志涛遭受带着钉子的桌腿殴打，浑身血水，一度昏迷，后来发现被打成腰椎骨折。学校教导主任梅树民是50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衬衣被打出许多小洞，布丝深深嵌入肌肉。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她

时间长河默默流淌，如果到2006年卞仲耘还活着的话，她将度过90岁生日。作为京城名校校长，她会迎来无数学生的鲜花和祝福。

现在，作为“文革”开端红卫兵运动最初的殉难者，她留在历史照片上，以温柔清澈的目光注视今天的生活。

1948年春天，当卞仲耘作为一名《人民日

报》女编辑，在战火中勤奋工作的时候，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大卫和伊莎贝尔·柯鲁克不远万里来到太行山麓，用文字和照相机镜头记录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访问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也许是在无意中拍摄到卞仲耘的镜头。不久前，年近九旬的伊莎贝尔·柯鲁克教授将多年的若干照片送给报社。这使卞仲耘作为《人民日报》创建者之一的历史凸现得更加清晰。

河北省武安河西村的乡亲还记得她，将她的名字载入村史。

“文革”后，卞仲耘得到平反昭雪。在她的追悼会上，人们泪飞如雨。

卞仲耘为之献出了生命的学校，现在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这所名动京城的“市重点中学”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考入重点大学。

今天是多么美好，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是留下了血迹的。记住卞仲耘的名字，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不能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因为她的悲剧完全证明：“文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彻头彻尾完全荒谬错误的。

(2006年2月18日)

(责任编辑 李 晨)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

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再 忆 甲 申 之 警 钟

● 金铿然

前不久,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又有几名省部级贪腐高官曝光,他们是: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厚宏、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席、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跃。另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一份白皮书中谈到,从2003年12月至200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各级纪检机关给予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处分的党员达十六万四千八百多人,其中处级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又据最新报道,2005年因贪污腐败受到处分的省部级高官达13人。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审议批准了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到这些报道,我不禁想起了“甲申”——甲申之警钟!

公元2004年是我国农历的甲申年,干支一转为60年,上一个甲申为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后期,距离胜利之日不远。当时,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一篇长文《甲申三百年祭》,讲的是三百年前的甲申,即1644年的事,其中谈到明末朱氏王朝统治的极度腐败,同时也讲到甲申年农民领袖李自成攻入明朝京城之后,“开国”功臣们就以为大功告成而骄傲自满,大兴土木,建造王府宫殿,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至“大顺朝”很快就被由东北进关的满蒙八旗部队打败,不得不离开占领不日的北京向内地溃逃,导致最后灭亡,等等。

郭沫若文章发表后,当时身在延安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十分重视,号召仍在“整风”中的中共党员及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郭文所提出的三百年前李自成失败而灭亡的历史教训。其时,我们一些在大后方重庆地区的革命知识青年,也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号召,认真阅读了该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郭沫若文章(很快就印成小册子)内的历史情节和故事文字细节,现在已记忆不清,但毛泽东指出的文章的主题用意,至今仍

有深刻的印象。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壮大。在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内战较量中,得到全国包括蒋管区民主力量、革命学生运动及工人、农民斗争的支援配合,仅仅以三年多的时间,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以摧枯拉朽的破竹之势,取得了除台湾之外的全中国的胜利。

历史果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上演相似的活剧。在中国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更迭中,统治阶层掌权以后或迟或早必然会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天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事件曾向全国敲响警钟,震慑一时。当时最高领导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决。但是,严惩刘、张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腐化堕落问题,只是在舆论垄断的情况下,一些上层人员的腐化事实,一般干部和民众并不知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事件不时暴露出来,到了今天,贪官污吏自上到下层层出不穷,从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部长、省长、市长、厅长、局长、县长直到基层的镇长、乡长、村长,各行各业贪污腐化似乎无所不在,以至老百姓中有这样戏谑性的顺口溜:“一个某某某(大贪官的姓名)倒下去,千万个某某某站出来。”

中国的经济仍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而当代中国的贪污腐化现象却也“与时俱进”,具有了“现代化”的表现。不少贪官污吏损公肥私,非法攫取国家财产,把国家的,也就是老百姓的钱财搜刮到私囊之中,然后千方百计把掠夺的财富转移到国外银行,并购买高级公寓和别墅豪宅,为他们外逃后以及他们的老婆、子女后代享受。据媒体公布的数字,至少有四千多名贪官污吏外逃,携走(主要是事先转移)非法掠夺的赃款估计至少50亿美元!另据国外报刊透露,中国有的外逃贪官和官商勾结而发家的“大款”在美国加州等地

购买豪华别墅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现款当场一次付清，令一些美国房产商瞠目。因为在西方购置房产，一般都是先付一笔现金，其余款项以后分期支付。

如此猖狂的贪官污吏，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不但在政治、经济领域，并且出现了更广更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医务、教育、学术腐败等）现象。这是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引来的，或者某领导人号召或提倡的结果呢？当然不是的。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都是开放的，它们也有腐败现象，但似不如我们中国这么“名震全球”。而在中国，自毛泽东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或文章中，从来也都是反对腐败的，有的领导人还把腐败问题同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命运联系在一起。当今在职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下级和群众讲话，从来也都是反腐倡廉的。但是，有的领导人公开讲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出现一些昨天反贪污报告时冠冕堂皇，今日却因自己的贪污受贿被曝光而锒铛入狱的事实。这里有一个言行不一的问题。一个领导人口头讲的头头是道，实际他做的完全是为了一己（一家、一姓、一伙、一帮）的私利，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在这样口是心非的人领导下，反腐肃贪的实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另外一个问题可以说是关键，就是如有的明眼人所提出的，一个再高明不过的外科医生是很难为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的。他或者可以为自己腿上、脚上的一个小疣动手术，但对长在自己肺、胃、肝、肾等部位的肿瘤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说，只有实现人民群众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只有实现社会监督（包括各种媒体等舆论的监督），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的体制，使权力受到多方面的、严格的制约，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改变中国官员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这些并非我的创见。

让我们再三再四地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在延安与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

上一个甲申的第二年，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自重庆到延安访问，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一次，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话，问黄老来延安后的感想怎样。黄老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溘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老人做了一些说明之后接着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

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讲这番话是1945年7月，在延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也一直主张并要求在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且对“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制度表示首肯。这是当年在大后方读过《新华日报》的一些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的。

但是，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我以为毛泽东主席大概淡忘了他自己关于跳出“周期率”要走民主“新路”的谈话，尤其是1957年大规模“反右”，整垮至少50多万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之后，思想上却以“马克思+秦始皇”自诩，“心血来潮”，一言九鼎，以致“三面红旗”、“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更不用提“文革”十年了。而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昔日文豪郭沫若，在建国后，一切以“上”意是从，已毫无谏言可进了。

1883年辞世的马克思，若地下有知，发现有后人将他同中国的秦始皇并列在一起，不知有何感想。根据马克思一生实践和他的著作，他是绝对不齿于同公元前三世纪古代东方皇帝“为伍”的。上点年纪的人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他们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的社会，作为他们理想的新社会的。热爱自由和人权的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同意对人民群众施行专政的。

至于秦始皇，我这里想起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唐末一位诗人章碣写的一首七绝，诗曰：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诗概述了史实：秦始皇（祖龙）焚书坑儒为时不远（坑灰未冷），就有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刘邦、项羽在东边起来造反了。

中外历史证明，秦始皇之类的极权专制，绝不可取。但当时的当局者不以为然，以至由“反右”而发展到“文革”，除极少数人外，全民族遭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甲申之警钟不可忘却。时至今日，自由、民主、法治的世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我们已经耽误了时日，非急超直追不可。中国一定要走上“新路”——民主之路啊！

（责任编辑 杜晋）

“老高三”四十年

● 吴 敏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偏袒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全部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都是一个使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拐点”。俗话说“六六大顺”,然而,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我虽然不知道其他“老三届”和似乎很健忘的一般中国人,会不会将1966年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击而留下的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地疼痛一样。

“老高三”至今已整整40年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当然,极少数“老高三”或因出身于豪门、或因个人运气好而在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很顺利、很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

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我在和此类“老高三”接触时,一谈起1966年,他们亦是耿耿于怀、感慨系之。显然,这种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老高三”现象,浸透着浓重的社会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绵延40年之久的“老高三”社会文化现象呢?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种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正是在“老高三”们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需要缺乏理性、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正处于青春躁动期,是一群傻小子,最适合于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包括“老高三”在内的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在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看来,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标,几十万“老高三”、几百万“老三届”牺牲自己的学业,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好机会”。伟大领袖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仅仅在师范学校毕了个业,可他老人家的雄才大略及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与之媲美呢?

记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们班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冲刺。我们的毕业考试、体检、

填报志愿等程序早就搞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十来天后就要冲上高考的战场了。由于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考前的畏惧感，而是满怀愉悦的心情企盼和设计着美好的未来。尽管同学们复习功课都很认真、很下功夫，但这主要不是出于害怕考不上大学的后顾之忧，而是想力争考一个好学校，以检验并证明一下自己的功底、能力和价值。有的已经被提前选送到新华社等单位去做“机要工作”的同学，这些天来实际上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只等着过些时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学们刚刚坐到教室里准备复习时，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味俱有，很不是个滋味。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准备迈入“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推到了黑云翻滚、风狂雨骤的野地里。而且，同学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按当时“文化大革命”风雨乍起、惊雷闪电的态势，半年之后进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气氛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在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中学里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较之大学里要高很多。我们班的化学老师赵崇印，就是在被初中班的同学批斗之后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极大侮辱，硬是在单身宿舍里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而自杀的。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去到现场，只见屋子里的墙壁上尽是

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我们的老校长郑云萍在挨批斗之后也跳进了学校的水井里想自杀，因被发现得早而没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弄得他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所在的那个不大城市的各个中学几乎都发生了教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有所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经历了多场批斗，疲累至极，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学生拖在地上四处批斗，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不罢休，终于被活活地拖死了。全国各地中学里发生的情况，基本上也大同小异。而且，中学里的“革命造反组织”（我校的主要组织名称就叫“反到底”）还很快就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联系到了一起，又是游行示威、围攻党政机关，又是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将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搅扰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们都被搞得威风扫尽、“臭不可闻”。实践证明，被“红卫兵小将”等高帽子



和受伟大领袖亲自检阅等无比荣耀激励得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自己心中的“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高考“推迟”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由“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升级为翻来覆去的“夺权”和愈益剧烈的“全面内战”。我校所在的那个地区和城市的“夺权”和“反夺权”(并不是反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反对由另一派夺权,要求由自己这一派夺权)斗争非常激烈,在相当长时间里你来我往地呈僵持和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也逐渐升级,发展到了动用迫击炮、装甲车等武器真枪实弹地互相开火、攻城掠地,双方背后的军队实际上也卷进去了。有的军人常常换上便装、带上枪支弹药,参加到所在一派的“武斗小分队”里去“执行任务”。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一段时间里,三天两头有打伤人、打死人的消息传来,大家当时似乎都已经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时不小心踩上了自己这一派埋下的地雷,当场就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学读高三,他们都曾被对立一派的“武斗小分队”抓了俘虏,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斗”甚至比我们那里还要厉害得多。在这种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原先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根本没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到了1968年后半年,严重混乱的局面稍微平稳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券在握,不再需要“革命小将”们去上火线打头阵了。但是,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这对于掌权的新贵们反而成了一种负面力量。为了把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开去,最高决策者采取了一种很便捷的办法,就是把“革命小将”们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我所在山西省的工矿企业比较多,中学生原籍农村的也比较多,所以,在1968年没有将“老三届”整体发配到农村去,而是将其分作了两部分:父母系农村户

口者回老家务农,父母系城市户口或极少数情况特殊者被分配至厂矿当工人。父母都是农民的我,本该回老家“修理地球”,侥幸遇到了一个机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高三”为了生存而“飞鸟各投林”,累累若丧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着准备高考的情况完全成了遥远的隔世之梦,想都不敢想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散伙分别、各奔东西时,大家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连一张临别的全班集体合影照都没有留下。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渡过,除师范之外的中专学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数量也很少,许多县都是只招一个高中班,很难考),五年之后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至于恢复高考,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66年之后11年的事情了。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到了“而立”之年,绝大多数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很艰难、很窘迫,有几个人能重振鸿鹄之志并丢老弃小、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惨重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过几个月以后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唉吁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我爱人也是一个“老高三”,她的一个同班同学1977年时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下了很大决心准备参加高考以改变自己眼下的穷困处境,但步行几十里来到县城以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心把务农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受煎熬。于是,他找到我爱人的办公室,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后,身心疲累,情绪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根本没有去考场就打道回府了。我爱人的另一个同学倒是参加高考并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学,老婆、孩子在家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只好办了退学手续。类似此二位的经历,在“老高三”中决不在少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班30多个同学,我所知道的在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的只有4位,约占十分之一。而且,恢复高考后各大学录取学生有

一个未成文的默契,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的年龄最大者,他们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学。我们班那4位参加高考的同学,有一位情况特殊上了北京大学,另三人上的都是本地的末流学校。可以想像,当绝大多数“老高三”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者纷纷走进了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近乎全部地顺利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学者,基本上都到农村去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四清”,其在校学习时间和1965级大体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1964级“老五届”曾亲口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个高中毕业,和你们差不多。”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不久,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20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官运亨通,而且由于他们的荫庇,其远近亲属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摔到了社会下层;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又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都要摊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在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家里住房子需要掏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各种各样“倒霉事”的队伍里,往往都能看到“老高

三”的身影。当这些“老高三”远远地仰视着那些实际上并不比自己在学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时,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过于巨大和强烈的精神刺激、心理压力,使得相当一些“老高三”愈来愈承受不住了。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姓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弱书生,学习很用功,成绩很优秀,性格内秀而在政治上、理论上比较早熟。记得大约在读高二的时候,他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啃大部头的马列著作,被同学们戏称为“宋克思”。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必定能考上名牌大学。1968年以后,他到一个工厂当了工人,被分配的工种是开天车。因其胆子比较小,对高空作业很恐惧,他多次向领导要求改换工种,但那个“大老粗”的顶头上司以“不安心工作”为由,硬是不同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下了很大功夫自学中医,并在全县的统考中名列前茅,具备了行医资格。他以此为据要求到厂医务室去工作,领导上还是不批准,仍然让他去开天车,这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熬不出头了。再加之家庭关系又不太和谐,所以,他于1976年一气之下回到乡下老家,关起门来上吊自尽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文静而寡语,1968年以后到煤矿当工人,在井下当了一年多挖煤工后被抽调到了本矿的科室工作,命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其妻子没有上过什么学,比较粗野,家庭关系很糟糕。这位同学到煤矿工作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又要没完没了地受老婆的窝囊气。在气上加气、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终于在1980年代末期跳楼自尽了。这两位同学寻短见的直接原因都与其特定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以及性格弱点有关系,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导致他们如此结局的真正根源实际上还是1966年那场灾难。可以想见,在他们两个最后下决心走上绝路、命归黄泉之前,一定作过长期、反复和痛苦的思想斗争,一定会多次诅咒1966年那个令其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可恶的年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两个在1966年正常地上了大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下转第43页)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沉痛悼念李庄同志

● 金 凤



李庄（建国初期）

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新闻界的前辈李庄同志不幸于2006年3月3日辞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李庄同志德才兼备，为党的新闻事业特别是《人民日报》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庄同志是我第一位上级，我是在李庄同志严格的训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缅怀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李庄同志是1948年12月，在刚解放的河北省良乡。当时，北平即将解放。上千名大学生齐集良乡，准备参加北平、天津的接管工作。中共北平市委在良乡成立，人民日报社先遣组也已到达良乡。我离开清华大学奔赴解放区，到华北局城工部报到后，一路行军来到良乡，经北平市委组织部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采访科科长兼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的李庄同志也风尘仆仆赶到良乡来了。

李庄同志那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已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干部了。他穿一身棉军服，身材高大，文质彬彬，说话从容不迫，态度平易近人。闲谈中他提到他父亲是徐水县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我听了大吃一惊。

我1947年在上海交大入党，曾深深为自己出身江南水乡地主家庭而苦恼。李庄同志大概看过我档案（到解放区写的一份详尽的自传），了解我的情况，也了解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心理。他笑笑说：“家庭出身我们不能选择，但参加革命的道路，我们可以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劳动人民出身，并不妨碍他们是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我们队伍中有的领导同志也出身剥削阶级，但他们彻底背叛了出身的阶级，很好地领导了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背上家庭出身这个包袱呢？”

李庄同志真善于做思想工作，见面不久，便解除了我的思想负担。从此，我可以昂起头，挺起胸，全身心投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李庄同志告诉我们，他上过农业专科学校，酷爱文艺。抗战爆发，立即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

22岁当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特派记者,25岁当了编委和采访组组长。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位新闻界前辈来领导我们工作。我们几个北大、清华、燕京的大学生,自以为读了不少书。不料,李庄同志的文史知识十分渊博。他和我们谈唐宋诗词,谈《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如数家珍。他和我们谈政治,谈历史,谈抗日战争的艰苦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我们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党的城市政策,谆谆告诫我们,学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做好党报记者工作的第一步。

1949年1月,李庄同志带了陈迹和我,去北平郊区长辛店采访,这是我踏上记者岗位的第一次采访。

我们背着背包赶到长辛店。街上秩序井然,李庄同志带着我和陈迹访问了军管会主任,了解长辛店解放和著名的铁道机车修理厂恢复生产的情况。

陈迹是北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上大学前曾工作过,比我老练。李庄同志布置他单独采访一些工人。我刚刚20岁,刚离开校门,没有一点社会生活经验,不知道怎样采访。李庄同志看出我的紧张和为难,带着我去登门访问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斗争的老工人、地下党员杨宝嵩。

杨宝嵩五十多岁年纪,穿一身打满补丁的黑色棉衣。他一见穿着军装的李庄同志,像见了亲人那样高兴,笑着伸出双手和李庄同志握手,李庄同志也用双手紧紧握住老杨的双手,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那样亲密地聊起来了。我口袋中装着一个用解放区造的粗纸订起来的小本本,准备记录采访的谈话。只是,那些家常话又怎么往小本本上记啊!

只听李庄同志尽在问老杨身体好不好,他老伴身体好不好,国民党撤退时全家受惊没有?解放军来了粮食供应怎么样?工厂开工没有?工友和家属对共产党、解放军都说些什么……

老杨一一叙说着,就像和老朋友聊天那样。渐渐地,他说到1923年京汉铁路的罢工斗争,讲到坚持三十年艰难险阻的地下斗争,他越讲越兴奋,越讲嗓门越大。我听得入神,完全忘了往采



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李庄采写的特写《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访本上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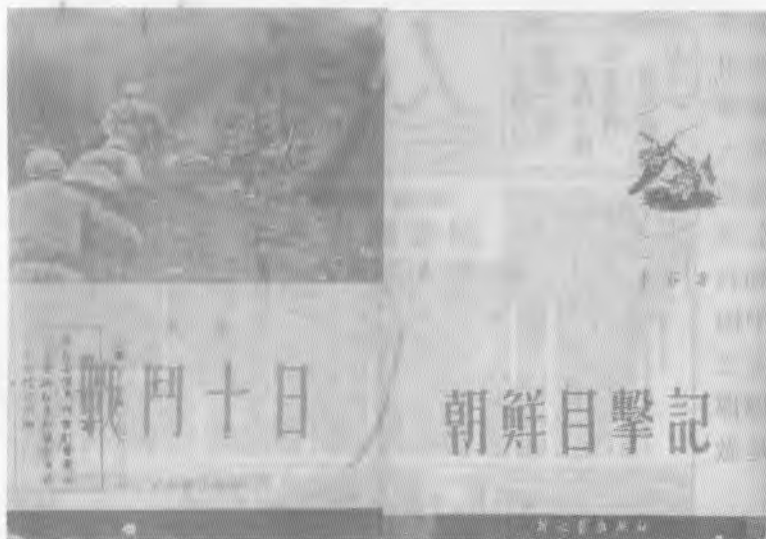
他们谈了足足有三小时,我的小本本上一字未记,根本没好意思从口袋里掏出来。

回来路上,我问李庄同志:“这是采访吗?”李庄同志郑重回答:“这怎么不是采访呢?采访就是调查研究,就是要和采访对象交朋友,和他平等地、同志式地讲心里话,用我们河北话来说,叫拉呱。”

我这才开了窍,原来,采访是这样进行的。要善于和采访对象交朋友,讲心里话,这也成为我一生进行采访工作的准则。

李庄同志当天晚上,便写了杨宝嵩访问记,发表在2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上。

我学着李庄同志的样子,到工厂找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座谈会,个别谈话。像李庄同志那样,恭恭敬敬地把工人同志当成自己的老师、朋友,和



李庄赴朝采访通讯集

他们亲切地聊天,他们果然也像对待自己人那样和我谈了很多情况。

我整理了采访的材料,在李庄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写了两篇通讯,发表在2月7日的《人民日报》(北平版)上。

1949年1月31日,我们坐了大卡车随解放军进入古城北平。2月3日,李庄同志指挥我们新华社北平分社的记者陈迹、柏生和我等,进行了解放军入城式的采访报道。

1949年的北平,全国性的会议特别多。我是人民日报社最年轻的记者,分工采访学生、青年和青年团的工作。2月,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我是学生运动过来人,对学运报道情有独钟,便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的报道。李庄同志看了说:“一个学生代表会的筹备会你写了两千多字,学代会正式开会,你要写多少字呢?”他大笔一挥,将两千字压成两百字的短讯,使我很难为情。他严肃告诫我:“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不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方面军,主力军是工农兵。采写什么内容,写多少字,必须从政治出发,不允许带任何个人情绪。”这教训,我牢牢记下了。

李庄同志对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根据分工,我参加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采访报道,又和陈迹一起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工会代表会议的报道。从新闻、通讯、特写到评论全包了,大家受到很大锻炼。

9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代表的专访,访问了刘伯承、粟裕、冯文彬和学生代表。李庄同志参加政协会议采访,每天写一篇特写,包括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毛主席讲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篇特写,他将那句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讲话传遍全国人民。他同时还指挥对政协代表的采访。采访名单中原来并没有刘伯承同志,可能考虑到刘伯承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年龄也较高。李庄同志根据平日分工让我访问作为青年将领的粟裕、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和学生代表。我到中南海访问粟裕同志,饭桌上见到了中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家

刘伯承同志,萌生了想访问他的强烈愿望。回来后我报告了李庄同志,李庄同志支持了我的要求。他采访过刘伯承同志,写过为刘伯承同志祝五十寿辰的文章。他亲自打电话给刘伯承同志。我终于能顺利访问了这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并且和他谈了八小时。遵循李庄同志的教导,我以小学生的态度,恭恭敬敬记下刘伯承同志谈二野在解放战争中的经历和作用的精彩讲话,又访问了二野代表团,用刘伯承同志说的“四战之地,四战之军”作为标题,写了文章送刘伯承同志审阅。刘伯承同志看过文章,用毛笔作了修改,最后写“刘伯承阅”几个大字。李庄同志看了十分高兴,他嘱咐我将原稿保留,另抄一份送排字房发排。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来信,以为作者是资深军事记者。李庄同志立即告诫我:“千万不要骄傲。归根到底是刘伯承同志讲得精彩,你不过是忠实地记录下来罢了。”事实果然如此,我的确骄傲不起来。同时,我还是十分感谢李庄同志对我的“敲打”。

1949年10月1日,李庄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同时又指挥了人民日报社记者参加开国大典的采访报道。我有幸在金水桥畔整整站了十二个小时,写了一篇特写。

这一年,我写了一百多条新闻,四十多篇通讯、专访、特写和评论,在采访写作方面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始,这和李庄同志的帮助、支持是分不开的。李庄同志又及时提醒我,不能停留在北京作一些短、平、快的采访报道,必须到全国各地,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

1950年起,我开始到全国各地采访,稿件的质量有所提高。

我一向喜欢文学,看的文艺作品很多,不大注重理论学习。李庄同志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批评了我。他告诉我,他和副总编辑安岗同志、编委肖航同志是太行山来的老战友,深感战争时期不能系统学习理论,为了弥补这一缺点,他们三人成立了学习小组,互相监督,彼此相约每天不论工作多么繁忙,必须挤出一两个小时系统学习马列原著。他说,要当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刻苦攻读马列著作。

我听了十分惭愧,下决心挤时间攻读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并开始啃《资本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庄同志作为《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奔赴前线,在十分艰苦、危险的情况下,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也是我学习的典范。

凭李庄同志的实力和爱好,他也许更愿意当一位名满天下的名记者和作家。李庄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甘心牺牲个人的兴趣爱好,服从组织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长期当内勤值夜班,勤勤恳恳地当一名老黄牛。

从朝鲜前线回来,李庄同志调总编室工作。后来又去莫斯科负责《苏中友好》杂志的工作,一干好几年。

1960年,李庄同志调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当主任。1958年《人

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各地分社合并,我离开河北记者站调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当编辑,主要写评论,也做一些农村调查工作。我偏爱记者工作,不安心当内勤,曾在李庄同志面前发牢骚,说让我写评论是“赶着鸭子上架”,吃力不讨好。李庄同志严肃批评我,不能凭个人兴趣爱好,对工作挑三拣四。一定要根据工作需要,服从组织调配,即使放弃个人兴趣爱好,也是应该的。他派我先后去山西武乡、北京郊区怀柔调查《农村工作十二条》、《农村工作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我了解了农村很多真实情况,获得很多宝贵资料,增强了我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了解。1962年,李庄同志又安排我参加报社的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地区羊头岗村调查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冒风险的问题。我请示李庄同志,对包产到户究竟应该怎么看?李庄同志谨慎地说,可能是一时权宜之计,也可能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有了这个指导思想,我和黄植、安子贞同志一起写的调查报告,谨慎地把巩固集体经济放在首位,把包产到户作为一部分农民的要求。房山县委有同志向北京市委告状,说《人民日报》调查组鼓励农民搞包产到户。彭真同志看了调查报告,说调查组还是把巩固集体经济放在首位嘛。



李庄和家人在一起

这才避免了一场政治风波。

李庄同志还安排我一些采访任务。他对写稿提出很高要求,他说:“文章必须有新意,切忌套话空话;必须有闪光点,切忌淡而无味,老调重弹”。

当时贵州省出现了一位坚持侗寨十三年,为侗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的民兵英雄吴兴春。新华社贵州分社写了通讯,李庄同志看了不满意,让我去贵州采访。我跟班采访吴兴春,又访问了他周围干部和很多侗族百姓,写了两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李庄同志毫不客气地砍了一半,他说:“发一个版足够了,不能随心所欲。”这当然又是对我的一番“敲打”。

当时正值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写文章有许多禁区,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能写。我请示李庄同志,究竟能写什么?李庄同志巧妙回答:“除了不能写的,都能写!”这让我很为难,我小心谨慎地说:“是不是能写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李庄同志说:“知识性可以写,趣味性不行,免得被批为帮闲文学。”

“文革”灾难,李庄同志和报社许多领导同志一样受到很大冲击。他曾在报社搬运组搬运新闻纸,在图书馆打扫清洁卫生,到干校干重体力劳动……我则坐牢五年,出狱后和李庄同志同住煤渣胡同宿舍,见面时不能多谈,相互点点头而已。

粉碎“四人帮”后李庄同志担任总编辑,仍长期做夜班工作,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在记者部当记者,一次为稿子去见他,问他“长期做夜班,吃得消吗?”他摸摸有些灰白的头发,宽厚地笑笑:“还行,还行。”真是位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啊。

李庄同志离休后仍辛勤工作。我有时去图书馆借书,总看到他在伏案查资料。他写了《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难得清醒》等好几本书,内容深刻,资料翔实,观点平实而又犀利。我认真拜读,受益匪浅,也有同感。李庄同志说到,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磨练,慢慢养成了“自以为非”的思维逻辑。凡事即使想不通也总以为是自己错了,党中央、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他慨叹,要真正做到独立思考,保持清醒头脑非常不容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经历进行了深切沉

痛的反思后的肺腑之言。

90年代中期,李庄同志担任了如今在读者中有相当影响的《炎黄春秋》杂志编委。《炎黄春秋》的同志们说,李庄同志十几年来给杂志社出了许许多多的好主意。人民日报社不少老同志为《炎黄春秋》写稿,我也写了几篇。李庄同志对此颇为赞许。

最后一次见到李庄同志可能是在世纪之交,2000年左右。我去协和医院看病,恰逢李庄同志看完病从医院出来,我们在马路边树荫下交谈几句。李庄同志低声告诉我,他从一位长期主管农村工作的老朋友那里听到,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农民有好几千万人,数目实在惊人!我听了也大吃一惊。李庄同志当时神情凝重,一副忧国忧民的沉痛!我也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和老领导握手告别。不料,这竟然是最后一面。李庄同志住院期间,我几次想去探望。听赵培蓝同志说,李庄同志见到老同志去看他,常常心情激动,流泪不止。医生认为不利于治疗,谢绝探望。我听了只得作罢。现在想来,还是觉得遗憾。

众所周知,李庄同志才华出众,品德敦厚。记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提到“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这种社会现象。和李庄同志交往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论别人的是非。一位和李庄同志同事多年的老同志为人苛刻,“文革”中表现不好,附和“四人帮”说什么“长期路线斗争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等谬论。同志们对他多有议论,李庄同志只是摇摇头。李庄同志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在工作上、思想上对下级要求严格,我多次受到他的及时“敲打”,受益很大。

古人有“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立德”为上。李庄同志在“立功、立言”方面贡献巨大,“立德”方面尤其突出。李庄同志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送给李庄同志和赵培蓝同志的条幅,上书“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我以为,出自《道德经》和《易经》的这两句名言精确地概括了李庄同志光辉的一生。不揣愚陋,谨以这八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和结束语:“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高风亮节,山高水长。”李庄同志安息吧。

(责任编辑 杜晋)

阿 Q 与 朱 元 璋

● 李 乔

虽说小尼姑骂了阿 Q 断子绝孙 ,但实际上 ,阿 Q 的子嗣甚多 ,血脉甚是绵长。我在《瓜葛——红卫兵的“革命”史》一文里 ,就曾考证出当时的红卫兵是阿 Q 的遗族。近来 ,我不再查考阿 Q 的子孙了 ,而是查考起阿 Q 的祖宗来了。

阿 Q 说他姓赵 ,我便想 ,他也许与稍逊风骚的宋太祖有些瓜葛 ,但终于很失望 ,没啥关系。也是 ,未庄的赵太爷连阿 Q 姓赵都不认可 ,更甭说赵皇帝是他祖宗了。但是 ,我却发现 ,阿 Q 与朱洪武大有关系。我怀疑 ,洪武爷朱元璋才是他的本家 ,是他的嫡祖 ,虽然洪武爷姓朱。

我有重要的证据这么说。

先要读一读《阿 Q 正传》第二章《优胜记略》的介绍 :

阿 Q “先前阔” ,见识高 ,而且真能做 ,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 ,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的是在他头皮上 ,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 ,而看阿 Q 的意思 ,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 ,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 ,后来推而广之 ,“光”也讳 ,“亮”也讳 ,再后来 ,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 ,不问有心与无心 ,阿 Q 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 ,估量了对手 ,口讷的他便骂 ,气力小的他便打……这段介绍须细读 ,读了再去读朱元璋的“行状” ,便立马可以发现 ,这个阿 Q 太像朱元璋了 ,或者反过来说 ,这位朱皇帝太像阿 Q 了。

朱元璋也是“见识高 ,真能做”。他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给汉族人争足了面子 ,建立起了明朝大帝国 ,“几乎是一个完人”了。此其一。其二 ,阿 Q 与朱元璋都有或曾有过一个颇顶的观

瞻问题。阿 Q 的头皮上有几处恼人的癞疮疤 ,上面无发、发光。朱元璋也曾有过一个无发、发光的脑袋——他微时做过和尚。本来 ,朱元璋若是终生为僧也便罢了 ,但他后来造反发了家 ,当了皇帝 ,这曾经的秃头便成了心病了 ,因为在一般平民眼里 ,光溜溜的脑袋总是不大好看的。但是 ,朱元璋与阿 Q 在上述这两点上的相似之处 ,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也是最相似的 ,是他们二人都极端的讳“光”讳“亮” ,虚荣 ,护短 ;而且 ,谁若是犯了他们的讳 ,必遭惩罚——阿 Q 是非打即骂 ,朱元璋是让你脑袋搬家。

请看看朱皇帝是怎么讳“光”讳“亮”的。

徐帧卿《翦胜野闻·纪录汇编》卷一三〇记 :

太祖多疑 ,每虑人侮己。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尝作贺表曰 :“光天之下” ,又曰 :“天生圣人 ,为世作则”。太祖览之 ,大怒 ,曰 :“腐儒乃如是侮朕耶 ! ‘生’者 ,僧也 ,以我从释氏也。‘光’ ,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 ,即斩之。”礼臣大惧 ,因上请曰 :“愚蒙不识忌讳 ,乞降表式 ,永为遵守。”帝乃自为文 ,传布天下。

文中的太祖就是朱元璋。杭州府学的徐教授本来做的是马屁文章 ,一片好意 ,但不承想犯了朱元璋的讳 ,竟遭到杀身之祸。朱元璋杀人的理由很明白 :你徐一夔说的“生”字就是谐“僧”字 ,僧就是和尚 ,这是说我曾皈依释迦牟尼当过和尚。你说的“光”字 ,就是说我的和尚头又光又亮 ,是辱我。“则”字是骂我是贼。如此这般辱我骂我 ,正犯了大不敬我之罪 ,能不杀你 ! 天子雷霆一怒 ,百官瑟缩 ,礼部大臣赶紧请示避讳条例。这位朱皇帝也真是把此事看得天

大,竟亲自撰文写下哪些文字是自己忌讳的,并传布天下执行。

《列朝诗集·甲集》卷十三《张孟兼传》记:

(张孟兼)出为山西副使,布政使吴英,钟山僧也,孟兼负气凌之,屡与之争,上曰:“是与我争耶!”逮至京,立箠死。

文中的“上”,即朱元璋。布政使吴英当过和尚,副使张孟兼与之屡有争执,朱元璋不问是非曲直,便疑心张孟兼是在凌辱和尚出身的吴英,进而便认为张孟兼的矛头是冲着自己的。张孟兼便被捶楚而死。

陈田《明诗纪事·甲蘸》卷六记有多条明朝文人因著文写诗犯讳而被杀的史事,其中有三条是讲犯了朱元璋的和尚秃头之讳被杀的事。一条是:“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句,诛。”因为“‘生知’音近‘僧知’也”。再一条是:“祥符县学训导贾翥,为本县作贺正旦表,内用‘取法象魏’句,诛。”因为“取法”音近“去发”也。另一条是:“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县作贺万寿表,内用‘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因为“‘法坤’近于‘发髻’也”。前一条是犯了朱元璋怕听和尚一词的忌,后两条是犯了朱元璋怕人说他曾剃度头秃的忌。发髻,就是剃头、秃头的意思。后一条中的许元先生,本来写的是敬祝朱元璋万寿无疆之类的拍马文字,乃是出于一片忠心,但没想到贺词没有摆弄好,结果被马蹄子踢死了。

《明史·郭兴传》还记了这样一件事:大将郭兴的弟弟德成一次侍宴酒醉,脱帽谢君恩时,朱元璋看到他的头发又短又少,说道:“醉风汉,发如此,非酒过耶?”德成答道:“臣犹厌之,尽薙始快。”朱元璋听后默然不语。德成酒醒后,“大惧,佯狂自放,剃发,衣僧衣,唱佛不已”。朱元璋知道后说,原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今实为之,真风汉也”。这个郭德成为何“大惧”并剃发为僧?就是因为他知道朱元璋忌讳提剃头一类事,所以,当他醒悟到自己所说的“尽薙始快”犯了大忌后,为了避免杀头之祸,便赶紧装疯剃度为僧。

从上面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朱元璋特别害怕别人涉及他当过和尚的事,他对“生”、“光”、“髻”这几个字眼尤为敏感。在他眼里,

说这几个字,就是在揭他当过和尚的短,就是嘲笑他的头曾经秃过,亮过。这个忌讳成了他大兴文字狱的原因之一。阿Q本来只讳说“癞”,后来“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朱元璋也如是。开始,他大抵只是讳“僧”,进而讳“生”,再后来连“光”、“发”、“髻”也讳了。比较一下阿Q和朱元璋所讳之事、所讳之字,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说这阿Q的祖宗,不是朱元璋又是谁?当然啦,阿Q的祖宗未必只有朱皇帝一人,据我推测,一定还有不少,且待来日再考。今日的认祖归宗,姑且先认下一个朱皇帝。

阿Q与朱元璋如此之像,使我又生出一种推测,我想,鲁迅先生熟读明史,他写《阿Q正传》时,脑际中恐怕总是晃着朱元璋的影子的,也许就是把朱元璋做了原型之一的。这也就是说,发现朱元璋是阿Q的祖先的,鲁迅先生恐怕是第一人。我的这篇小文不过是在给《阿Q正传》做些笺注罢了。

其实,阿Q还有其他许多与朱元璋相同的地方。比如,阿Q梦想中的革命便是乱杀一气,不仅杀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连与他同阶级的小D、王胡也杀。朱元璋则是在倒元革命中杀鞑子,倒元革命后又杀与他同阶级(先是同为被压迫阶级,后来都成了统治阶级)的革命功臣。又如,阿Q梦想革命成功后,就往自己住的土谷祠里搬运赵太爷、秀才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总之是所有的财富都归自己,自己也当财主。朱元璋则是革命后当上了口含天宪的洪武爷,威福、子女、玉帛一样不少,整个天下都归了自己。阿Q与朱元璋这种酷似之处,都在证明着阿Q与朱元璋的血缘关系,证明着朱元璋是阿Q的先祖。

讳“光”讳“亮”,虚荣,护短,这一“国粹”,朱元璋传给了阿Q,阿Q不负祖德,又传给了自己的子孙们。小尼姑曾恨恨的诅咒阿Q断子绝孙,但如今一眼望去,那报喜不报忧,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乌泱乌泱的,这景象若让阿Q见了,他一定会得意地说:小尼姑的话不灵啦,我阿Q不仅是耀祖光宗,而且是子孙绵绵无绝期呀!

(责任编辑 李晨)



● 李 峰

(杂文)

(一)“后遗症”论

社会上有些争论,对医疗、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都有不同的声音。本人似乎患有“争论后遗症”,听到“争论”,涉及面又那么大,脑子里就像“闹鬼”,隐约浮现不幸的历史阴影。建国后几次搅乱社会和谐生活,导致党和国家身受“外伤”“内伤”(信念和精神)的政治斗争,导火线都是由“争论”引发的。“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以及北京政治风波,不都是如此吗?争论又多始于对当时国内形势和施政方针的不同看法,有的则只是始于对一出戏一个追悼会的不同观点。争论和斗争的表现形式,又多是由内部发展为公开,由嘴舌文墨的“文争”“文斗”发展为“政斗”“权斗”,由局部的小争小斗发展为全局性的大争大斗。斗争规模和结果,没听说哪位英明之士曾有预料。局面难收拾,损失难计算。所以,如今听到对改革又发生大争论,心里就嘀咕,担心有的争论会不会又引发出什么意外的事。

党和人民都“与时俱进”了呀,这种“嘀咕”是不是庸人自扰呢?可摆在眼前的报刊上明明写着:如今的争论,“比1980年改革开始时的争论和分歧要大”,“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到了“是进是退的紧要关头”。“有些人却以改革的名义否定改革”,“打着公平的旗帜反对和否定改革”。一场“围绕改革争议的舆论战”已经打响。看到如此重锤敲警钟,我转念认定,那“嘀咕”不是自扰,是“居安思危”。况且,“思危”与思稳、思防、思进,同谋策献言,同无的放矢的“自扰”划清了界限。思绪至此,我才起笔定了本文的主题除“后遗症”,打“预防针”,一箭双得。

(二)七嘴八舌论

社会生活熙熙攘攘,社会舆论七嘴八舌。再静听细看,社会生活或社会舆论,又是分阶层、分等级、分内外、分美丑、分正误、分不同背景、分不同声音的。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利益、信仰、文化或地域等等,也有差别。有差别就可能产生矛盾,有矛盾就可能产生争议,有争议就可能不只是双方,也可能是多方,甚至形成社会性的争议。所以,社会上有七嘴八舌的争议,如同林子里百鸟自鸣,应是必然的,正常的。

有社会意义的争议,含有人性、人权、民主、责任、品德和智慧的元素。这样的争议,可促进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是人类进步之声,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思想动能。卓越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聪明的大小官员和有识之士,会把人民中的纷纷争议,看作是听取社会原声民主的交响曲,观察社会生态的瞭望镜。

七嘴八舌的社会舆论,有时也有歪理误传。当权者的责任,不要任其自流,以防出现“无政府”或“民粹”倾向,产生“理念沙尘暴”气候,迷眼扰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所以,七嘴八舌的议论,也应纳入法治。自诩言论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前不久,英国伦敦市长因出言不慎触法,受到停职四周的法律制裁。一位历史学者因散布否定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言论,被判入狱三年多。诚然,1944年,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倡导过“言者无罪”。这句话是从春秋时代诗歌总集《诗经》中借来的用语,非古人治国成功之道。今天,我国要建设法治社会,“言者无罪”,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法律。

实践证明,要有效地引导七嘴八舌的社会舆论,“导言”应当入耳、明目、实在。它要有党和国家所确定的方针大略,有社会舆论中代表多数人的民意,有为民办事的良策实招,从而才会求得社会舆论的共识或一致。

我赞同方向上、总体上、主流上的舆论共识或一致,不认同“舆论一律”,因为它绝对化,难做到,也不必要。打个比方,如果全社会所有的饭馆都用一个菜单,做一个味道,那肯定会使“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句空话。生产精神产品也同理,那样做会使“三贴近”的要求,得到“三远离”的结果。

在方向上、总体上、主流上达到的舆论共识或一致,同新闻工作(不是每篇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和“喉舌”使命,以及未来会制定的新闻法,也会是一致的,同新闻报道的多元化、多样性是统一的。

还有,随着网络、“博客”的出现,人民的话语权近乎无限。除了法律界限,谁能封网堵网呢?社会进步到今天,人们应当逐渐习惯于听到社会舆论七嘴八舌的声音。人民利用网络“博客”表达自发的民主权或话语权,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具有社会进入新时代的音色。

总之,一个言论绝对自由的社会还没有出现,将来也不会诞生。一个没有七嘴八舌的社会,会是得了聋哑病的社会,患了痴呆症的社会,缺少现代文明的社会,甚至是闷在“火山”上的社会。

(三) 文明争议论

历史留下了带泪水的脚印,它告诉人们,切不可用“斗争哲学”看待争论、引导争论、处理争论。对于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争论,涉及社会敏感话题的争论,尤其不可用“斗争哲学”当指挥棒,任“裁判员”。可昔日权威片面地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而“差异就是矛盾”,包括“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斗争哲学”就是这样把一切差异都看作矛盾,一切矛盾都要用斗争的方法解决,一切事物的发展也还是都取决于斗争。革命战争年代特别强调斗争,那是事出有因。但由此便断定斗

争统率一切、决定一切,就绝对化、扩大化、扭曲化了,“左”了。实践表明,一定空间的斗争结局,也未必一定是真理的胜利。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保护与制约条件下,理念的争论可以转成为权势的较量,甚至演变成以举党举国之权势压制单兵独将之正义的悲剧。这时权势得到的胜利,当然不等同于真理的胜利。建国后多次由是非的争论,就曾经演变成了这种悲剧,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滞后了多少年。

鉴昔导今,建设和谐社会,要求逐步产生个无文成俗的文明争议规则。比如:

争议应论事、论理、论法、论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空论、泛论、冗论、偏论、“点论”(一好百好、一错百错)。

争议不以权势压人,不以人定理,即权大、势大、名大就有理。不搞小动作,拉小圈子,破坏团结。

争议中注意保护少数。发现发展真理的人,在思想上是走在最前头的人,勇于创新改革破旧的人。这样的人开始往往处于少数。

争议者应有乐于向真理“投降”的君子风度,大智大勇者的品格。向真理“投降”,是以谬误换真理,品格上的赢家,才能跃升的智者,高尚光荣。

此外,文明争议还需要有公正的舆论环境。媒体报道有社会意义的争议,应特别注意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做文明争议的宣传者和监督者。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杜晋)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计本价格如下: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英国老太太希拉里在华扶贫记

● 昌 沧

我到云南昆明探亲,认识了一位年近古稀的英国老太太。

我们去拜访她时,她已在楼下广场迎候。她精神矍铄,眼神炯炯,走路来,虎虎生风,爬楼梯蹬蹬的,我那孩儿也得紧跟。

我说:“您身体挺硬朗的。”

“这都是我经常锻炼和下乡扶贫的结果。”

我们一见如故。她的英文名为希拉里,中文名为魏郁林。

提起她的中文名,还有一段情缘:她是1993年应沈阳双语幼儿园之邀来华从事英语教学的,她与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个幼儿园有个叫郁林的小女孩,长得十分可爱,且聪明伶俐,在她的谆谆教诲下,还学会了弹一手好钢琴。她高兴地说:“留个纪念吧。我也叫郁林。我姓的第一个英文字母为W,就姓魏吧。”

(一)

我为什么想起去拜访希拉里女士呢?说来话长。

我去丽江的途中,看到农民一锹一镢地翻地,十分辛苦。

“怎见不到耕牛呢?”

同行的女儿说:“这儿比较贫困,一般的农民买不起、也养不起呀。”她又感慨地说:“全国有273个贫困县,云南就占了73个。”这样我们就“耕牛”问题引发出了阿秀的故事。阿秀本名为俸太秀,布朗族。她是杨丽萍总编导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中的小演员。阿秀死活要去参加这个歌舞团的动机,就是觉得阿爸、阿妈种地太苦,要去挣点钱为二老买头耕牛,孝顺孝顺。

这可与希拉里有关。阿秀是她资助上学的孩子之一。有一次,希拉里率领热心扶贫事业的朋友和学生们下乡,头天从昆明出发到临沧,预计次日下午可以到达阿秀的村寨。可长途汽车颠颠簸簸地爬行到距村寨15公里处,路况太差,死活就进不去了。天也不早了,他们只得抓紧时间徒步上路,翻山越岭,艰难地行进着。刚好前些天下过大雨,有些路段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淤泥就没过脚脖子。一不小心,就摔个仰八叉。

一位外国老太太为中国扶贫事业就这样艰辛地奔波着!同行者莫不为之动容。等他们走进村寨时,已是晚上10点了。接受资助的学生们见了希拉里他们,激动得又唱又跳。学生中数阿秀的舞蹈跳得最好,引起他们的关注。可不一会儿,她跳着跳着就昏倒了。经随行医生的抢救,才缓过气来。主要是因家境贫寒,她一直营养不良,体质较弱。他们从下午起就排队等候,也没有吃点东西,一活动、一激动,她就支持不住了。

希拉里他们认为阿秀是个可以培养的好孩子,就把她带到了昆明。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被杨丽萍所接纳,才有了她的今天。她的梦圆上了,她阿爸、阿妈的耕牛也用上了。

(二)

我问:“您怎么会想到中国的偏远山区去扶贫呢?”

希拉里笑着说：“我是1998年到云南电视台担任英语顾问的。我的一位国际朋友在云南文山州的麻里坡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1999年的一天，邀我去参观。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同时我也深刻地体会到边远山区的孩子们上学的困难：有的孩子要爬山涉水，走出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上学，实在太难了。有的孩子渴望读书，可家庭又负担不起，不得不辍学。于是，我萌发了也要办希望小学的念头。”

“可我是个‘洋打工族’，”她笑着说：“我的经济并不宽裕。于是，我就集腋成裘地省吃俭用，并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成立‘英语角’，为青少年们补习英语，来积累资金。”

“听说为了积累扶贫资金，您从早上9点起，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们上课，直至下午4点，中间也不休息？”

“经常是这样的。”她很平淡地回答。“好在，我在北京的朋友们得知后，都非常支持我。中国有句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地终于为我募集了6万元人民币。”

“这时，我手头有33个急需资助上学的孩子名单，都是红河州金平县铜厂乡冬瓜林村的。于是我想在这个乡里建立第一所希望小学。冬瓜林接近中越边界，路况不佳，交通十分不便，从昆明出发，长途汽车得颠簸一天一夜才能到达。这儿是苗、汉两民族聚居地，大家听说要在这儿建立希望小学，都十分高兴。但都提出将学校建在自己民族聚居地，他们说：‘如果学校建在我们

这儿，我们就支持您。’”

“我笑着说，你们不要争了。我举起手中的笔记本，亮出了这些需要资助学生的名单，两个民族的孩子都有。你们看咋办？我看你们兄弟民族应该团结起来，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提高文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建议哪儿有条件，就建在哪儿。这个希望小学就叫‘民族团结小学’。这行么？”

她的一席话，说得大伙儿挺不好意思，但他们心里却是热呼呼的。在乡政府和文教主管林佳文先生的大力协调下，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

在拜访希拉里以前，远在澳大利亚的外孙和外孙媳妇通过越洋电话告诉我：“我们崇敬的希拉里老师，在云南建了四所希望小学。”当我问到这事时，希拉里笑了，“确切点说，第四所正在新建中。”

她说：“第二所学校，是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的，得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资助，建在临沧州双江县的三家村。共花了9万元。规模和设施都比第一所要强。其间还在该县公弄乡改建了一所小学，帮助该校修缮了学生、员工宿舍，并添置了一些设备，也花去了7万元。”

“第三所，建在该县的邦老乡。比前两所又进了一步。教室更多了，更大了，更明亮了，还有学生、教师宿舍，以及盥洗间、厕所等等。一共花了10万多元，其间的3万多元是当地自筹的。”

第四所，建在该县以布朗族为主的邦协乡。这所规模就更大了。拟建成一个示范学校。不仅校舍多，设施齐全，为抢救并弘扬布朗族文化，在校内还建有布朗族博物馆。”

当地盛产竹材，曾经开办过许多造纸厂。为保护环境不受污染，以竹子为原料的造纸厂都先后关闭了。为就地取材，扶植当地生产，决定校舍、博物馆等建筑，都使用竹子。



希拉里和希望小学的孩子在一起

这时，希拉里发现当地人畜饮用水十分困难。她认为这也是建校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于是，她不顾高龄，同当地群众一道，攀高山、越险崖，四处去勘察水源，终于从6公里以外引来了甘泉，又花6.5万元修建了蓄水池。人们手捧甘泉，激动得热泪直流。

“这个工程得花不少钱呀。”我问。

“当然啊！得花136万元。”她兴奋地说：“我得到了在香港的英国友人赞助。”她随后拿出了正在施工的设计图让我瞧。这个工

程的规模真不小！我惊叹，英国女王授予希拉里“大英帝国优秀国民”称号“竹料还可盖三层楼房！”我又随口说了一句，“竹料虽好，可要注意防火”。

她说：“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竹料经过我们建材专家科学处理后，可以防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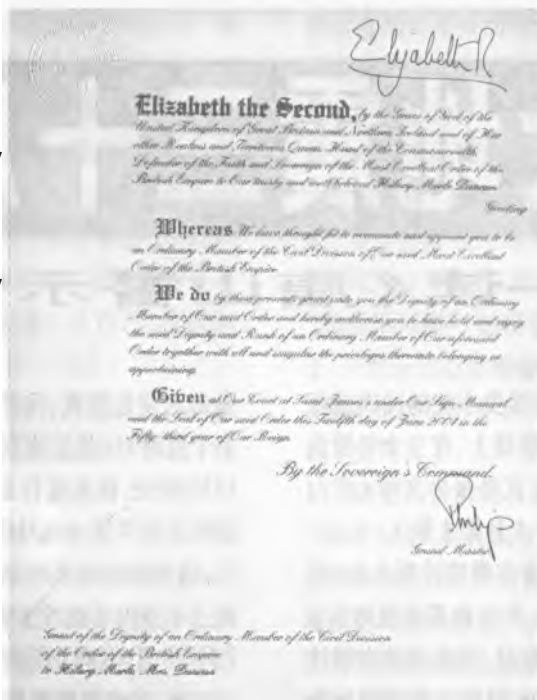
“你们想得真周全。”我问那位在香港的英国友人尊姓大名，她笑而不答，神秘地说：“我这位朋友要求我保密。他要学做中国的雷锋。”

这时，我们的翻译张艳玲——也是一位热心扶贫事业的云南师大教师，忍俊不禁地笑了，插话说：“您知道我们怎样叫希拉里的？叫老太太为‘老雷锋’、‘女雷锋’、‘洋雷锋’！”

(四)

筹建希望小学只是扶贫的一个方面。希拉里他们还资助了200多个孩子上学。按需分配：小学生每人每年200~250元；初中生400~450元；高中生600元；双江民族实验高中学生为800元；大学生看情况而定。本着“送鱼不如教织网”的古训，在希拉里的支援下，双江县妇联还办起了“郁林纺织培训班”，给妇女们传授技能，为孩子们更多地解决学费问题。

近五年来，为云南的扶贫事业，希拉里除了募集大笔资金外，个人投入也逾百万元。她有一



个幸福的家庭，老伴和远在英国的老母亲、大儿子及旅居意大利的小儿子、女儿都支持她。他们也都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捐钱、捐物。

为把援助落到实处，她还规定了定期回访。令她欣慰的是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学校都维护得很好。被资助的学生们都积极向上，发奋学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绩都是蛮好的。有的上了大学，有的成了优秀演员，还有不少成了建设家乡的骨干力量。更具影响力的是给乡民们带来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他们说，连外国朋友都这样关心咱，咱政府和同胞们更不会遗忘咱的，但更主要的是“咱还应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我被希拉里的高尚行为和精神所感染，不由想起了抗日战争中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终而以身殉职。希拉里与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是相一致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帮助我们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他们都是一样的伟大、一样的崇高，都是值得我们赞颂、学习和弘扬的。

可她只淡淡地说：“我们都是地球人类的一分子，都应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帮助，要和平，要和好，要和睦相处”。最后，她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国云南省人民政府特为希拉里颁发了“云南省外国专家彩云奖”，感谢她对“云南建设事业的热情支持和在友好合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她的感人事迹传到了她的祖国，被家乡父老兄弟传为佳话。鉴于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亲自签署命令，授予她“大英帝国优秀国民”的荣誉称号，鼓励她在英中文化交流中继续辛勤地耕耘。

(责任编辑 李晨)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

——读《唐山警示录》

● 徐迅雷

都说在地震的废墟上栽了一朵摇曳小花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在唐山大地震无形的废墟上,在三十年漫长的轮回中,如今栽出了一朵小花,它就是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感谢唐山作家张庆洲,在历经多年艰难波折之后,终于能将这本《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呈现在我们面前;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京城出版社无法出版的情形下,于2006年年初,用良心和睿智出版了这本“警世录”。这是最好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没有遗忘,仍旧疼痛。

什么是疼痛?柔石说,连眼泪都没处流的人,这才是人间最痛苦的人。而拿破仑则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我们知道,以乐景写哀,其哀更哀。在走向盛世的今天,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张庆洲终于大情似无地揭开了—道伤痛,那是比死亡更大、更强的痛,比地震更深、更长的痛。

更深之痛,就是漏报。

更长之痛,则是隐瞒。

历史将永远记住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在那个很深的夜,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仅仅十几秒的地动山摇,24万生灵涂炭,16万人滴血负伤。人类虽然无法制止大地震,但死亡那么多人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之前已经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地震,只是有了“预测”之后没有能够“预报”。实际上每次大地震前大自然都会警告人类,在许多生灵在大逃亡时,只是人类没有引起终极的警觉和真正的重视。

尽管预测地震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可你还真想不到,对于唐山地震的来临,人们已经关注了近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请重视对这一带的观测,作为杰出的地质学家,他知道什么地带易发地震,如果那些地区“活动”,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1968年,有高度责任心的地震专家杨友宸着手组建

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1976年初,杨友宸作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七八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从1976年7月14日至7月27日18时(距离地震仅9小时),这前后半个来月时间里,各个观测点发出了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但是,蓝光闪过之后,人们进入梦乡,灾难瞬间降临,唐山夷为平地,天灾嘲笑人祸,死难玩弄苍生。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压住,为获一线生机她逼着丈夫用锯把脚锯下来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报”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当张庆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剧。地震当晚人们看到了地光,“常识”里竟然是苏修打过来可能放了原子弹,这是如何的时代背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眼看着就要摸着大震的专家杨友宸,却在临震前两天被“组织”通知去“干校”劳动去了!如今已难以考证杨友宸为什么被“左迁”至“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组织叫你走,想留留不住;组织叫你留,想走走不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人走政息”的悲剧其根源是体制性的,而这更致命。历史在这里哭泣,只是人们难以听见那哭泣的声音。

体制制度的深层原因,使种种预报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时高高在上的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越基层越准确正确,越高端越专权荒谬,上面下来的“领导型专家”是“形而上”的专家,哪里像下面的“土专家”天天在触摸地震。在基层,那个时候竟有那么多优秀的热爱地震预报的业余人士,他们就在地震中心预测地震,哪里是“领导型专家”那样远在

“庙堂之高”？不好意思，在“官本位”环境中，这种“领导型专家”的悲哀，至今还在上演。

对于这些“领导型专家”来说，一句“地震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就可以轻松打发一切。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竟无一人伤亡！“青龙奇迹”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报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正像当时有人说的，“唐山砸了个烂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青龙奇迹”是一系列“越轨”行为所造就的。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同志是这次“越轨”行为的发端，他在一次会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同志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县里“越轨”地把“危言耸听”的消息捅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越轨”地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预告灾情，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越轨”地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知识书籍的冉广歧同志，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来临了，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而无人伤亡的青龙结果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20多年后，冉广歧同志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漏报的一万种理由，都抵不上一个良心！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只要防而有效，人类本来可能成功躲避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可是，面对地震，我们为什么无法建立“宁可错报一千，不可漏报一个”的规则？内外双因时刻都在“捆绑”着当事人。“外因”是为了所谓的秩序和稳定。唐山大地震预

报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却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为了保持首都一带的“秩序”、“稳定”，宁可忽略事关无数百姓生命的预报！至于“内因”，是错报面子拉不下，而漏报则有“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大抵都是可以轻易地变为“谁都可以不负责”的。有了“集体负责”的挡箭牌，加上“地震不可测”的幌子，就更用不着为百姓的生命负责了，只要一门心思想着自己负责就完事了。由此看来，“青龙奇迹”是一个“绝版奇迹”，成了“恐龙化石”，今后不会再有了。

而更可怕的是，在漏报之后，为了某种利益博弈，“漏报”的大事长期被隐瞒。隐瞒带来了更长的痛。要不是张庆洲这部《唐山警世录》，这个世界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的人至今寥寥无几。1996年，张庆洲以震后唐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声音沙哑的神秘电话，一位至今没有透露自己姓名的“深喉”，“捅”给他“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的信息，并请他去找知情人杨友宸。几年的艰难采访，才有了这部《唐山警世录》，盖子揭开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人间地震，凤凰卫视在《社会能见度》节目里，做了上下两集专题报道，让这漏报事件透一点光，增一点能见度。

极力掩盖真相，其实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一种利己的博弈选择。利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种力量强大到绝然



不怕 24 万亡魂的无声噬咬。在地震发生后当天,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就敢当面欺瞒“外行”的华国锋总理。书中写到一个情节:7月28日中午,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一位官员这样汇报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听了汇报后,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一句话,把一切都轻轻放过了。那个时代,还是1976年“文革”的红色恐怖年代,人治色彩非常浓烈,谈什么“渎职罪”?

为什么能够轻易做到“欺上瞒下”?那是因为“欺上瞒下”实乃“欺少瞒众”。领导人少好欺骗,公众人多可隐瞒。真实的谎言,毕竟也有巨大的市场。“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的惊天大谎言,一扯就扯了近三十年。然而,时间的流水是无情的,它能水滴石穿,它能水落石出。蒙蔽一时、瞒骗一地是可能的,想永远瞒过大众、骗过历史,绝无可能。

瞒骗、蒙蔽、隐蔽,不仅是人性范畴的利己选择,而且还是体制环境下的制度选择,比如灾难中伤亡的数字,曾经长期被当成是“机密”。唐山大地震的次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稿,“报道重点”就放在人与灾难做斗争上,仅仅提到“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直到3年后粉碎“四人帮”的1979年11月17日,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数字才披露。1986年,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也只能记录震后的事,难以提及地震前的预报情况。

轻松“遗忘”过去,轻易“放过”过去,对过去不肯回

首,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劣根性。不肯直面真实地回首那十年“浩劫”尾巴上发生大地震这个节点,与不肯回首“文革”十年,是一样的情形。种种“人祸”,往往都被看成是“敏感话题”。对有的人来说,处处都是敏感词、时时都有敏感事。而一个对这也敏感、对那也敏感的组织 and 组织中的人,注定是不会对人的生命安危有什么“敏感”的。

大恸无声哀人祸,天公不语对枯棋。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矣!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三十年过去,本质思维与本质行为依旧没有太大改变。每一次巨大的天灾中,我们都依然能看到漏报瞒骗等等人祸幽灵在游荡。在报与不报、真报与假报的所谓“两难选择”中,博弈中的责任官员们,其实很清楚“孰轻孰重”,轻易就把“两难选择”化为“惟一选择”。人们为什么不肯承认过失?因为许多既得利益者并没有跟着震中亡魂而去,他们要努力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即使他们“走”了,还有“兼得利益者”随即产生。

唐山大地震被漏报、以及对漏报的长期隐瞒,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痛。这一痛史无情地告诉世人:只有人民能够决定责任人的为政命运和为政利益,责任人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愚弄人民,不欺瞒百姓,即使想那样干最终也不敢干、干不了。

假如明天灾难来临,人类是否吸取教训?不肯直面过失,人祸注定还会再次敲门。这恐怕就是《唐山警世录》带给我们的最大警示。人类不能忘记,地震的警钟还会在某一天响起;今日不闻警钟之声,等来的必定是丧钟为你而鸣。

(责任编辑 李 晨)

来函摘登

近期看到《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作者郭军宁)一文中说:国防大学康景海政委(第13页左栏15行)说:何长工说过“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同页左栏21行)此文发表前未经我审阅核实。

我现在郑重声明:

1、我原职务是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学员队政委(大校)。不是国防大学政委。

2、我原是何老所在的办公室秘书,听何老讲过范石生对革命所做的往事,但没有听过“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的话。何老在《何长工回忆录》“前言”中肯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何长工回忆录》第191页第6行说范石生是敌人。何老已故去,何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均以正式出版的《何长工传记》(我曾参与编辑)为准,超出或不符合《何长工传记》之文章、言论均不可采信(包括我过去相关的谈话和文字)。

康景海

2006年3月29日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6年第**6**期

我给陶铸当秘书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

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

阿Q与朱元璋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